二十世纪文库

新发展观

〔法〕弗朗索瓦·佩鲁 著
张 宁 丰子义 译



华夏出版社

新发展观

HIJI WENKU·

〔法〕弗朗索瓦·佩鲁 著
张 宁 丰子义 译

华夏出版社
[illegible]·北京

责 任 编 辑：夏建民
封面总体设计：郭　力　钮　初　呼　波
　　　　　　　李　明　王大有
本书封面设计：呼　波

A NEW CONCEPT OF DEVELOPMENT

by

François Perroux

The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Paris, 1983

新发展观
(法) 弗朗索瓦·佩鲁 著
张 宁 丰子义 译
*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四五条内月牙胡同10号)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7.25印张 172千字 插页2
1987年9月第1版 1987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6 000册
ISBN7—80053—040--X/B·008
书号：2484·008 定价：2.05元

发展——走向何方？

哲学与发展理论

哲学？发展？它们是怎样联系的？在它们之间又有什么传统的联系？多方面的考察表明，确实存在某种基本联系。首先，自柏拉图时代以来，人们就已认识到思想产生于矛盾，而发展这一概念恰恰造成了我们时代一个重要的自相矛盾的事实：向往进步但又对其后果心存疑虑。其次，对整个发展问题的看法同时就是理解现实和现时代的钥匙，反过来，这种看法又以一种批判的、建设性的方式反映着一种必须视为从对现时代的合理认识中萌生的要求，它在人类于本世纪行将结束之际所面对的惨淡前景中向我们投以一线光明，或者说，它象征着一种未来模式的最初收获，这种模式将塑造我们的潜能，以适应我们的目的。

哲学家本人又怎么样呢？他在今天能够起什么作用？简言之，他的作用就是在一个思想和活动都受到利己主义和意识形态极大束缚的领域内，不畏艰险，力图证实知识成就的启迪价值。对于经济学研究所提出的各种观念和理论进行分析，是哲学家解释性工作、尤其是哲学工作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哲学活动的意图和哲学探讨的目标，与其说是强化某种真理的公式，不如说是澄清研究的意义和方向，因为这种研究象“无所不知和一无所知”一样，特别容易滑上“机会主义道路”。问题不仅在于对

发展研究中的偏向进行批评，尤为重要的是需要保持不懈的警惕，因为普遍渴望并赞成的发展，并未改变“暴政常常有一个愉快的开头”这一事实。

没人比弗朗索瓦·佩鲁更有资格谈论这一点，对他来说，经济学探讨不仅是一个接受现实检验的问题，还要力求论证真理的逻辑，这种真理既是认识论领域中的，也是实践领域中的；既是推论的真理，又是伦理的真理。正由于真理不受领域的限制，因而应当说，即使我们想要放弃给真理（真理绝不仅是某种象征或方便实用的常规）下定义的企图，也要承认——为表明这种困难——圣·奥古斯丁关于时间的论述对于真理也是适用的：没人问我们时我们还觉得了解一些，一旦要努力说明它时却是一无所知！这里所说的远不是推测出来的真理、确凿的真理，也不是特定价值体系的复兴：我们的目标必须是受经常性反思活动的意义和知识的意义所启发的活动，由此得出既是沉思的又是实用的思想，并象重视我们的理论和原理分析一样，重视我们的拒绝和抵制。处于这种条件下的思想同具有最重要意义的活动是和谐一致的。在我们的安全无保障的情况下，这种思想给我们以力量；这种思想是一束耀眼的希冀之光；这种思想是追求以最小成本取得最大效益的理想所绝对必需的，没有这一理想，经济学既无法存在也不可想象；这种思想支撑着我们的愿望。它从一系列非常现实的危险中拯救了我们的愿望，当我们平静地评价这种危险的时候，会使我们把过时文明的乖戾晚年同文明本身的未来命运混为一谈。就象诗人可能做的那样，说有朝一日终会证明对开化状态所寄托的愿望是“一种被蒙昧所驱倒的徒劳幻想”，这只是说，开化状态并未被赐予所有民众。发展尚未发生：它现在只是表现为意识的急剧增长，表现为一种指望，一个实实在在的生存问题。但是，从理性的角度看，它还只是被隐隐约约地觉察到。

一个具有多重意义的术语

我们考察一下"发展"这一术语本身是否至少应对发展这种含混状态负部分责任。"发展",既指发展的活动，又意味着结果的状态。然而，这种歧义是同另一种更根本的歧义，即根源于活力论的想象、甚至根源于历史的本质和生命科学的歧义混杂在一起的。在生命科学中，这种歧义实际上包含着对生成、变异和进化的实质的论述。

在不断重申的增长与发展的差别中，在对发展的辩解中，在对发展的"神话"、发展的"宗教"、发展的"错觉"等等东西的批判中，可以看出发展这一术语的经济学意义和它的政治的、论辩的职能，但是早在这一术语具有这种意义和功能之前，它就受着产生于两种现实之间冲突的原罪的折磨。这两种现实是：日常的现实，它具有一系列由任何事物都在成长这种观念而造成的熟悉印象；科学的现实，这种现实往往伴随着它所特有的连续不断的变化、危机和纠偏。由于这一术语在社会科学范围内的演变既未使其意义确定下来，又没形成科学概念所必需的严格的明确性，这一历史演变反而使它背上了更为沉重的包袱。

因此，即使不去推测增长、发展、进步这些概念间的因果联系，不假设从生物学知识向经济和社会知识过渡中的逻辑关系，仍有必要考察一下这种打破事实描述和现实想象之间微弱联系而固定设置的研究路线上的各重要阶段。首先，这能使我们对相关性有所认识：发展曾被用来指增长，而增长在生物学家对生育和发展关系的早期讨论中，是与发展相对的，因而也是与"生育"的定义相对的，它仅是"规模的扩大"！其次，这能使我们对现代性有所认识，就其内涵而言，这种现代性也许同在其适用范围内

的自由落体定律一样具有深远意义；自哈维以来，发展一直是他在《动物生育学》（1651年）广为传播的理论中的一个有效概念，这个理论推翻了亚里士多德采用的根据生物的生育方式分类的原则，代之以细胞生成原则。这个原则把亚里士多德加以区分的东西作为相同的东西，从根基上瓦解了自然发生说，并为渐成说、总成说和专以生命知识为基础的生命理论开辟了道路。最后，这能使我们对在发挥19世纪进化论的过程中存在的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有所认识，这种复杂程度不亚于其经典形态的进化论广泛地渗透在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和历史哲学的概念中。当然，冯·贝尔(1828年)导入胚胎学的那些新概念——达尔文和斯宾塞正是由此吸取其思想的——在生物学理论和社会哲学的创立方面确实起了作用，并使“发展”和“进化”具有了合法性：进化——由于自然选择问题在生命过程中的重要性；发展——由于以孔德、斯宾塞及其信徒的进步概念为基础的思想的传播。先是奥古斯特·孔德，他认为进步就是发展，这是生物学赋予历史的基本规律；“就其实质而言，发展这一术语对于直接确定人类究竟在什么地方实现真正的至善（着重号是我加的——作者），有着难以估量的好处……”。这里根本不存在历史是人类活动的思想：除自然规律外，一无所有。因此，发展概念在把人类进化描绘为一个没有危机、间断和更新的进程时，开始使用社会有机论者的隐喻，并认为使用这种隐喻是合理的。接着是斯宾塞。在孔德和斯宾塞之间，达尔文把戏剧事件引入生命过程，参考死来说明生，这样就产生了斯宾塞在19世纪末所选择的不同内涵。在胚胎说模式后出现了渐成说模式，所有的演变，无论是宇宙的、生命的、人及其他的产品的、还是社会及其形态的，都被视为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但是，这种日益增长的复杂性是有机体同与其自身相异的行为者相互作用的结果。一切进化都是渐成的，它导致结构

变化，使之从同质转化为异质，因此既是增长也是发展。大家公认，斯宾塞与对这同一模式持另一种解释的马克思不同，他只采用了达尔文生存竞争学说中渐成说的观点，他这样做既是由于传统束缚，也是因为这能使他把他的综合同政治个人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的要求协调起来，因而完全是意料中的事情。于是，最后的结果是出现了一种被称为大型工程方案或斯宾塞工程方案的东西，其基础是一种完全统一的知识。这种方案的目标是制定各种不同形式的文化和社会工程，它们将在世界范围内实现人类经验的一种特殊模式的希望。

一个意识形态的概念

因此，我们正在讨论的问题，绝不仅是不加控制地随意扩大某些概念的应用领域，从而造成它们在这些领域中定义混乱、难以把握的局面。在反神学观点的掩饰下，已经出现了一种反目的论观点。更重要的是，正是这一思想路线，它既不批判自己的手段，又不对其标准提出疑问，而只对目标表示异议；它把手段和标准接受下来，但对其本身却没有作出明确的说明或解释。也正是这一思想路线，它给予列强以借口，使列强们能以其目的是推广文明为托辞来抚慰良心，从而危害了各门社会科学的研究。

到今天，时过境迁，但含意仍然不清。因此才有论述方式中混淆事实与价值、混淆崇拜起源与迷恋未来、混淆对落后的怀念与传播进步的信心等情况出现。不是说过发展是西方人自我复制，不是说过世界能以不同方式发展吗？这些说法使更深层的疑问具体化了，这是一种由危机四伏的前途引起的焦虑。无疑，这种危急状况是下列事实的一个征兆：既然承认根本不可能以一种使所有国家、所有经验、所有要求都得到满足的普遍方式给发展

下定义，那么也就认可了冲突情况的存在，并使之合法化。只是说发展应采取不同的方式、应经过不同的途径是不够的。那么，这种多样性的差异是由什么决定的？发展的某种形式？究竟是哪种形式？什么使它成为“某种东西的形式”，它是哪种发展的形式？如果直至今日所走的路是行不通的，那么瞻望前途，似乎也是茫然一片，无路可寻。在一种魅力和优点丧失殆尽的模式和一种尚待证实其成效的观念之间，我们徘徊不定。用通俗的话来说，这就是人们通常喜欢说的“危机”。要对人类命运问题作出一种令人满意的解释，现在必须用发展的语言来表达：为实现全面发展而进行的共同努力涉及诸多方面，而且如此紧迫，以致同和平与生存融为一体。这里谈到的和平是世界和平，而财富的积累和在某些方面有特殊优点的生产革新和组织革新却阻碍了这种和平；引起种种冲突的经济制度正在今日错综复杂的世界中、在社会的最深层次上再产生出这种最受人们指责的冲突，就这个意义而言，这里所谈的和平也是指再分配的和平。

除非证明存在着一些不涉及全球性的国际环境也可理解的政治微观系统和社会微观系统，就绝不能认为是个地区性问题；否则，对于中断过程的抵制似乎就是有效的了，它使所有发展都依附于某种同一模式的复制；否则，与一体化过程相反的运动、导致悬殊差别的活动、为世界生产体系利益考虑的国际化，早已成功地阻止了现代经济机构及其财政资源、技术和市场吞没所有人类社会。如果我们还缺少这种证明，那么，明摆着的事情就是这种误入歧途发展的证据：大宗产品输出，以国内生产代替进口，产业输出。结果是发展的危机，这是一种现实的危机，然后是意识形态的危机和理论的危机。于是我们所面临的肯定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因为我们已经达到了可以用一般公式表达的阶段。一言以蔽之，增长同发展之间的因果联系是不牢靠的，增长会导致

发展的观点更是如此。我们要记住，在这个问题后面的不是夸夸其谈，而是八亿赤贫的难民！但是，问题的这种普遍性还是需要证明的。质疑的言语有助于此。但这不是太戏剧性、太不公允、太片面了吗？早在20多年前，弗朗索瓦·佩鲁就产生了怀疑。这种质疑的预演往往同下列问题相关联："我们怎样才能改变我们面前的社会和文化，使之符合我们的工业化？"要不就是值得以注入大量慷慨行为来充实的增长。虽然社会与流行的模式不同，这一事实似乎成了发展的障碍，成了"危机"的原因和理由，但这种贫困的理论并没有掩饰住这种理论的贫困。关键在于，我们所关心的与其说是普遍的危机，不如说是与国际舞台性质有关的普遍性现象。

仍然是个普遍性的问题

既然如此，这种普遍的危机就是世界性的。但这是在一种新意义上说的，因为它不是持续过程中的一个关键时刻，而是该过程的中断。一方面，我们经历着一体化、国际化和普遍化；另一方面，我们又面临这样一些问题，它们势必带来个性化，从而导致差异地区的出现和协调统一的需要。这些对立的运动不是同一运动中的对立部分。它们表现出潜在的普遍性，但这不是由于它们活动的场所是同一个世界，也不是因为某地发展不足和别处发展过度是"恶性发展"的互补方面；关键在于，所需要的解决办法必须是适当的全面发展——换言之，必须是制定与当今世界相吻合的政治和文化蓝图，而在这个世界中，人类不得不担负起那些自己能够适当完成的任务，因为这些任务是和人类能够有效说明并加以解决的问题相符的。当然，这只是对危机的一种主观认识，是从危机（就业、城镇、石油等危机，富裕时代的结束，

普遍稀缺的进一步恶化，世界上大多数人的贫困化）令人厌恶的方面推断它的极限。总之，尽管犬儒主义教导我们说死亡甚至也是可行的，但如果工作与尊严的人权有些什么意义的话，我们在其中生活的充满着冲突的世界，就不是一个可行的世界。不言而喻，无论我们抵制人的消费，还是不再能满足人的需要，这些挑战都依然如此。我们抛弃的或不再能提供的东西，都要求我们批判这种教育模式，批判科学和文化观念，批判政治意向。这里，青年人对解放、人权、和平的自发思考是同国家的非殖民化运动及当代思想家们的忧虑结合在一起的。由于运动与运动是相联的，因而这一危机被视为在事物的秩序中，在它所酿成和控制的过程中的一个危机。这一危机还被视为对其合法性的挑战，更令人伤脑筋的是，在这种危机中，现行的普遍性受到了另一种普遍性的怀疑和挑战，而后者正是统一性促使我们要求的普遍性。此外，这一危机也是现代性的危机，长久以来把历史描绘成一个统一过程的言论和许诺现在暴露了真象；曾经攫取了失败者的财产、现在虎视眈眈要攫取他们的灵魂的，正是经济和技术。进步的偶象破灭了：贫困和暴力使它成为弥天大谎。但这种偶象还很有市场，因为人们还在强调一种平衡的、有差异的增长观，据说这种增长可与有机体的增长相提并论（而且可与经过自然选择所形成的生物有机体的增长相提并论①，……仿佛世界的状况是自然历史的产物)。结合——解体的过程好象完全排除了为发展提供牢靠的基础或发动一种新的世界性运动的任何积极的建设性的意向，按照这种意向，新的世界性运动就象未来的计算机一样，它的思维与其说是连续式的，不如说是并列式的。这种运动象即将出现的“多维历史学”一样，其年表将采取并列的形式，而不采

---

① 参见莫里斯·拜伊－G·德斯坦·德·伯尼斯《国际经济关系》，第4版，第1020页。

取将各种历史学放入同一个模式的形式，因为同一模式无视社会和历史的多样性以及在明天的普遍性中将趋向统一的各种不同文化。

一种以社会学为基础的研究方法

弗朗索瓦·佩鲁决定把有机论隐喻试图掩盖的东西概念化，我们要感谢他在认识上的敏锐，因为他为我们提供了新古典主义和凯恩斯主义都没有提供的东西。

他的努力向几个不同的方向展开。

第一个步骤是把增长、发展、进步和社会进步置于一个能澄清其意义的领域内，这个领域就是被认为是科学的、以科学作为发展方向的经济学。并非所有隐喻都应抛弃，但确实存在一些阻碍并窒息思维的隐喻；其他隐喻则有一定启发性。在这种重新思考的尝试中，问题不在于理解科学的方法，而在于把它推向前进。下面这个目标是比较微妙的：要在脱离事实的想象与没有理论论证的事实之间找出一条中间道路。我们所以要步入经济学领域，那是因为它能成为开明的决策和活动的舞台，这种开明依靠的是知识。经济学也是一种活动方式，这种活动已成为科学研究和持续的批判性分析的对象。

同差不多所有社会科学家的天真一样，经济学家公认的日益增长的天真，曾令人感到痛惜。有人曾建议他们进行社会学研究：社会科学的社会学和社会学家的社会学。还有人劝告说要求助于逻辑。这是很重要的，如果从字面上说，不采取一种特殊方案，对可观察的事实作出解释、加以证实，并使之形式化；如果不使表达方式与经验彼此吻合一致，这种劝告也就不能付诸实现。这种概念的灵活性必须包括一切造成或说明经济和社会变化的东

西，这种灵活性比语源学更重要，比语义学更起作用，比纯粹的哲学更有效，其目标在于以理性的方式把握经济现象。因此，分析的中心是现实力量的领域，能动单位在这个领域中彼此对抗，它们是经济活动的个别主体或集体主体。

这个领域的特征是权力无所不在；这个领域的特色是不平等伙伴之间的关系和不对称。观察是对当时的逼真描述，它准确地再现了历史学所反映的但未说明的一系列资料。历史学之所以有某些价值恰恰在于它提供的资料本身！它使读者在看弗朗索瓦·佩鲁的著作时可以从中清晰理解的那种分析更为完美。它给通常具有几个方向的增长又加上了时间这一方面；因为经济的现实即使被简化成描述性的指标时，也依然是现实"时空"中的一个资料数据，这种时空的空间是有限的，时间是流逝的。它最后是以分析结构变化、组织类型和社会前进经过的路线而告终。增长是规模的一项指标，它是从发展中获得自身意义的，这种发展虽然同增长保持着差异，但又围绕着它，并在增长取得进展时显示出自己的效益。果真如此，经济学就不再是一门关于物和物之间关系的科学，而成为一种竞争性共谋和合作性冲突的实践。这种竞争性共谋与合作性冲突并不同于由价格机制调节的均质市场的组成部分，这正如它不同于主人和奴隶的辩证法所说明的拼死搏斗和为名誉而进行的斗争一样。于是，弗朗索瓦·佩鲁就假设了一条基本公理，作为以科学为方向的经济学的原则。这条公理是：生命是抵御死亡的各种力量的结合体。

科学和价值的趋同

由此可见，在这里，科学不仅与常识相符，而且与真知，即人民真正的认识一致。正如弗朗索瓦·佩鲁所说："人民曾受到

愚弄，消极地接受那些不仅从未以其自身经验为基础而获得的，而且是由西方人向他们灌输的思想、公式和战略”，还强迫他们服务于那些占有财富的强国的目的。因此，他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9年8月27日至31日在厄瓜多尔的基多召开的会议感兴趣，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总体的、内生的、综合的发展观念。在这些概念中，内生性也许最为困难。这个概念表示的是运用各国的国内资源，基本含意是要注重理应受到尊重的文化价值体系，而不仅仅是能精确计算的价值体系。这一概念正视秘而不宣的真理，它意在指出，如没有与发展休戚相关的所有人的参与，发展是不可能的，而且如发展与他们的利益相抵触，在空头支票的掩饰下对他们进行剥夺，发展就不能发生。发展在于成就、实现和解放，它不是个悲观论者和乐观论者之间那种学究式争论的话题：对于这种运用知识、发动一个更有益于实现人类理想、更能与科学的各种要求协调一致的运动所进行的努力，任何人也不能斥之为不现实而弃之不顾。

为一切人的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

那么，可把发展视为引起知识和价值创造的张力焦点，促进和推动这种创造活动正是教科文组织的职责。

从事这一事业，必须通过哲学的反思。这种反思的作用表现在许多方面，因为，发展不是自发演变的结果，也不是在共同利益方面有一致认识的结果，更不能把它简化为实现专家们设计的各种模型。所以，发展远远超出了满足人类需要这一简单的道德要求。虽然其中某些因素有助于推动发展，但它肯定是竭尽全力奋斗的成果，在这一奋斗过程中，来自现实的限制和来自真理的限制聚集在一起。

对所有社会科学家、特别是对经济学家来说，这肯定是一种依赖知识体系的自我意识的要求。知识体系通过这种自我意识可以反观自己的基础，并同其他知识体系结合起来，对自己基本原理的相对性和由于天真而受各种权势影响的程度作出估价。努力进行批判性的再评价，有助于我们看到支配认识活动的条件，并能提醒我们，现实无法逃脱真理的把握，但必须有一种严密的研究方法。因此，如果明确指出旧的发展哲学是同已不复存在的历史条件和环境联系在一起的，那我们就可以做出这样的回答：对于支配着新发展的可能性的各种条件进行认真的思考，是知识界一项令人振奋的事业。我们面前的现实确实需要这种思考。哲学的任务就是要提醒我们，这种新发展根本不同于以环境为根据的外来命令：它是使自由能够成为现实的各种新意义之间的相互联系所构成的观念。这就是弗朗索瓦·佩鲁坚定不移地奉献给我们的思想。如果我们对于这种思想能够全力以赴、身体力行，它将引导我们走向一个新世界。

M·A·西纳索

1981年10月28日

（本书发表的看法完全由作者本人负责，未必代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观点。）

前　言

自上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力量的重新组合产生了连锁反应，它要求对思考经济、社会和国家关系的传统方式进行反省。产生于欧洲的许多学说遭到社会下层人民的批判和抵制，他们现在可以畅所欲言，公开表达长期以来以怨恨和沉默的方式孕育的反抗态度。随着不再心甘情愿被遗忘的普通人民和新兴国家的崛起，各种思潮在不可逆转的广泛意愿刺激下层出不穷。

在探求国际经济新秩序和新发展问题的过程中，这些思潮具有各自的形式和意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建议我以补充报道最近在厄瓜多尔的基多召开的专家会议①的形式来写的，正是这种新发展问题。

我没有回绝这项任务，尽管我清楚地意识到落在我肩上的重任，知道为发展哲学写一篇导言是件颇有风险的任务。虽然30多年来，我一直在对发展进行描述和分析②，但我仍希望，我不会由于毫无根据的推测而受到指责：我的目标是为世界各地很多实力雄厚的研究团体所取得的成就作出自己一些微薄的贡献。也许，正是由于这些成就，每一个有良知的经济学家才能对自己以往的作为感到问心无愧，并证明自己所选择的学科能够胜任什么工作。

我个人的信念是，对发展问题的注意预示着经济学及其所应

① “研究综合发展观”的专家会议，基多，厄瓜多尔，1979年8月27—31日。

② F·佩鲁，“从国民的贪欲到人类经济”，载《箴戒社会周刊》，1952年。

用的分析工具领域中的各种根本变革。其要点在于，发展同作为主体和行为者的人有关，同人类社会及其目标和显然正在不断演变的目的有关。一旦接受了发展的观念，就可望出现一系列新的发展，与之相应的是人类价值观念方面的相继变革，在历史上，这些价值观念正是以这种方式转化为行为和活动的。

要求一种不同发展形式的呼声，出现于各种发展战略没有产生其预期结果的时期。① 虽然第一个开发的十年确有成就，但第二个十年却没有达到其目标：既没有达到6%的增长率，也没有实现正式援助的总量（发达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中有1%用于总援助，7%用于正式援助），也没有进行有效的行动合作。

这种新发展是“整体的”、“综合的”和“内生的”。这三个术语中，每一个都有几种含义，把它们结合在一起，也不会产生一个单一含义。此外，各种利益集团之间的不一致，也造成了彼此矛盾的解释。

在经过分析确定这些术语的含义前，不妨先指出这些外在的困难。

整体的是指这样一种观点，它在各种具体分析之外，不仅考虑人类整体的各个方面，而且在其内在的关系中考虑必须承认的各个方面的不一致。这一术语当然适用于具有不同规模和结构的各种实体，如一个国家、一个国家集团或整个世界。

按照数学的常规用法，内生的是指组成选择的方程系统的各种变量，它是同表示数据并可进行不同逻辑处理的外生变量相对的。但是，在各种国际组织的词汇中，这个形容词被用来表示一

---

①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期计划（1977——1982）》，《超前思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今天和明天挑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1977年，《自杀还是生存？（2000年的挑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集体著作，1977年。

戴格·哈马斯库德：《报告》，为联合国大会第七次特别会议而准备，1975年。

个国家的内部力量和资源及其合理的开发与利用。

至于综合的这个词，显然有多种含义。如果一定数量的国家是综合的，那就是说它们在一个更为紧密的整体中聚集在一起。就更一般的意义说，“综合的”这一术语表示各种单位和因素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单一整体。因此，综合的发展可以指一定数量的地域的一体化，也可以指各个部门、地域和社会阶级之间得到加强的内聚力。以适当的方式进行分析时，这两种含义是相互兼容的。

其中每一个术语都可能被不同的利益集团根据产生于不同前提从而得出不同界说的经济学说作出不同的解释，一开始就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国际谈判中合理的和历史的纵横捭阖产生了相反的解释，尔后，既得利益集团把这种解释应用于理论概括。于是，综合的发展招致习惯于他们自己的增长、增长衰退和增长率等指标的计量经济学家的批评；他们很想说，如果用很多指标来表示，发展就呈现不出相同的收益了。至于发展的拥护者，有的人热衷于强调外在条件，而另一些人则热衷于强调某既定集团中的内在条件。在基本需求方面，有些人对靠恩赐而恢复不发达状态的尝试深感忧虑，另一些人则担心，反对“恩赐”经济的合理扩大将意味着不能给每个人提供维持其生存所必要的财力。出于实际的原因或对自由主义的错误理解，他们都对默许潜在的身心活力的毁灭进行谴责。同样是督促处于贫困线上的人们厉行节俭，这在有些人看来是符合常识的方法，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这是向那些其志向水平构成发展动力的人们提出颇成问题的建议。

客观分析消除了其中很多误解。讲清楚这一点是很必要的，因为新发展哲学的未来前途未卜。

在本世纪50年代，研究的中心是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对增长的特殊注意是由国家会计制度、长期统计分析和对平衡增长的

静态描述共同引起的。

新的分析方法近30年来一直严格地区分诸如增长、发展、上升和进步这类可观察的、可定形的、可粗略定量的特征。只是在下层社会的人民意识到他们一直受人愚弄、被动地接受不仅从未根据自身经验所达到、而且一直是西方人出于一己私利为其布置的思想、观念和战略时，这种分析方法才能有所突破。

这样一种意识的后果正在缓慢地扩散开来。创新总会引起强烈的反对。当理性的创新在两个世纪之久的政治和商业霸权之后搅乱了以“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这类常常不明确的术语为基础的非常确定的利益时，反抗会分外强烈和广泛。这种反抗出现在各个层次上，或公开或隐蔽，或坦率或虚伪；它的根源是统治阶级和政府、自由职业者和谨小慎微的、不惜为安定的职业和社会认可而牺牲真理的人们的强大联盟。

既然当代历史已经以制度性暴力造成的血腥暴行作为代价把那些比较拙劣的骗局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为了一切人和完整人的发展就理应是政治家、经济学家和研究人员一致接受的目标。

第一代英国古典经济学家非常正确地以整个世界和全人类作为他们的研究领域。但他们把带来普遍和平的能力归之于工业，把按照“经济效益”要求和“可行的”正义要求分配资源的能力归之于市场的扩大，这就把人们引入歧途。

人民大众要生活，但不具有手段；他们需要的是，对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的遗产及其不肖子孙新古典主义的前提和后果进行彻底的重新审查。

破绽百出、引人误解的会计制度记录下来的财富增长，越来越难以使人相信。它可能是人的发展和实际资源或潜在资源发展的结果或手段，也可能不是。丰富的人力储备要求有各种将来开发利用这些储备的理论阐释。这就是新发展的内在含义，虽然对

西方富人来说它不是一种输出品，但对他们关系重大，正象它对下层社会人民关系重大一样。

富国中发展的各种新形式对于最落后国家的健康发展是至关重要的。致力于共同目标的双重努力也许有助于纠正世界经济中各种臭名昭著的弊病。生产和贸易方面可以预见的改组要求更新理论学说和分析工具。人类群体在漫长历史中记载其人生哲学的所有可信的文化都被吸引参加这一建立文明的事业。

由此可见，在国际经济新秩序中，新发展已成为共同性的工作，它的理论及其贯彻实施都要求对经济思维的基本原则进行再思考。[①] 经济学通常被定义为分配稀缺商品的“科学”。稀缺这一抽象观念来源于如下事实：可能的消费大于商品，这用另一大体相同的说法表示，就是需求超过了可以得到的商品。在这一不等式中应用的简化主义，有一种把附加在某一商品上的重要性等同于效用、把购买欲望等同于需求的作用，从而把效用和需求转变为想象中的中立概念。这里，我们看到了V·帕累托已经使我们习惯了的那种“净化作用”：它以货币总额与商品数量之间的平衡取代了个人，也就是说，它关心的是假定可以孤立存在的交换结果，而不是造成这种结果的决策的形成。同样，动机也被说成是追求以商品或货币形态存在的“纯”利润。

这种纯经济学要存在，所需要的只是市场及其空间。在这种假定为均质的空间中，假设为平等的和相同的人具有能动性。而且，内在于一切社会的等级组织也要被原封不动接受下来，并设想它对贸易性商品交换没有任何影响。其结果是，作为这一整体结构基本概念的稀缺，被定义为某种特定的商品供应与可能的消

① 加林·C·库普曼斯：《各门科学中的经济学》，*AER*，1979年3月；A·利希尼洛韦克、G·贾德夫莱、F·佩鲁：法兰西学院多学科研讨会，见皮埃尔·德拉特列（编）：《跨学科研究》，巴黎，马洛因，1977年，《基础科学》．第1卷，第2期，1980年，牛津，佩尔加蒙出版社。

费需求之间的平衡。或者是支付能力与购买欲望之间的平衡。这些思维活动中表现的“中立性”掩饰了把生理需求、自然冲动同理性的和伦理的愿望等量齐观的事实。根据该体系的内在逻辑，这实际上涉及到一种效用，这种效用包含了所有类型的动机和评价；同时，这意味着只需加以识别就能使上述诸因素成为现实。因此说，这种效用作为庸俗唯物主义的象征根本忽视了人类的行为和历史。

如果持这种立场，就不能区别日常经验和系统观察表明应当加以区别的各类稀缺。个人在直接面对自然时产生的短缺意识从未使一个被判处隔离监禁的人产生预期的理论反应（鲁宾逊·克鲁索），为了克服自然短缺，人们聚集到了一起，这就使自然稀缺变成了社会稀缺，即成为一种包含着人们之间不平等的稀缺。因此，在发达社会中，重要的是找出给人们分配角色从而给他们划定社会允许的活动范围的制度所造成的短缺。此种由市场暴露出来的短缺并非孤立的，它同社会给其成员、特别是给雇佣劳动者和有权决定怎样使用生产资料的董事们分配的角色密切相关。为缓解在角色的社会分布方面存在的各种强制因素所作的努力影响着市场的作用和形式①。

对传统经济学中作为一个抽象观念的短缺所作的这一初步分析，表明有必要对有限条件下的最大化这一理性经济学的准则或范型提出置疑。计算机为了决策而选择似乎是最纯的目的和手段的组合，也就是选择在这一特定的运算范围内能以最低成本提供最佳成果的组合。这一程序是显而易见的，把它翻译成代数或数学的语言也不存在特别的困难，但条件是要抽象到这样的程度：根本不考虑是谁在追求最大化、对什么实行最大化、随这种最大

① 弗朗索瓦·佩鲁：《能动的经济学与科学的经济学》，《社会学与社会科学》，*CEPI*，1975年。

化而出现的间接效应是什么的问题。

可举例说明这一点，某大公司在一个发展中国家设立一个分支机构，它在生产、运输和分配成本的有效条件内实现了以价值表示的最大预期利润。但该机构是否考虑过由此产生的污染、给当地社区带来的灾难和文化的衰败？显然没有，这一活动的目标并不包括这些内容。如果在评估这类项目的调查表中有这些条款，那也是最高层协商的事情。

在另一种显然不同的场合下，一家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都在发达国家里的大公司，也会出现同样的问题。从合乎逻辑的观点看，只有在公共的、集体的最大化场合中才能证明私人的最大化一般是可以辩护的。可是，后者并不是受定义严谨明确且易于应用的规则支配的。

如进行这类尝试，势必会使从市场价值、价格和产品数量推导出来的、并作为"财富"而为人知的模糊实体最大化，这种实体并不具有在资源和信息不平等的人中造成不平等的优点。有限条件下的最大化和这类最大化的结合体会产生出一个在全面运用时必然会带有很大保留的准则。

从观点到理论，最大化都是静态的，而且排除了时间因素。理由是显而易见的：时间会带来新事物和风险，而且尽管有所进展，概率模式也只是非常勉强地容纳时间因素的。

最为精确的经济计算有助于制定决策，但它并不是决定性的。这种计算如果要在制定政治决策方面发挥作用，它就不仅是极为复杂的，而且有着与这种决策本身不同的规则，因为政治决策的基础是不能简化为数量和成本的价值观念，如人们的自由和安全。因此，需要详细说明定量表达方式的局限性——有些人已经说过，没有定量表达方式，任何经济学现象都不存在。假如要以可观察的现实来给经济学下定义，我们将不得不考虑诸如市场

这类制度，而且将不得不以相当模糊的界线来设法应付①。

经济学是为了个人的利益而在共同利益中通过稀缺商品的消费来调整人群关系。这种稀缺商品在某种程度上能以社会的方式进行数量表示并加以说明。

正如这一定义所表明的那样，它强调的是人与集团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人与财富的关系。

当前的经济学思维正举步维艰、半推半就地摆脱着一经产生就泛滥开来、现已堕落成同其原始形态大相径庭的粗俗享乐主义和唯物主义的个人功利主义。以当代各种经济学为基础的"哲学"反映了一种交易心理，这种心理破坏了人们之间的伙伴意识，随之破坏了一切哲学和宗教尤其作为人性来看待的价值观念。

正是在这里，传统社会与所谓发达社会的实用"经济主义"之间的不协调才是可以理解的。

缩 略 语

国际组织的各种报告、公报和出版物

UN	联合国
ILO	国际劳工组织
Unesco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OECD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EEC	欧洲经济共同体
IMF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WB	世界银行

① "社会科学的脆弱可能是由于它们处理的是一些印象（只要遇到挫折和经济学的分类困难时），这当即改变了科学的概念"，罗纳德·巴瑟思，法兰西学院，就职讲演，文学符号学教授讲座，1977年1月7日（小册子）。

BIS	国际清算银行
FAO	联合国粮农组织

各种杂志

AER	《美国经济评论》
CISMEA	《应用经济数学研究所手册》原《应用经济学研究所手册》
EDCC	《经济发展与文化变革》，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EA	《应用经济学》（应用经济数学研究所档案），应用经济学数学科学学会，玛利·居里，宝石街11号（亨利·彭因卡尔学会），巴黎，75005
ES	《经济与社会》（应用经济学数学科学学会手册），地址同EA
MED	《发展社会》，三语论坛（法、英、西），地址同EA，主任：F·佩鲁，编辑：F·丹诺尔
CJN	《新兴国家的成长》，主任：G·布拉东，巴黎
CBPP	《形势》——巴黎银行每月经济公报，巴黎下巴黎区
COO	《合作》，研究合作的杂志，巴黎
CRI	《批评》，罗马
DOC	《经济问题文献》，法兰西文献，巴黎
FA	《外事、美国与世界》，巴尔的摩，马里兰州
JPE	《政治经济学杂志》
JR	《黄与红》（巴黎综合工科学校高年级学生联询会专辑），第三世界，1979年2月
TR	《学期》（学期经济），墨西哥城
TM	《第三世界》，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所，巴黎，法

兰西大学出版社

WD　　　《发展中世界》，伦敦

附言：

下文中提出的论点尽可能是根据作者近来的著作，读者将看出这里的论述是简明扼要的。

《二十世纪文库》编委会

目　录

第一章 概念与指标

研究问题的新方法

重视科学的经济学，目的是要揭示出一系列能够在经济现象范畴中运用的一致而且普遍有效的关系。其中，进化现象被赋予特殊的重要性，它意味着很多具有内在联系的变化，而同在不可逆的、历史性的时间中发生的事件和结构的“随机”延续恰好相反。

考察一个社会内某种经济的进化时，可以按规模、也可以按复杂程度对增长作出估计。

对某种活生生的有机体，如对一株植物、一种动物或一个人，也可作同样的区分。无论对分析的目的还是对实践的目的来说，发展都显然是个最能提供信息的概念。我们将会看到，倘若采用一种新的、更为彻底的研究方法，经济分析同样能提供大量信息。迄今为止，由于一种已被最新研究方法及构成这种方法的概念和形式化所摒弃的传统的、武断的简化论趋势，研究人员的注意力和研究课题一直集中在增长问题上。

1. 一切人群关系都是合成的，是由斗争与合作、冲突与互助组成的①。任何特定活动中不相同、不平等的行为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也是如此，这些行为者在生理、心理和社会方面都不相

① 弗朗索瓦·佩鲁，《权力与经济学》，1974年第2版，巴黎，多德。

间：他们既无相同的收入，也无同样的背景，在社会等级中的地位更不相同。与市场相对的平等观念是极为含混的，对这一观念的阐述常带有辩护的意图。实际上这种平等毫无根据，除非它存在于那种根本不可能出现的情况中，即行为者是相等的原子实体和无穷小的微元，他们丧失了一切能够对决定着他们并强迫他们必须接受的价格进行左右的力量。

以亲属、地域、活动为基础形成的各个集团之间存在着冲突-合作关系，对这种关系模棱两可的态度和矛盾的情感都是显而易见的，系统的观察和思考充分证实了这一点。隶属于这种集团的人从中既能获得力量也能接受弱点：它能加强也能削弱人们在资源和获取信息能力方面的个人系数以及所处的特殊等级。

2．对此种受冲突支配的合作状态，有关人士可能视而不见（或不愿看到）；正由于存在这种状态，在奖赏"适者"消灭"不适者"的条件下进行的动态竞争，总是一种受到控制的斗争：所有行为者冲突性活动的总和，在一定条件下反过来有利于共同体的利益。假如每个人都知悉、接受并遵守游戏规则，或者有一位无所不知、法力无边的仲裁者能够及时干预、顺利地纠正偏差，那么，这种情况就可同志愿合作的有效模式相提并论。不用说，这种条件从来不曾具备过。

在所有垄断性竞争的制度中，冲突这种要素是明显的；在经济力学的领域内，在某种已知条件下，可以证明这种冲突的结果是有益于社会的。

3．采用更广泛的观点，我们看到，在任何社会中，个人之间竞争性的交往所以能持续进行，都是由于一种就构造它所使用的资源和它所提供的服务而言属于集体性质的基础结构。而且，这种竞争性的交往，总是按照某些规则、在某个组织的框架内进行的。市场是靠流通和价格把假定是独立的经济单位和行为

者联系起来的网络，它产生于这种组织，并由于这种组织的存在而发挥作用，只有参照前市场情境和后市场情境，才能描述并理解它。前市场情境是指形成并以一种特殊方式制约市场的各种因素；后市场情境是指市场遗留的后果和它对社会生活的影响。W·罗普克重视供给与需求问题是完全有道理的，而且，由于他是公开声称的自由主义者，其态度堪为典范。

4．在一个彻底按支付能力法则发挥作用的市场系统中，无支付能力者不得生存。但在现代社会里，无需受益者付出直接等价物的各种形式的援助（赠与物、转让物）和各种不同的赋税（税收），总能使这种严酷性有所缓和。因此，商品交易是在某种社会转让和财物转让的结构内进行的，这种结构决定了它的条件、规模和影响。在这一方面，每一种可观察的经济都是合成的[①]，市场交易的内容和后果不可能通过在根据价格计算出价值后，平衡售出商品的方式作出正确评价。

复杂的现代系统内的经济竞争是在与国家之间、社会集团之间的竞争的共生关系中存在的。那些顽固地企图使经济和社会领域均质化，并打算用简单的或复杂的数学公式控制其发展的人们，已经一败涂地了，这主要是因为世界本来就是异质的。

世界是由许多成分决定的：个人、有构子群、被描述为“工业”的经济活动的子群、国家和“国家集团”。

5．结构这个概念[②]招来一些经济学家的反感，这些人视经济

① 弗朗索瓦·佩鲁：《经济与社会——强制交易和赠予》，1960年第1版，巴黎，法兰西大学出版社；“馈赠：它在现代资本主义中的经济意义”，第欧根尼，（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54年4月第6期，第3-26页。

② 弗朗索瓦·佩鲁：“经济结构的概念”，M·拜艾思，《资本的形成和法国的重建》一书序言，经济研究中心，1952年；《结构经济学》，*CISMEA*，M系统，1952年12月第6期，《经济结构》、《现代经济概念》，科学书籍出版社，1973年，达姆施塔特。“结构主义、经济模式、经济结构”，EA，1971年5月，第24卷，第3期。

为一种均质的形态，许多分子在价格的作用下于其中到处游动。然而，对任何现实主义的研究或合理的政策来说，都有必要把经济看成是一种在某一既定时刻或某一短时期内存在的各种成分的结合体，并有必要牢记，与函数变量相对的某些结构变量反映的是比前者缓慢、不如前者频繁和广泛的变化。由于一方面存在着因其物理结构和不可避免的不可分性而被固定的资本，另一方面又存在着具有等级意识和惯性倾向的各种组织，而且这两种特征总是结合在一起的。因而可以说，任何一种现时代的经济都只能呈现出在价格或外生性变化影响下的极为有限的可塑性。

从结构概念可以引伸出：

结构偏爱的概念和结构优势的概念。前者是根据其利益讲话的人口集团和（或）人们所表示的偏爱；后者指的是在中期和长期内一个结构对另一个结构的优势，它包括一个公司对另一个公司、一个行业对另一个行业、一个地域对另一个地域、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优势。

社会结构以及社会集团的结构是由许多种社会角色和支配社会生活的规则形成的。

6．决策人员建构每一结构并使这些结构内在联系起来，但这些决策者彼此之间很少以完善的、连续性的方式保持一致，这就造成了“交叉”，换言之，造成了冲突。

因此任何社会中都将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权力，可以看到这种权力以一种使对立的各方之间的冲突转向有利于人口整体的方式发挥着各种各样的作用。

对权力的各个方面进行研究，尤其是对刚刚提及的那个方面进行研究，是今日广泛流行的那种新古典主义分析最为薄弱的环

节之一。尽管如此，我们如要把握发达和不发达的充分含意，仍然必须经过各种新途径积极开展这种研究。

7．在一个本身就有结构的整体的各个有构部分或亚群体之中，发展是通过有构群体之间的动态冲突，即与“纯”辩证法规律相反的作用和反作用而辩证地发生的，这种作用和反作用并不会导致一个亚群体毁灭另一亚群体，而是在动态不平衡条件下把二者改造成一种新的结构，这种新结构是两种原初结构冲突的结果。经过验证之后，这种看法对于描述和解释发展似乎至关重要，可以在无数方面把它应用于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

上面，我们对许多在前人著作中讨论过的概念和研究的一种趋势进行了扼要的评述。这种简要的复述是下面分析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导言。

增　　长

我们所谈的增长①是指某一单位（通常指一个国家）以相对于居民人数的国民生产总值（即在考虑到贬值的情况下一定时期内产出的商品和服务总量）来表示的规模扩大。如果在考察短时期时，我们用“扩大”这个词；如果在考察某一较长时期（如实行四个以上五年计划所需的时间）时，我们则用“增长”这个词。

规模持续增长这个概念是有用的，但很笼统；它之所以成功就在于它相当简单，容易用一个数字来表示——但往往造成很大

---

① 西蒙·库兹涅茨：《国民收人及其构成、现代经济增长》，1966年；《各国的经济增长》，1971年；《经济增长与结构》，W·W·诺顿，1965年；弗朗索瓦·佩鲁：《增长理论资料》，CISMEA，1978年，6-7月，《科林·克拉克的协调增长论》，邦克，1949年；《增长、发展、人类进步》，格兰德·拉罗西，1970年；冈纳·米尔达：《反潮流：经济学批评论文集》，伦敦，麦克米兰，1974年。

错觉。各国经常用与同期其他国家相比的经济增长率来宣布其经济政策目标，这很方便，但也可能造成惊人的混乱。

由于西蒙·库兹尼茨进行了世界范围的统计研究，因而我们现在可以认识到对增长进行定量测度的种种缺点。这些缺点是由于统计资料本身和国家会计核算程序而造成的。尽管有丰富的统计资料，但没有一位专家否认我们在生产和分配这个关键领域内对过去和今天所能得到的数据信息是不充分的。

种种不能回答的问题正好是为了进行当前研究而提出的问题，因为这种研究适合于搞清楚发展中国家的演变。这并不令人吃惊，统计资料是为了同增长研究完全不同的眼前目的而收集起来的；这些资料妨碍描述性和分析性的研究，要使它们真正具有意义并且容易驾驭，不得不经过彻底的审查，而这是一项耗时持久、代价颇高的工作。

对于研究与开发规划，以及这一规划通过革新和传播而对教育和职业培训、对污染和其他公害、对增长率和人口群体质变的联系的影响，我们始终没有在思想上作好充分的准备，进行严格的和定量的评估。

增长伴之以各种结构变化，这一点已为人们所认识：根本不存在均质的增长和那种空间均匀分布的增长。但是，该整体内各部分之间在比例和关系方面的变化却表现为各生产“部门”或“机构”的即时故障，而且在地域方面这种变化还几乎没有显示出来，以至只能以一种非常间接的方式验证一个亚群体对另一亚群体施以拉力的假设。当一位第一流的统计学家在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和一些重要的集计概念——投资、消费、储蓄等的增长之间确立了一种平行关系时，有充分理由怀疑他正在干的事情是否真的不仅仅是迈向因果分析的第一步，不论他的大作以什么为标题。

为满足高度发达的统计研究的需要而进行的努力受到了国民

帐户及其统计处理中各种缺点的阻碍。例如，在固定收益条件下把假设是均质的两个因素量(劳动、资本)联系起来的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P=T^{a}K^{1-a}$）就容易受到批评，因为，它除了严重的固有缺陷外，还对占发达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约40%至60%的部分不加考虑；这个未经考察的部分不应同技术进步的概念混淆，它在理论上包括资源的最佳分期分配、生产的最佳质量因素，行为者的学习和不断变化的革新形式。

为估价在这个领域中一个部门（Ⅰ）对另一个部门（Ⅱ）的影响，我们需要使用两个函数，例如，对数式：

$$P_{1}=aT_{1}+bK_{1}+R_{1} \quad (1)$$

$$P_{Ⅱ}=F(cT_{Ⅱ}+dK_{Ⅱ}+R_{Ⅱ}) \quad (2)$$

我们由此可以假设：

$$R_{Ⅱ}=f(R_{1})$$

作为因果分析的出发点，或作为其他一些能够表明由Ⅰ在Ⅱ中产生的劳动生产率的表达方式。虽然观察和经验已揭示了这种联系的存在和它的重要性，但到目前为止我们尚无详细的阐述以及对这类联系的统计学检验。

在汇集统计记录和分项数字的实践中，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我们在“国民”生产额内划分摆脱国家控制的活动团体和依赖国家当局决策的活动团体。并不是每一种所谓“国民的”东西都受一个国家的“国民”控制，而且，今天直接投资的扩大、跨国公司、技术转让连同专业人员的转让，也常常在显著地扩大这种差异，无论在我们涉及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时，还是涉及到在规模和实力方面不相等的两个发达国家间的现存关系时，都是如此，这就是因缺乏有关数据而无法评估的国际贸易关系最重要的一个特征。

这方面的首席专家西蒙·库兹尼茨真心诚意地写道，对经济增

长的研究已取得一系列初步成果，这些成果既是经验的又是分析的。他说，在对经济增长及其结构进行充分评价的漫长道路上，我们才刚刚起步。多年前，在庆祝哥伦比亚大学成立200周年而举行的一次讨论会上，西蒙·库兹尼茨对一位坚持认为需要分部门研究并对发展的中心或极点进行分析的作者答复说，他赞成这种观点，但觉得从研究全球问题入手似乎更合人意。总的说来，这两种观点并不矛盾。

经济学家们根据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数据曾草拟出几种宏观经济增长的模型（E·多玛尔、R·F·哈罗德、R·索洛、J·R·希克斯），这些模型都用静态的方式，参照产出曲线、储蓄曲线和投资曲线，描述了出现平衡增长的点，这个点位于储蓄曲线和投资曲线的交汇处。据说这种平衡是稳定的，尽管这些模型并未确切地论证以利率变动或流量调节矫正某种不平衡状态的自发必然性，当然也不曾考虑到分部门分析和储蓄与投资的结构化引起的“并发症”。

通过把增长同行为者、他们的期望以及他们在接受信息方面的不平衡联系起来的方法而对收入（结构）进行部门分析，也能使增长更加明白易懂。而在部门分析仅以主要的宏观经济集计概念为形式来表现的模式中，它只是对这些模式中一种更有意义的分类有帮助。

值得注意的是，稍加分析就可以证明，在理论研究中被定义和使用的在过去30年前正规化了的这个增长概念，对于制定一个适用于发展中国家或被发展中国家采用的经济政策，总的来说并不是个坚实的基础。这一概念出于建立模式的需要而选择和突出的经济现象方面，如果脱离其他方面而孤立存在，就会同为富国制定一项战略的任务毫无相干，更不要说为穷国制定战略了。

增长的目的是什么？当前目标是什么？在什么条件下增长

是有益的？增长是为什么人的？只是为国际社会中的某些人，还是为所有人？如果我们在讨论为建构模型而假设是均质的那些集计概念时，我们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怎样才能有现实意义呢？

诸如此类的问题是发展中国家现在提出的各种要求的根本所在，但也必须明确地认识到，任何关心有效模型和实际政策的人也不得不正视这些问题。

这是一些把人类、个人、活动者引入客体和物质世界的问题，这里，人不是作为市场的奴隶和被迫接受现行价格体系的生产者和消费者，而是有能力通过精心规划和组织为改变其环境这一目的而从事各种活动的真正的人及其群体。产品总额的增长，如果使自然资源的状况恶化甚至毁灭自然资源的话，就会造成竭泽而渔的结果，这是今日尽人皆知的常识。我们知道，危害人或毁灭人的可能性，不在这一增长率的考虑范围之列，因为它对于用形象语言描述为人类资本贬值的问题漠不关心。但我们至今仍不愿承认，现行的增长理论和分析，无论有什么优点，实际上都是由那些忽视甚至排除活动者及其活动的经济学家提出来的。

从这一观点出发，可以把一种增长机制视为瓦尔拉—帕累托普遍均衡机制的复制品，下面我们就要讨论这个问题。

（国民）生产总值①绝不是一个只有纯粹分析意义的量，它是一个经验的和统计的集计概念，表示国民经济在某一既定时期内的商品总量。商品总量是各类不同商品的价格之和，它不能以任何其他方式表示。但这不是个严格的计算方法，因为在一切情况下，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价格体系在各种不同的机构、部门和地区中发生着广泛的变化。于是，把严格说来已不再是可

① 弗朗索瓦·佩鲁（与P·尤里和珍妮·马克佐斯基）：《国民收入、预算及其意义》，巴黎，法兰西大学出版社，1947年；《国家的帐目》，巴黎，法兰西大学出版社，1949年。

以相加的各类商品相加而得到的总量以及由此而得出的整体的增长率，仅是一种粗略的概算，充其量不过反映了分析的第一阶段。这种总量及其增长本身就是一些模糊概念，涉及有关各方的数目或人口的多少，即就人均产值（收入）所提供的数字，并不能消除这种模糊性。

V·帕累托在纯粹的和静态的经济理论中，用中性的曲线去确定两种商品（或一种商品与货币）之间的数量关系，这样一来，似乎就没有必要从直接参照人类、个人入手了；两类商品（两种具有附加价值或不具有附加价值的物品）之间进行比较的结果和它们之间可能出现的平衡，取代了人类和个人。无论在任何场合，这种做法的有效性都不可能得到经验的验证。

在发展中国家里使用这种做法时，显得非常滑稽，它暗含的意思是：商品之间或商品与货币之间的关系排除了在进行"初步概算"阶段把人包括在分析领域内的需要。

也正是根据一种类似的做法，有人出具如下报告：孟加拉的增长或人均增长完全与联邦德国的相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的增长或人均增长与法国的完全相同。

必须认识到，我们现阶段尚未涉及对各国进行统计比较的各种困难。我们是在一个更根本的层次上对概念本身提出疑问，并认为其内容本身就不合适。作为某种特定经济中商品（或被作为商品考虑的物品）总产量的总额，在市场尚未存在或市场的构成要素尚未以一种惯常的、有规律的方式发挥作用时，是没有现实意义的。就定义来说，求助于影子价格只能是一时的权宜之计。

总产品是统计学家相对于总投资、总消费这类"部件"而设置的、能够使某种增长机制及所谓自我增长机制得以形成并具体化的一个"部件"。

总产品使用的是在国民会计中应用的方程式：产品（收入）

＝消费＋投资；产品（收入）＝消费＋储蓄，并在某种均衡状况下，投资＝或═储蓄。

由此可以推出目前已是常识的下列等式：产品（收入）增长率（g_1）等于人口增长率（h）加劳动生产率增长率（pr）；或：产品（收入）增长率（g_2）等于储蓄增长率(假定等于投资)（e）除以资本的反系数（K）；或：产品（收入）增长率(g_3)等于劳动（T）和资本（K）各占规定比例的增长率加表示技术和组织（r）改进效应的系数。

这就是对各种平均增长模型代数式表达的基础，这些模型都是在国民会计的集计概念与一种被简化为示性子集计概念之间的等式的均衡观念相结合时产生的。

总之，目前足以说明，无论是就其本身考虑还是把它等同于储蓄，投资通常被作为动因子集计概念。从事投资的动因不是投资者而是投资。同样，进行储蓄的动因不是储蓄者而是储蓄；挣工资的动因不是工资收入者而是工资。为了形成持续的平衡，要调整这些子群、部件彼此之间的关系，并使它们在一个平衡点上彼此相容和相等。未达到这一点，储蓄大于投资；超过这一点，投资大于储蓄。对于行为者的态度、他们的志向和对特定情境作出反应的能力，这种表述由于它所选择的各种变量，根本不能告诉我们任何东西。实际上，这种平衡的稳定性是通过一种在发现两个量不相等时，即投入运转的机械过程而实现的。

在发展中国家，根据这种机制会产生有益效应的假说而对其存在持默认态度所造成的后果，比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制度中要严重得多。发展中国家仿佛是通过放大镜向我们表明，我们应当尽力改进人口的生产和创造能力，从而使人们的生活标准持续提高，而不是为他们现在或将来的均衡局面安装某种机制或强加某种蓝图。

发　　展①

发展的前提是人们之间以商品和服务、信息和符号为形式的交往。

在经济学方面，这一点是通过三个层次来把握的：

1．整体内部各组成部分之间的连结。各组成部分是有机的亚群体：各机构、行业、地区、企业。在价格和流通的特定网络中，在有形材料的转让网络中，或在其意义和价值与物质的基础结构没有可以明确指出的关系的商品转让网络中，每一个子群都有其相对的位置和重要性。这些网络的基础是通常须由社区负担费用的物质通讯系统和智能通讯系统。

2．各不同部门之间直接或间接的作用和相互作用，不是别的，而正是前面所定义的结构辩证法。按照系统分析的语言，我们认为，对作用和反馈需要进行控制。整体的改组或部分的改组是在这一过程期间发生的。在这里，根本不可能有同其他部件（变量）相冲突的部件，也根本不可能设想这些部件能够彼此调整并改变整体，只要指出这一点就足够了，不用再讲为何如此及怎样如此。

引起这种运行方式的正是行为者，即能动的决策人员。人们已认识到，这种运行方式未必能实现发动者的意图，而且事实甚至可能证明它们是同这些意图相矛盾的。因此，经济结构与有机社会中各个群体的精神结构和社会结构有着密切的联系：前者同

---

① 有许多条约，其标题中都包括“发展”这个词，这些条约事实上是试图使静态的增长理论适合于各种发展问题。本杰明·希金斯：《经济发展》修订本，纽约，W·W·诺顿，1968年，弗朗索瓦·佩鲁：“发展是什么？”，《研究》，1961年1月；《二十世纪的经济》，巴黎，法兰西大学出版社，1969年第3版，伊莱亚斯·甘纳格：《经济的发展》，巴黎，法兰西大学出版社，1962年。

后者相互作用。

3．在进化结构中，各种形式的人力资源都有机遇获得效力和能力。由于经济机构和社会机构日益变得强大和复杂，因而它生产出越来越多、越来越精密的经济产品和智能产品。要获取这些产品，需要更有能力更为熟练的行为者。反之，使用者和消费者对数量和质量日益提出更高的要求，其结果之一就是：人被机器所驱使，机器也在一个渐增过程中被人推向前进。

我们刚才谈到的只是机遇而已。的确，这一推进过程可能总是绝对地集中于人口中的某一部分，而最丰富最精致的产品（我们至此并未作出任何价值判断）可能总是那些危及人类生存或有削弱人类体力和智力作用的东西。

关于这种描述的准确性，在发展中国家中发现了不利的证据。发展中国家程度不同地显示出下列特征：①

1．整体内各组成部分之间缺乏联系。运输网络不发达，或者是以仅为某些地区和社区服务的方式集中起来。市场被地方化，并促使非通讯集团形成。封闭的社会、氏族、民族集团的独立主义阻断了和平交易；语言差异是一道更大的屏障。在一个领土实际上分割为许多孤立部分的国家中，即使在一个地区建立一个先进企业或搞一项创新性投资规划，收益增殖效益的利益和新业务活动产生的互补性也不会涉及到其他地区。沿海地区的经济瞩目国外，与内地没有交往。飞地经济是并列的，没有内在联系。

2．这类经济与各发达国家之间的联系只能建立在一种不平

① 弗朗索瓦·佩鲁：《研究不发达状态的三把钥匙：脱白的经济、人们的兴趣和感应发展》，*CISMEA*，*F*系列，1955年第1期，*CISMEA*，1978年6—7月重印；简·廷伯根（合著者）：《重建国际秩序》，纽约，1976年；《第三世界和工业化世界》，巴黎，1978年（为戴格·哈马斯库德方案准备的论文）；J·莱索恩（合著者）：《近期报告》，1979年，（为OECD准备），赫伯特·吉尔舒：《重建世界经济秩序》，论文集，基尔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1976年。

等的基础上，要付出很大努力才能逐步纠正它们的片面性。发达程度较低的经济受其他经济的支配，它们的结构时刻面临着被吞并的危险，并且至少是在某些领域内，存在着一种使支配着商品、服务和信息交换的种种条件被单方面固定下来的趋势。

3．人力资源的浪费。贫困的诸种生理效应最终将使死亡率大大升高，以致很大一部分新生儿在成长为有思想、有生产能力的男人和女人之前夭折。人口中很大一部分甚至绝大多数人都是生理的和精神的低能者。多方面的人力资源没有机会得到充分的利用，也始终没有得到充分的开发。

因此，正象以后我们将更详细地看到的那样，从根本上说，任何发展都在于：

(1) 促进发展中的动态因素，实际上就是人类生活中的动态因素。因为，无论这些因素是诸如家庭和生产单位这类有机的制度，还是诸如财产法、市场控制或分配体制这些标准化的制度，它们都相当于自然的人口统计趋势和人口质量、技术进步的能力——发明和革新以及制度的更新。

(2) 为组织传播有经济效益的效应提供必需的物质设施和信息服务。

大约30年以前，法兰西学派就明确地、毫不含糊地阐述过这些观点及其内涵。看到联合国和教科文组织这类机构实际上接受了这种观点，而且在许多重要国际文件中也阐述了这种观点，确实令人感到鼓舞。

在一份题为《重建国际秩序》的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到对增长与发展之间、和谐的增长与不同程度上自发平衡的增长之间的区别所作的明确论述。它对各种结构、不平衡以及国际贸易中占

支配地位的形式都进行了分析。它考虑到了能源现象，同样也注意到了经济的紊乱性质和人类真正生活费用不适当的范围。人力资源作为所有资源中最可宝贵的东西受到赞颂。是否有理由指望官方经济学的拥护者将会采用这些长久以来一直被他们视为异端邪说、离经叛道之论而遭拒绝的思想呢？

此外，一份为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准备的有趣的《近期贸易报告》也证明了向同一方向发展的趋势，因为这份文件是为经济目的而写的，所以它更有意思。该报告称："市场是一极好的资源分配机制，但在实际中有关市场的某些理论规定并未得到充分的实现。"市场如果受"统治力量"和"改变各种不同商品与服务的比价"政策的干预，就会起一种恶劣的作用。市场绝不会保证实现"可为各国内部或国家之间共同接受的收益分配。"因此，就需要对分配增殖价值或增大产量的可能性进行对话，并对贸易收益问题组织适当形式的讨论。

更重要的是，各种文化价值"在经济增长中起着根本性的作用"，经济增长不过是手段而已。各种文化价值是抑制和加速增长的动机的基础，并且决定着增长作为一种目标的合理性。

由各种不同思想流派所促成的这一运动，不仅消灭了"经济主义"，批评的矛头也直指那种狭隘的经济体系，这种体系是以市场机制取代行为者的活动和决策。

研究发展问题，就意味着要求人们注意无发展增长所具有的危险。当经济活动集中于外国公司的分支机构或重大的公共事业，而且并未产生全国范围的效果时，在发展中国家里显然存在着这种危险。即使在发达国家里，我们也会看到，在增长取得进展时，就地域而言，发展利益的分布也是不平衡的，因为相对来说，"空白"地区总是存在；而且就社会而言，利益的分布也不平衡，因为"贫困层"从未消失过。

这些还只是无发展增长的外部标志，当我们就行为者的多方面能力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关注这一点来考虑无发展增长的结果时，我们就能够更深刻地洞察其意义。

至于无增长发展，这在几年前出乎意料地在欧洲风靡一时的那个肤浅而有害的口号"零增长"中，以一种抽象的方式得到了简明扼要的反映。可以以或多或少简化的形式把对这一问题所作的论证概括如下：如增长达到某一水平就停顿下来，就有可能改变产品和收入的分配结构，人们也愿意这样做。在一个增长率在某一特定时期内总计达到3%前始终保持上升势头的国家里，就有可能改善总产品／收入的分配结构，而无需实现进一步的增长。更具体一些，我们还可以加上下述说法：这种改善将被视为在部门工资依然处于现有水平的情况下国民收入中工资份额的增长；或被视为伴随部门工资变动的国民收入中工资份额的增长；或被视为其它一些诸如此类的东西，即社会转让方面的相对增长。人们承认，除非肯定不会因此造成资源或实际收入的减少，换言之，除非一般物价指数维持在原有水平上，这些方法无一能够行得通、无一值得寄予希望。

这一论断经不起严格的审察。

国民收入中工资相对份额的增长，必然造成利润份额从而投资份额的相应减少，因为就广义理解的投资份额是由总利润提供资金并根据预期利润的财力进行安排的。因此，继续保持以前的增长率是不可能的。使部门工资维持在现有水平的指望也不很大。假如一种高明的方法成功地以这样一种方式重新分配了工资，以至它们都更接近于各自的生产率水平——这种水平已经高到不必再去追求的地步——并且不会使今后不太富裕的人为防止其命运在与别人相比较的意义上进一步恶化而进行反抗，部门的生产率也只是能维持原状。

至于在没有其他变化时出现的社会转让的相对增长，这在通常条件下会造成通货膨胀的结果。

我们还必须强调指出在工业化国家中具有极其重要意义的一点。这些国家之所以发展起来，是由于它们不断对在被认为是有利可图的行业中的投资进行调整。一个时期的投资同另一个时期的投资相联系，在不同部门中的投资增长是相互依托的。要坚持一种在t_0时达到的增长率，就会忘记在那一时刻正在进行的投资是根据生产将随之增加、各种成分将相应变化的假设而在t_{-1}、t_{-2}等时刻作出的。这里所批评的政策将会取消具有最牢靠基础的预测，并导致具有多重结果的损失。对一种动态经济的结构调整主要是利用在增长过程期间逐渐发现的新劳动和新资源来进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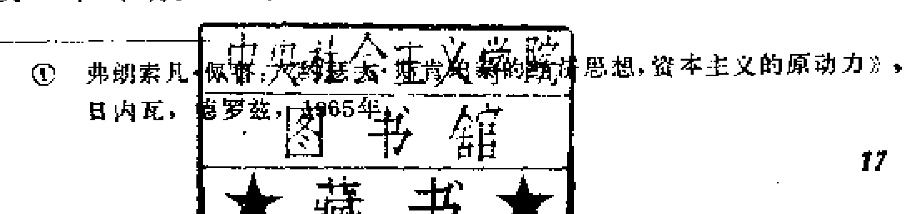
与零增长无矛盾的只是那种极不平衡和浪费极大的发展。这个口号反映的不过是某些经济学家在面临大量社会需求时的困惑：它时髦也快，过时也快。为了说明无发展增长虽是一种可见的现象，但无增长发展幸亏从来都不过是一种无根据的假设，我们曾作过简要的评论，这一评论无疑也适合于零增长。没有生产相应增长的资源再分配必然造成一种愈来愈大的损失，而且这种损失还有降低已达到的增长率的作用。

现在我们来分析发展过程的一个实质特征，以便认识到发展是行为者在不可逆的时间中进行的相互作用。就这点而论，发展过程是全新的。变化波及到每个行为者、他们之间的关系、生产与交换的机制以及这些机制同使用者之间的关系。

同一般均衡一样，静态循环模型① 也是个纯粹的假设，按照这种模型，商品和货币分毫不差地沿着同样的途径从一个时期过渡到另一个时期。仅就这一模型只有助于理解客体、事物，而没

---

① 弗朗索瓦·佩鲁：《约瑟夫·熊彼特的经济思想，资本主义的原动力》，日内瓦，德罗兹，1965年。



有密切关注人这点而论，它就是似是而非的。只要一种变化届时必然发生，只要行为者本身有所变化，他们对其以往经验的理解、他们的记忆和对其规划的看法，就不可能原封不动。一个不随光阴流逝而变化的人，只能是个抽象的概念，应把这种概念从现实中清除出去，而且应比抛弃永不磨损永不腐烂的客体概念更加坚决。不可逆的时光使万物更新：当新事物不利于行为者或令他失望时，它们至少会驱使或刺激行为者，行为者不是使自己适应新事物，就是相应发明一种新战略以改造自己的环境。这些新的趋势，依据经济的复杂程度和在社会等级制度中居于不同位置的人们的能力，在或大或小的规模上引起各种变化。就经济学而言，这些变化正是那些鼓吹均衡和静止状态的理论家们曾极力置之不顾的，因为他们总是不能把这些变化完全纳入到他们以数学语言表达并使之形式化的过分简单的模式中去。

在各种易于观察的社会的经济体系中，行为者在财富、文化和政治的等级结构中的相对位置是在较长时期内发生变化的。我们在任何社会中都能观察到——暂不谈各种价值判断、各社会集团间的冲突——合作关系是不断变化的。而且各种规范准则从人口整体观点出发证明是富有成效的、相对中立的或相当有害的诸种要求、抗议、联盟、联合，也处于不断变化之中。

对各类社区不计其数的观察和研究表明，物质利益绝不是造成社会冲突的唯一动因。正在为其个性和尊严、为获得该社区的尊敬、为赢得社会对其职业的重视而奋斗的人们决定着这些冲突是否发生，或是这些冲突是否得到大肆渲染。在工业化国家中，由于这些人对社会运行方式有某种体验，因而他们尽力使社会竞争规则俯就于他们的利益。

即使是经济分析，也不得不同作为理性和道德实体的人发生关系。为简明扼要起见，为避免在此时涉及哲学的思维训练，我

们可以说，这种分析与人有关，而人所希冀满足的绝不仅仅是基本需要。在语言或非语言的交流系统中，人通过摹拟、模仿的支持或反对、交谈、以及个人与群体之间其它形式的对话，表达他们的思想。言谈话语具有某种意义和影响：它们反映着种种对象和活动，赋予这些对象和活动以某种感情色彩；对其所表达的东西，言语总是有意或无意地传递某种带有偏见的观念。经济体系总是沉浸于文化环境的汪洋大海之中，在这种文化环境里，每个人都遵守自己所属群体的规则、习俗和行为模式，尽管未必完全为这些东西所决定。意义比较明确的价值使某些目标处于相对优先的位置，对这些目标的追求，激励着每一个人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但是，他们也可能提出反对意见，采取阻挠行动，抵制这种发展。这就是群体发展的辩证过程，这就是历史表明永无止境的个人人格发展的辩证过程。

振兴、进步与进步的社会[1]

结构的辩证法是在各地区、各经济活动集团和各类社会之间不平等的条件下发挥作用的。其所以如此，是由于具有不同技能和资源的行为者和决策者之间的不平等，同样也是由于各种推进效应及其发生的环境。

经济空间和社会空间不是均质的，而且也不存在它们正趋于均质的迹象。因此，我们在历史中找不出均匀分布的增长或发展的实例。

发达国家是如此；在某些特殊条件下，发展中国家也是如

---

① 弗朗索瓦·佩鲁，“经济发展的一般理论”，*CISMEA*，第1卷和第2卷；《经济的发展与发展的经济观点的区别》，为罗马统计研究所C·吉尼教授的专题论文集所写的祝辞，1957年；“当代经济学中的人类进步观点”，法国百科全书，第9卷：《经济和社会的世界》，拉鲁斯，1960年。

此。当初，由于在土地所有权、累积资产和教育水准方面存在显著的不平等，各封建制度到处都是大同小异；在社会上层人士和无知且受压迫的大众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社会鸿沟。

在各种资本主义企业自我确立时，它们正是充分利用了它们在该系统中对于其他成分的优势。随着资本主义企业的发展，它们便把富人和权贵拉进自己的利益范围和势力范围，使他们脱离本国人民，为他们提供赚钱的机会和西方的生活方式。

发展的不平衡带来了结果的不平衡，即振兴的不平衡。

在某一既定系统中——例如，在一个经济系统中——振兴将采取增加和改善社会子群所得实际收入的形式。这种振兴曾向着有关人士深信是值得追求的方向前进，现在应当由有资格的、公正无私的观察家们根据各种经济的、社会的和文化的指标，对这种振兴进行评价。既然各方面的振兴不可能也决不能朝着并行的、彼此分离的方向前进，因为这些方向总是互相依存的，那么，把它们在一个进化结构中结合起来的方式就是决定性的了。由于假定是至高无上的平等本身就不是个十分明确的定义，所以我们应当说，进步就在于使某一结构内不同方面的振兴得以大大扩展，在这种结构中，一种最为适宜的不平等状态由于进步的经济和社会效果而趋向于稳定。

既然没有社会、没有组织就不存在着市场，那么从经济振兴向经济进步的转变，就要以安全和自由、培训和教育等条件的存在为前提，这样，它们便属于社会和政治范畴了。人们也许会欣然接受其中包含的种种变化，因为这些变化估计会带来的结果可能会博得广泛的支持。就理想状态而言，经济振兴的一般扩展应同人们日益深刻地意识到其意义所在的过程同步。

这里不需要任何耸人听闻之论，我们只应当指出，作为一系列目标和成就来考虑的进步是一项伟大事业。随着19世纪科学、

技术和基础教育唤起的热情，人们持有这样一种观点：进步是一种“带来幸运的必然性”和一种自我维持和积累的过程。经验则证明了恰恰相反的东西：进步取决于永不衰竭的创造能力、严格而细致的管理和坚韧不拔的毅力。正如不存在自我维持的增长一样，也不存在自我维持的进步。

而且，没有任何一种经济或政治制度能自称有进步或振兴的专利权，或证明自己的法则能保证进步。事实上，进步不是各种机制的运行造成的，它发生于各种活动和相反活动的过程中，发生于人类行为者彼此冲突的评价中。能给发展中国家带来进步的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无论这些主义作了怎样的修改和纠正，成就这一伟业的唯一希望在于把自己的制度提供给当地人民的开明实用主义者所作的努力。

进步与**进步的社会**紧密相关。西方目前向外推销的流行模式可能包含这样一些因素，即适合于发展中国家里的精英集团和个人正确地和创造性地进行模仿的因素。无论如何，接受这种模式和重新建立一种模式的决定以及由此产生的种种结果，完全是他们自己的事情。

进步的社会有助于消除随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遭受野蛮侵害和毁坏而产生的费用，甚至有助于最大限度地降低有关人士所接受的各种限制费用。在经济领域中，这是毫无疑义的。但在社会关系方面怎么样呢？在发展中国家里，等级制的和权威制的政体，无论是在传统社会中还是在年轻的民主社会中，都在竭尽全力斗争，以解决因长期玩忽职守所造成的并因当地文化和输入文化之间的冲突所恶化的种种特殊困难。如这些矛盾根深蒂固，只能逐步克服时，恢复到正常状态就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一个完全由自发产生的凝聚力维系在一起的社会和自律，是一些在任何大规模人类共同体中都不能找到类似物的模型。

在一个正实行内部改革以便打入世界经济圈的发展中国家里，为要顺利地由传统等级制经过一种过渡形式而走向一种新的等级制，必须作出真心诚意和艰苦卓绝的努力，向着新的方向发展传统文化价值。当然，在我看来，制定新的标准并找到使旧价值观念更新但同时又不是歪曲它们的新手段的需要，是发展的关键问题，在这方面达到的程度是衡量发展是否完满、是否取得持续成功的试金石。

在当地文化能够根据发展中国家自己的倡导、同化并复制这一进步社会模式的范围内，这个模式可以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进行创造性解释的种种机会，条件是满足下列三个要求：

1.在一个漫长的时期内，发展中国家必须就生活条件、文化和政治意志的锻炼提高个人和群体的标准（社会前进的条件）；

2.它必须始终使特殊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向着最佳一般结构的方向发展，以促进该共同体内每个个别成员的个性全面发展（良好结构的条件）；

3.一旦具备了这两个先决条件，它必须尽可能迅速地促使革新和投资的收益、科学知识和艺术创造性在整个人口中普及。

我们现在需要在表1.1中扼要复述以上论述的主要成果。表1.1表明，不能把个性发展简化为经济发展公式这样一个认识，怎样变成了国家发展中的一种动力。

表1.1

领域	典型形式	历时顺序	标准
	增长	规模的扩大	平均收入上升
经济发展	发展	结构的辩证法	最适结构
定量化和成本计算	振兴	参与者的利益	参与者利益的增长
	进步	收益的一般扩大	凝聚力
个人的发展价值	志向与观念	价值的应用与活化	等级制度与价值的凝聚力

各种指标

我们已经抛弃了不花气力的简化主义并识别出发展的各个要素，以及这些要素在不可逆的时间过程中对人影响的复杂性和它们多方面的内在关系。

我们利用种种统计记录和指标以定量的方式把握发展：应当记住，指标本身既不是对某个对象的说明，也不是个准确又现成的评价工具。

如果我们研究一下指标的漫长历史和这个历史还不能令人满意的结果，指标的作用及其局限就会变得更清楚了。

"围绕"增长提出的各种指标[①]

建立、审察和使用与增长有关的指标，经历了从单一数字到系统的数量参照系的曲线，这是值得注意的。

原始指标：实际人均产量。起初，这个指标是按人口平均的实际总产量(收入)，当实际应用这一指标时，它的缺陷就暴露出来。

分子的缩小，只有在它是均质的，也就是说，只有在它真实地反映了包含在分子中的商品和服务的各种价格，并且只有在它经过适当加权，即只有在考虑到总生产和总消费的特殊数量比例时，才是非常准确的。

在考虑建立指标的这些困难时，还应加上些与该指标的意义有关的东西，这涉及到生产和消费。总消费和净投资表现在分子上。撇开计算贬值的复杂问题不说，净投资包括生产资料的增加和对外帐户的净差额。此外，它还表示从投放追加生产资料直至获得

① 关于第1章这一部分的所有文献目录，请参阅弗朗索瓦·佩鲁的"经济发展的一般理论"，同上，第1卷。

最终产品为止这整个时期内用以增加最终产品的资源的净增额。实际投资数额包括事后，即在收缩和清理之后将证明是没有保证的年度投资。周期持续时间的不确定总是妨碍着消除周期性波动。

绝不能忘掉这里所考察的经济的结构。在具有二元（多元）结构的发展中国家，外资被自动计入实际产品的增长。

而且，这一增长反映的纯粹是外贸关系方面周期性的改善，所以，看来有必要考虑到生产能力和长期生产，以此来对该指标作出调整。

还应指出，因为这个指标系平均数，因而它无视收入分配模式以及这种模式随时间流逝而发生的变化。至于对利润和工资的分项数字或者不同部门、不同地区之间的分项数字，平均增长更是什么也没有告诉我们。如果统计资料是有效的，以劳伦斯曲线集中区的次序为基础进行的调整，也只不过表明增加或减少的比率不相等。

生活标准和生活费用平衡。为获取更多关于增长对人口的影响的信息，人们曾将注意力集中在与消费、生活标准或总生活费用平衡方面。

生活的标准这个复合观念可以分为以下三个要素：

生活的“内容”：按照性质和成份规定的、个人或群体在某一既定时间内使用的商品和服务（家庭预算的分类细目）。

为生活“内容”制定的各种标准：个人或群体认为在正常条件下应归他们所有的商品总量，或者某个专家认为在某种规定条件下是最低限度、最高限度或适中的商品总量。

生活的标准：就这个词的严格意义而言，它表明按照有关人士或有资格的观察者所确立的生活“内容”或生活的目标“内容”这种尺度来衡量所达到的水准。

作如上区别，就使我们涉及到对我们进行分析的统计手段及其长期内容来说往往很难理解的结构：这种结构把我们带入发展过程的现实之中，也就是说，把我们带入客体（产品）与人类的关系之中。

对于总生活费用平衡也可以做同样的理解，而这种平衡是以完全不同的方法达到的。

建立这种平衡的方法是列出转换为能量（卡路里）的食品总量（联合王国联合食品委员会，1943年）。把这一方法推广运用到其他能以物理单位衡量的基本要素上去，原则上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可以用这种方式建立起一整套不带偏见的数据资料，它比从市场获得的数据含有更多的信息量，因而可以成为经济分析的出发点。

生产率。对与生产能力有关的各种统计指标的范围和局限也可作类似的评论，这类指标同经济学中的生产能力概念毫无关系。

只有在参照严格而明确限定的经济和社会环境时，确定有形产品和为取得有形产品而直接使用的劳动量之间的关系（例如，确定每个倒班工人在一定单位时间内采掘煤炭的出吨数）才可能是有意义的。在一切国家中都必须具备这种条件，但在发展中国家尤为必要，因为在这里，企业家的权力和工资收入者的权力之间存在的不平等特别显著。

另一方面，以直接用于生产的工时数除增殖价值总额这种方式计算生产率，其实就是要提出对利润（和工资）形成条件的分析问题。统计资料表明的、以价值为形式的生产率的提高，可以归因于某项垄断政策或一种认可失业的战略，因为这种战略并不一定使价值增殖出现成比例的下降。

所有这些指标都以各种变量的分项数字为基础，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分解为各种要素的综合变量，这些要素的比例只有经过

严格的经济分析才得到说明，仅这一点就足以表明，统计研究怎样同人相关；统计研究只有置于一个有机世界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背景中才是可以理解的。

各种结构指标。第一部类、第二部类、第三部类这种闻名于世的划分是科林·克拉克首先采用的，已为他的模仿者和评论者所采纳，这种划分因其方便而得到广泛承认。但是只要对各部类的内容没有作出认真的定义（和分析），这种划分就依然不可靠，况且在这种划分中，各部类之间的联系至今仍不清楚，也没有作为发展的一种规律而受到检验，因此它还是相当含混的。

就发展中国家而言，靠外国人实现工业化是贯穿其整个经济史的主导因素。正是这些外国人，在获取超额利润的可能性的支配下，选择有利的地方进行直接投资，建立他们的企业。在初期，受到影响的既不是东道国的全部自然资源，也不是他的全部人口。随后，通讯和交通基础结构的建立，不是取决于是否可以得到外资，就是取决于政府的决定。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系统也是由政府的政策决定的。因此，就市场运行而言，发展是外生性的，而且，由于发展要依赖于根基在东道国之外的经济与金融企业和集团的决定，发展同样也是外在的。由于这些企业和集团是根据自己的利益并以私人眼前营利为目的来行事的，因而他们有时愿意在采矿业或能源工业中投资（在拉丁美洲或中东），有时则开办使用精密仪器的劳动相对密集型的制造业（例如，它们在南朝鲜就设置了纺织厂和电子工厂）。

这种在东道国内发动和推进的发展，取决于各种协商力量之间的关系，取决于发展中国家的逐步富强和这些国家的政治意志。

要评价一个国家的总体发展，就有必要依据各种适当指标的有一定意义的分组（国民收入、国民收入分配、就业指标、工作

条件和时间），并留心收集有关的往往被忽略的变量组的准确数据：表示为各种限制因素的费用、社会精英的创造性。

考察各种统计指标，最初是为了理解增长，现在它已远远超出了关于规模的数量问题：我们的注意力已被引向那样一些因素，只有用发展的观念阐明它们，它们才能得到解释。

“社会”指标[①]

把“经济的”和“社会的”加以区别，其基础是一种能在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之间划一条明确界线的假设。

事实上，西方社会的历史始终是趋向于作这种分类的；之所以如此，其原因值得探究。

欧洲（和其他一些地方）的传统社会，基础是扩大家庭内诸成员团结一致的原则，是某种尽其所能为所属成员提供安全设施的中介实体；但是，不应不加批判地接受这种说法。另一方面，现代商业已经使自己逐渐脱离了原始家庭和手工业的背景。其结果便是经济关系的非人格化。在那些曾经以物质财富的雄厚和积累的神话为基础建立其繁荣和强盛的国度内，这种非人格化尤其得到了当代制度辩护士们借效率之名进行的赞美。有利于核心家庭、有利于松弛家族纽带和家族纪律的趋势，曾经促进和加速了这些变化，这些变化都朝着一个明确的方向。

有人说，市场经济能创造剩余产品和收入，它所带来的有益结果最终将惠及整个社会；那些以此为借口来为市场经济辩护的人们，现在已经缓慢地、不情愿地意识到，如果严格使用偿付能

---

① 《发展测度》（发展指标专刊），1972年，4月第8卷，第3期，特别是：南希·巴斯特《发展指标导论》；唐纳德·麦格雷纳罕：《发展指标与发展模型》，第91页；简·德鲁诺斯基：《社会指标与福利测度，对方法论的评论》；珍妮·劳伦兹-赫福、帕斯特尔、奥利维尔、托莱达诺、约莱：《二十世纪的危机》，巴黎，《经济杂志》，1980年。

力的规则，它将冷酷无情地危害儿童、老人、病人和任何因丧失体力和智力而有某种障碍者。在积累资本和财产期间，对人的“消费”给工业资本主义的开端投下了悲剧性的阴影，随着人们对社会实际运行方式的充分认识，这种因素使任何人都不可能掩饰住各国政府宣称的社会福利标准同它们在实践中的阳奉阴违之间日益公开的矛盾。因此，在西方各国内，只要该制度能够承受，就必须以福利和社会保障方案及一般社会转让的形式在国家层次上重新建立安全和团结的网络。

这种发展或者是因反抗而被迫进行的，或者是由宗教和道德（包括国家“道德”）激励起来的，但无论如何，它都没有以任何方式改变偿付能力原则和团结原则之间直至今日也未能解决的冲突，于是，“经济的”和“社会的”这种区分就被那些依靠强大利益集团的支持，为制造一种集体骗局而在最狭隘意义上解释它的理论家们作为借口接过去了。他们无视被臆断为微不足道的差别而草率地认为，社会转让是一种由社会保险捐赠构成的“支出”，它将计入生产和分配的经济成本。工资收入者和社会下层人口集团为自己的利益极力为这类社会保险捐赠辩护，理由是在对工人收入水平的合理估计中，这种捐赠是个基本要素；工资已逐渐被视为工作津贴而不再是劳动产品的等价物；随着政治渗入到工会和罢工活动中这一有增无已的趋势，战斗精神自然而然高昂起来，越来越习以为常。

我们这里涉及的不是那些无可争辩的重要事实，即把根据市场“裁决”进行所谓的资源分配和有前提的收入分配，转变为由公共机构监督的、由有组织的雇主和雇员集团彼此抗衡的某种契约性经济这一事实。现在，工资是由谈判双方的代表讨论决定的，因此已不再直接反映工资领取者的生产能力，相反，过去则假定他们的报酬份额完全是由市场的“中立”活动所决定的。这种转

变看来是无可争议的，特别是因为同抽象的、绝对辩护性的模式相比，市场已被纵横交错的囤积居奇和无所不在的垄断性竞争扭曲了。任何不是生产能力报酬的东西——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它们都难以衡量——都遭到自由的清教徒们的睥睨，他们是营利制度的天然伙伴。

对“经济的”和“社会的”加以区分，这是市场经济运行甚至市场经济结构的实质所在。成问题的是工人和所有那些因身份低下而无法在社会总产品和总收入中享有一定份额的人员在体力上和人格上的完善。

纯粹作为一种例行公事反复重申、一经确定就不再改变的经济和社会之间的区分，这样一种智力上的懒惰习惯掩盖了形势的严峻性。这种区分依当时的权力关系和环境而在内容上有许多变化，并因此而有不同的结果。除极端情况外，在契约的时代，在为促进复兴而要求严格控制生产成本的同时，对劳动的要求变得更为紧迫。政党的策略使这些困难愈加严重。

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事实都将证明各种抽象分配模式于事无补。很少有人意识到，只要不具备理想的竞争条件，各种纯理论的经济体系，不论其趋势如何，在一般均衡状态中，都不会具有分配的标准和尺度。实际上，这些条件不仅是不现实的，而且是极不可能的；它们只涉及到在产品价格和服务价格的驱使下到处移动的相同和相等的分子；它们描绘的是抽象因素的报酬，与活动者、行为者的报酬毫不相干。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西方普遍存在的经济中，我们现在刚刚予以注意的理论的、分析的和哲学的“真空”，已经从一国内部的各社会阶级转移到世界经济范围内各个国家和新兴国家。装备了强大的工业、为社会冲突所驱使的各发达国家正忙于同新独立国家进行聋子式的对话，这些新国家在因剧烈的文化变革和

技术、经济领域中的不平等所造成的困境中，正在为锻造自己的国家而斗争。

各发展中国家显然陷入了特别激烈的内部紧张关系之中，它们认识到自己在世界范围内的斗争中是别人的一笔赌注，这一点更加剧了紧张关系。西方的"社会"模式不可能为它们所应用，因为这种模式是根据不同的发展阶段而创立的，而且创立这种模式的社会，显然同希望对这种模式加以改善的传统社会完全属于不同的类型。

就这点而论，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正在寻求一种方式，以便建立一种政治联盟，使它们能在各国际组织内部作为某种统一战线出现。它们除了纯粹的政治分歧之外，在吸收资本主义的技术、特别是在消化那些它们认为是自己所期待的西方思维习惯方面，具有的能力也极不相同，这从根基上瓦解了它们的凝聚力。在那些最富有的发展中国家里，接受能力是通过上层社会的媒介作用而提高的，但这些人同他们自己人民的关系被割断了，而且这些人非常笨拙和不适当地竭力用同专制制度非常类似的政治高压方法，去弥补他们在全体人口中分配经济收益方面的无能。革命暴力毁灭了当地的资源，并且证明这种暴力的拥护者恰恰没有能力改变支配当地经济同外部经济的关系的条件和国际权力结构。

因此，迫切需要有一些关于实际资源分配和在国际上分配收入及产品的指导原则。

市场机制很不完善而且还受各种垄断集团操纵。既然市场不能行使这种职能，就有必要依靠有能力为共同利益工作、把共同利益置于私人利益之上的组织。人们不厌其烦地说，还不存在一个世界性的国家。但更少有人强调这样一个事实：那些至少可以就制订共同战略达成一致意见的各民族国家，不可能在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中找到指南。同这一术语表示的东西相反，对外贸易

不是被理解为国家之间的贸易，而是被理解为一种产品和服务的交换，这种产品和服务在一定程度上是短缺的，并且直接依赖于遵循世界市场价格规律的生产要素（劳动力、资本和自然资源）的相互调剂和交换。由包括固定收入的生产函数结合在一起的均质因素所构成的画面，并没有描述各个国家，而是排除了以特殊方式决定着国家的一切东西：外在的各种经济和国家，政府间的贸易无视私人的商业交易；作为整体的国家的进化结构没有得到考虑；而且任何公共当局所采取的行动都自然而然受到怀疑，无论在任何场合，它们的出现都被认为是对私营企业的决策令人遗憾的干预。换言之，唯一可能承担起改变竞争规则以有利于国际社会责任的那些实体，恰恰不在研究和分析领域之内。

勿庸置疑，大垄断者们和强大的金融集团操纵了世界市场，它们都程度不同地属于亚当·斯密曾颇有远见地谴责过的"师傅们心照不宣的联合"的复活，但各种推理的经济学却认为唯一值得注意的假设，只不过是那种具有类似规模但不具备操纵价格体系的手段的小私营单位之间的完全竞争的假设。

因此，在国际生活中，用经济的和超经济的之间的区分来尽可能地限制工业国和不发达国家之间出于团结意识而进行的社会转让，丝毫不值得惊讶。这种处理方式，在国与国之间关系的现状方面，比在一国内各部分的关系方面，更加没有道理。

根据上述分析，显然是被"经济的"和"社会的"之间不言而喻的区分所掩盖的冲突，就很容易理解了。这些冲突是：

（1）各工业国内工资收入者和社会下层集团对更可靠的保障的要求，同世界各地濒临饥饿死亡边缘的人们对勉强维持生命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要求之间的冲突。在各工业国内，无论富翁还是小康人家都不愿为远在天涯、罕为人知的那些国家的利益去降低他们自己的生活标准。只有在外贸理论中"被忽略的"国家也

许还能通过教育或其他形式的压力纠正这种对现实的“冷漠”；国家要发挥这种作用，它就必须高瞻远瞩，超越全体选民的要求。

（2）发展中国家里富有者和穷光蛋之间的潜在冲突。前者被网罗到资正主义体系内，后者则在资本主义之外。

（3）发展中国家内部各社会范畴之间的冲突。其中有些范畴迅速富裕起来，另一些却在拼命挣扎，试图摆脱萧条或衰退状态。“社会的”观点向各种制度和结构提出了挑战，它给每个人都留下深刻的印象：需要根本改变关于“经济的”为何物的标准观念，这种观念的狭隘性或多或少是有意识地为某些阶级和国家的特殊利益服务的。这就是当前危机最具有深远意义的方面所在，这是一种社会的危机。

我们现在试图以此为背景来评估各种社会指标所能提供的服务并确定它们的界限。各个国家和国际社会中存在的大量社会指标至今只产生了极其可怜的成果。考虑到参与这一领域工作的研究人员所具有的极高资历和技能，这一点就格外突出。

在一个国家内（我们以法国为例，把它当作一个图解，说明在许多场合都有效的东西），社会指标表现为同商品经济体系的一种妥协，而这个体系的内在逻辑并不受影响。人们假定，资源的适当配置一般是由分散化的经济体系和各种市场力量来保障的，参与者的偏好也被置于同一基础之上。可是，下层社会集团的种种要求与这一歪曲的观念不相符合，因此，就要承认有作出某些细微调整的必要，并且要借助于适当选择的各种指标来表示这些变化的内容和结果。

这些要求的对象就是人们通常熟悉的福利，这种福利是一个模糊而含混不清的实体。进一步考察会表明，人们认为福利出自按现行价格交换的商品量，而现行价格是由前面提到的那种其运行需加矫正的市场决定的。本身是统计学家而又对这个定义不满

意的经济学家们，在设计同"幸福"观念相关的各种精致的组合标准上花费了大量的聪明才智，但尽管他们付出了极大努力，这种东西仍然难以把握。在收集各种数据表格之前，我们必须指出，我们想要特别关注的那些现实本身，往往会从观察者和分析者的眼皮下滑过去。正如读者在稍微思考一下表1.2的内容后将会意识到的那样，不论选择什么指标及指标组合，都有必要作上述保留。表1.2 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构架，它概括地给出了西方国家采用的社会指标的分类情况和初步解释。这些指标随其结构而变化。我们以瑞典为一端，它是社会资本主义或资本社会主义的一个例子；以联合王国为另一端，因为在这里，输出产品和改组工业的需要给自由或有节制地进行社会主义尝试造成了许多困难；处于这两端之间的是联邦德国，在这里，强大的工业和工会的克制态度造成了有利的环境，联邦德国早就有了社会资本主义和社会自由主义的经验。这一切归根结底表明，一个国家的社会气氛限定着指标所标示的所有社会现象，当这一限定过程的影响遍及整个社会时，它就会对大多数指标组合和加权的定量化运算提出挑战。

人们不会忘记，自从《联合国报告》（1954年、1963年）和《社会统计学纲要》（1963－1968年）出版以来，在国际范围内已进行了大规模的工作。

《国际贸易和发展统计手册》（1979年）包括下列图表：

基本指标（人口增长和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综合数据和各种结构，工农业生产的增长，生产水平和增长率，主要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和就业，各地区和各部门的能源消耗）。

经济的和社会的指标（动态人口统计，经济自立人口，在卫生、旅游业和国内交通邮电方面的公共开支）。

汇集在一起的这些数字中显然缺乏内在的联系。各类公共支出是同与下层社会人口相关的各种指标并列列出的。

表1.2　　社会指标的分类

按照内容
－社会和人口统计科目
－社会统计
－按照领域：住宅、卫生、研究
－按照社会群体：老人、“年轻人”、移民
－按照范围：
总体（全国）规划
部门规划
按照用途
－描述的
－规范的
＝目标的意图
＝对限制的说明
按照列入的方法
－辅助帐目
－计划－方案－预算系统
－社会报表
－社会平衡表

如果某个纲要涉及到贫困、失业、不平等问题时，它就是在处理各种难题，因而大量的数字并不能消除读者对必须加以认识的现实所产生的模糊认识。如果进行分析的方法和收集大量数据的技术以同一速度得到改善，还有理由感到乐观，但这里肯定不是这种情况。

指标会给人以一种假象，仿佛它在价值方面是中立的。然而，指标与之有关的那些事实都是社会现实，在任何有组织的社会中，它们的内容都是规范的。我们如果意识到情况确实如此，那就必须承认，除开那些观察者也许希望用某种价值判断加以突出的规范不算，无论明显与否，各种指标都是规范的，甚至早在因使用

方式而使它们成为规范的之前，它们就由于其主体而成为规范的了。这一事实已被各种社会指标所证实：如果在某一特定社区中不存在各种规范的生活条件，单凭市场和资本主义的自发作用是绝不会创造出满意的替代物来的。这一发现不仅仅是个浅显的常识，它还意味着抛弃过时的自然经济规律概念，谴责“不可避免的经济必然性”。

没有哪个专家会梦想证明某个指标或各种指标的并列的合理性。无论如何，事实依然是在所有国家中，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中，指标之间的关系是很不清楚的。

关于这一问题的某些理论差不多快变成经典了。

有些症状，大家公认是发展的明显障碍，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却并不因这些症状而必然出现成比例的下降。

穷国和富国同样都研究过的贫困问题是个管理评价的课题，可以用管理评价来为贫困的定义确定界限。在那些实际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里也会发现贫困。那么，我们是否能说，现代世界经济的势头正在逐渐消除与往昔广大贫穷地区相对的“贫困区域”？这类说法虽无确凿证据，但意思不外是说：正是这种势头所具有的能量阻止了我们的现代经济再一次造成新的贫困地带。这类说法还暗示着不能接受如下看法：由于人口中某些阶层在一个高于他们的阶层正在日益富裕起来的社会中感到灰心丧气，因而财富的增长造成了相对贫困。对人们在谈及他们的贫困、他们的舒适环境和他们的富足时所表达的各种价值判断的道德方面加以讨论，是毫无意义的。不能把个人发展的主观目标简化成量的关系；对于摆脱贫困的机会和财富的负担，人们对二者所作的比较总会受到其自我意识的影响。

至于说到失业，曾有人轻率地建议以各种百分比作为识别所谓“到哪儿都需要救济的失业者”的手段，这种轻率行为是很难

使人忘记的。此外，每当需作结构调整时，总产品的同样增长率总会根据不同情况而伴随不同的失业率。虽然有时为方便起见也谈到相反的东西，但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的提高不会自动降低失业率。况且，当必须区别一个谋求职业的工人和比较了失业津贴与标准工资后认为不值得花气力找工作的人时，人格的和道德的因素就再一次显露出来。

至于不平等，这个问题并不象通常想象的那样理所当然，而是需要进行更彻底的调查研究。减少不平等现象只是个临时性目标；它在转变时期是有用的，但提出这种建议的人必须证明这一目标同我们正在努力实现的状态有关。如果这种状态具有报酬与职责平等的特征，能否认为它是值得我们孜孜以求的呢？有种种理由对此表示怀疑。纵观全部历史，任何社会中都可以看到职责与社会地位的不平等，在这个规律面前，这种不平等同平等并不是水火不相容的，它的基础是技能、能力和培训方面的不平等。就其最丰富最持久的方面而言，这种不平等与社会等级密切相关。至于薪金和工资方面的等级，它反映的是专业化和职业培训的成本。在那些因自身缘故而充满战斗精神的社会里，存在着一种潜移默化的危险，它把平等主义理想与人类尊严和价值方面的平等原则混为一谈。

说到教育，各种指标所提供的信息同希望产生的社会效果之间存在着很大差距。人们指望教育系统造就出某种特殊的社会成员。即使最为宽容的社会也不能不去满足这种要求，这就提到了私人教育与公共教育相冲突的全部问题。就前者而论，学费增加了接受教育的屏障；就后者而论，这些冲突牵扯到教师和学生选择各种价值的自由，而知识的传递总是以这种价值为基础的。无论考察教学对教育制度的适应还是教学满足父母和儿童希望的程度，我们都会发现，不管有什么变化或细节有何不同，这两个问

题都属于完全不同的另一类观念，与各种指标能够告诉我们的东西毫不相干。对基本知识（阅读、书写、计算）的传授情况要进行有效的评价，不能只看到传授了多少信息和技能这种“原始材料”，还要看学习者根据自身考虑并为其职业目的而能付诸应用的最低限度。

无论一个政府或政党是否明言，它们都认为，一种教育制度总是出于各种政治目的而要征服和组织的一种人类空间。由于这一附带的原因，对教育制度进行评价也不能仅靠入学率。对以任何同学习者灵魂深处的志向格格不入的方式塑造他们的尝试，人格的发展都加以抗拒。

现在我们来看看从出生算起的或在某一既定年龄段上的预期寿命这类具有高度综合性的社会指标。这些指标都与享受各种商品和服务的基本条件有关，并且指出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能力或潜力。当然，关于生活质量，不论是从社会观点看的还是从个人观点看的，这些指标都没有告诉我们任何东西。此外，在严格的经济学层次上，我们始终还在摸索一条道路，以求对劳动、劳动产品和收入、以及在生命周期内按照各类社会使用劳动的方式进行严肃的研究。因此，关于个人及其群体对社会有什么贡献、他们从社会中消费了什么的问题，我们还处于进行试验性分析的开始阶段。

关于同卫生和健康有关的指标，由于对它们的批评已家喻户晓，我们只限于作一回顾：人们总是以不同的方式理解健康概念，因而得出了迥然不同的结果，根据这种不同的认识，人们把正相反对的两种目标当作重要的东西：其一是最大限度地降低身心疾病和障碍的致命性及发病率；其二是促进人的能力全面发展，又不因过分利用他们的个人能量储备而伤害他们。

在对所谓“社会”指标作出总体评价的尝试中，有两种说法

或许能以有益的方式为研究者提供思想素材。

其一，一个社会指标位于其共同体的多重目标同一个愿意和渴望个人生活者的多重方案的相交点上。由此产生的复杂性向所有指标组合和加权提出了挑战，无论这种组合和加权有多么精密。当社会是出于自愿选择或由于必然性而逐渐脱离开共同的生活方式并且已经或正在变成多元社会时，这种挑战就更加有力。

其二，在整个人类发展史中，社会和个人都曾沉浸于定性价值中。它们把一种有意或无意传达的意义赋予语言中的各种符号和隐喻，这种东西或者构成能以文字交流的东西的基础，或者超越了文字的含意。对平均值进行统计、加权和计算并把它们组合起来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们身不由己，都把全部注意力集中于物和物质对象上。但此路不通，因为不论社会还是人，都不是物。

经济发展的外在标志以及这种发展对获取财富和积累资本所表现出的可鄙的迷恋，同人们及其共同体制定的生活规划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根据经验，这种紧张关系可被视为各种已知社会中一切非人道东西的主要原因和主要动力。

读者可能已经注意到，我们这里以个人方式提出的发展概念给确定种种最敷衍塞责的指标这一任务带来了更多的困难。

处于改变旧结构产生新结构过程中的各部门之间的经济辩证法，是以推进效应为基础的。

辩证法、辅助对话以及在最佳状态中的个人和社会集团之间的真正对话，也需要推进效应来刺激，但这是另一种不同的推进效应。

为上述第一种和第二种辩证法而划分的时期不是重迭的。一种经济变得更为复杂和更有效率的速度是同思想的神秘进步或价值转变的速度不相同的。

静态系统彻底排除了行为者，而不可逆的时间，如果得到正

确理解的话，能把我们从这种系统的辩护士们那种简单化的理论中解救出来。这对于理解那种我们以热切渴望但却是令人遗憾的方式作为历史的时间而提及东西，还仅仅是迈出了第一步。这种理解虽然几乎超出了我们的能力，但却是至关重要的。

第二章　理论公式

西方到处都在讲授的经济理论在多大程度上适合于具有发展中国家特点的条件呢?毫不夸张地说,系统研究这个问题的科研项目有如凤毛麟角。这绝非偶然。

过去百年间人们普遍信奉的一般经济理论，是由那些专门为靠外贸和金融繁荣起来的英格兰著书立说的讲英语的作者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制定的,它反映着来自统治阶级的暗中压力。这种在很多方面显然是规范的一般理论以其前提和结构为其所产生的国家的利益服务；如果不加批判地在发展中国家应用这种理论，就会损害这些国家，因为这些国家事实上必须依赖的“市场”，是一个它们在根深蒂固的、普遍而且持久的不平等背景下参与的市场。

而且相对来说，功成名就且熟悉发展中国家实际情况的经济学家也非常之少。他们中大部分人视野狭窄，对他们自己的社会的经验和自己国家的经济和金融活动也漠不关心，而且总是贬低发展问题，使之处于从属地位，依附于对西方资本主义及其货币和金融机制的分析和理论。

他们使自己，并且使我们对发展中国家可能给我们的教益闭目塞听,无力开拓视野,而这正是跨过我们习以为常的东西继续前进、走向一种更为普遍的理论所绝对必需的。在相互依存的一般均衡这样一些表达公式中，或在《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这部名著中，不适当地使用了“一般”这个词。

这两种情况都与它们所自诩的相反，它们都不是一般理论，而是非常特殊的理论，只适用于西方国家和那些稍加思考就会看出是绝对有限的环境。

我将证明，今天人们广泛信奉的所谓“一般”理论，在解释发展中国家的典型事件、指导它们的经济政策方面毫无作用，有必要对这些理论作彻底修正。

尔后，我将接着介绍当前修正这些理论的运动所具有的主要特点。

为便于比较鉴别，有必要评价一下对发展的一些态度。

这种考察是一个导言，它服务于对发展的动力和动力学问题的讨论。

只有在这一浓缩而确切的导言之后，才有可能对新经济思维在现代科学进步中的位置提出有意义的问题。在这方面，我觉得，古典力学的相对衰落和热力学的相对上升不可能无限期地为市场机制的狂热信徒所忽视。

如果我们不论以开诚布公还是小心遮掩的方式假定，各种以人类科学而著名的学科不提及某种人的概念就没法发展，那么，揭示当今广为流传的各种一般经济理论同它们所暗含的或与它们吻合的种种哲学立场的关系，就仍然是必不可少的。

关于互依性一般均衡的新古典理论

自称是首尾一贯的经济理论无一能避而不谈作为整体的经济体系及其各独立要素和职能。这正是一种一般均衡理论要解决的问题。

不管现象如何，英语思维的连续性是无懈可击的。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经济学原理》，1890年）强调部分均衡分析，假如

允许这种分析超越市场力量的狭隘概念，它本会导致对有构部门及其相互关系的分析，但这种情况并未出现。所以，从S·杰文斯的时代到L·瓦尔拉（1874年）和V·帕累托（1906年），一般均衡理论实质上没什么变化，尽管帕累托曾使它有所扩展。现在，在J·R·希克斯的静力学和变态学中还可以发现这种理论。

没有人会忘记凯恩斯的“革命”和接踵而至的“反革命”——这是一种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夸张，这种说法给它所描述的如此戏剧性的变化造成了一种夸大其辞的甚至歪曲的印象。在那部驰名的著作《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中，在他本人对该书的评论中，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彻底抛弃了A·塞西尔·皮古所倡导的一般均衡理论，皮古以微观、中观和宏观经济学的术语来叙述这种理论。但是，皮古反叛了的门徒并没有就微观、中观和宏观定量之间的关系给我们以任何详细的说明，因而使我们对于同其宏观经济学相一致的价格制度疑惑不解。必须指出，他对宏观经济流程之间各种关系的论述本来是能从这种说明中大有收获而不会失去任何东西的。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凯恩斯处方的适用范围一直不很清楚，但其药方所具有的危险却总是赤裸裸地暴露出来。

在凯恩斯之后，一般均衡理论依然如故，是为大学生们安排的主餐，这些大学生将来会成为重要的私营或国营企业的总经理，将会要求他们对自己社会的经济甚至可能是遥远地方的经济作出解释。无论在哪里，学经济的大学生们在获得亲自经验之前，提供给他们的总是一个分析世界各地经济活动的模式。

西方的这种教学方法的传播，必然会产生严重的后果，因为以市场力量的机制为基础的一般均衡理论被人以令人作呕的方式反复咀嚼着，并以一种在普通公众眼中给它披上神圣之光的简单数学方式表述出来，经过这番顶礼膜拜，它凭借习惯和仿效的绝对力量，变成了一种使人误解为不可动摇的理论基石。但在付诸

检验时，这一体系的前提和实质信誉扫地，毫无可信之处；在那假定是以如此可靠的方式建立起来的大厦结构上出现了巨大的裂痕。

瓦尔拉和帕累托均衡理论① 的基础是那些小单位（个人和商号），它们受制于自己绝无能力控制的价格，这种价格向他们提供所需的全部信息，他们根据这种信息改变生产量以作出某些必要的调整。以最佳方式充分利用资源，是通过确立供给等于需求的个别平衡从而提供一个一般均衡价格的方式来实现的。货币变成了简单的硬币和纸币，或者又仅是另一种在一个抽象均质空间中使经济计算和交换在任何点上都成为可能的商品。

这种实际上以小单位(或商号)全都彼此独立为前提的理论，是与观察和经验背道而驰的。但由于它与拉格朗日古典力学(1788年）的均衡论相联系，由于它的等式体系，这种理论曾被作为"纯粹的"理论而得到发展，这些等式是：

1．小单位**行为**的等式：每一小单位都保证生产诸要素具有相等的边际生产力，保证交易物品的边际效用与其价格成比例，以此把使用资源的成果扩大到最大限度。

2．**联系**的等式：均衡的价格保证全部供给等于全部需求。换言之，它与全部商品和服务的使用联系起来。

3．**平衡**的等式：均衡既不允许出现过剩，也不允许出现赤字（资源未充分利用）。

就静止的、无时间限制的状况看，这一体系意味着个别单位

---

① 对于瓦尔拉和帕累托所阐述的传统均衡理论的批评，见弗朗索瓦·佩鲁：《关于一般均衡理论中的普遍性程度问题》，*CISMEA*，1967年第9期，第227页；《瓦尔拉——帕累托的数学和"主动调和"》——献给前辈泰克塞拉·里贝罗的文集，葡萄牙，科尼布拉，1978年；"平衡的概念和当前的数学化，一篇评注"，*MED*，1974年第8期；代斯德恩·德·贝尔尼，热拉尔德：《运用一般经济均衡的分析方法的范围》，《经济杂志》，1975年11月。

的最佳条件与整体的最佳条件相符合：这种最佳条件是通过完全竞争的调节以数学的方式被共同确定的。在巧妙地建构起这种条件后，任何人类行为者进行的活动都被废除了；记录价格并因此能根据所得数据作出必要调整的机器人完全可以取代决策人员了。

虽然世界各地经过认真考虑的经济学家对这种所谓一般而其实是特殊的均衡表示怀疑，但它依然是一种到处都在传授的模式，除了以数学语言对它作出重新阐述之外，其基本结构保持完整不变。而这种结构，由于它假定物品和商品都由所谓的中性市场力量来支配，不承认人类活动、不承认人们进行变革并改变其物质的和人的环境的能力这一关键因素，因而实质上是错误的。

由于下列理由，在任何国家里、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里，随着这一主要原则得到引人注目的详细阐述，很容易看出，它并未给解释、描述或行动提供一个牢靠的基础：

1. 它是"预构"的一个明显实例，它实际上是要求预先、同时并且在静止条件下解决均衡的存在、唯一性、最适性和稳定性的问题。

2. 它以相同单位之间、同样项目之间的完全竞争为前提条件，单位的数量恰到好处，以至谁也不具有影响价格或影响其对手的实力。

3. 每一个这种宏观单位都是被动的，它始终在一种完全竞争的条件下单纯使产量适应价格。

4. 这种模式是瞬时的，是在某一特定瞬间构成的；而且由于小构成单位既无对过去的记忆，又无对将来的计划，它也是无时间限制的。

5. 这个模式排除结构和有构子集(行业、地区、社会集团)。

6. 它决不会成功地提出一个既适用于对外贸易也适用于对内贸易的同一理论。这并不奇怪，因为国家是一种结构、一种组织，从而超出了排除任何结构或组织的模式的范围。

7. 用这一模式绝不可能以分析的方式把各微观单位的均衡同国民核算的总额联系起来。假定这类总额反映着以价值而不是实际价格表示的商品总额，但由于不同形式的竞争、垄断和寡头独占的结合，实际价格不会是均质的。此外，它也从未严格地分析过从微观单位的一般均衡向宏观单位的一般均衡的转化。

8. 这一模式对各种历史力量（背景情况）和各种经济动力（现实作用）之间的关系也没有作出任何解释。

9. 在不能计算这一模式所确定的量、不能以统计数据和曲线为基础确定一种均衡状态这一非常确切的意义上，它是无效的。

把注意力集中于不均衡状况（不改变均衡概念）并不会取得进展，只有接受普遍相互依存和整体各组成部分的有序性这样一种不同的概念才行。

把这一模式同发展中国家在不同范围内所共有的各种条件加以比较，表明它根本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它造成的种种纠纷的确是极端危险的。在一个发展中国家里，错综复杂的经济空间是异质的（与上述2、5、7相反）；为发展中国家制定的稳健战略要求改变各种历史力量的活动(与8相反)，它包含着调整（与5、6相反），延长不可逆的时间的期限（与4相反），并以权力关系的转移为前提（与2相反）。

任何有见识的读者在进一步论述诸如此类的不一致性并用具体实例加以说明时，谅必不会有什么困难。

简言之，这个模式用机械类比法描绘了一付具有完全竞争的纯市场情景；它同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条件正好相反，这些条

件只有通过发展中国家的精英和人民为改变其当前和未来环境而进行的共同努力，才能在这些国家现状的范围内形成。如果发展中国家真正要理解一般的均衡理论，它们就会发现，这种理论所追求的（虽未取得有意义的成就）是对事物如何在一种均质的环境中运动作出一种机械的阐述，它不会承认生命和历史各自遵循其规律在其中发展的人类环境实质上是异质的，不会承认在这种异质环境中的各种活动的组合。

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平衡

《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1936年）①是在给联合王国造成严重影响的萧条时期（1929—1933年）之后不久写成的。通过自己国家日渐衰败的霸主地位和陈旧的结构，凯恩斯觉察到困扰着他的祖国的各种困难，认识到一种以自由的市场和资本权力为基础的经济体系的种种问题，并且意识到“资本主义的没落”。但他从根本上给予明确考察的结构、历史力量和结构失衡，既同不列颠经济无关，也同其他的经济无关。

他的诊断是直接以他选择的观察领域为条件的：即那些存在有资本市场、货币市场和以复杂的金融和银行制度为后台的工商企业的国家的经济。

他提出的治疗方案或一系列补救措施同他的诊断一致。经验已表明，就发达国家而言，它的效果是值得怀疑的；对发展中国

① 弗朗索瓦·佩鲁：“一般理论概要”，经济学系杂志，伊斯坦布尔大学，1949年(小册子)；“凯恩斯利息理论概要”，邦克，1950年3月；“凯恩斯、人及其时代的问题”，《当代经济》，1951年1月；阿兰·巴雷尔：《经济理论和凯恩斯的冲击》，巴黎，达罗兹，1952年；《经济的不平衡和凯恩斯主义的反革命》，巴黎，《经济杂志》，1979年；阿克塞尔·莱金发夫德：《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学》，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68年。

家来说，它显然更不着边际、更不适用。

在凯恩斯看来，市场经济以自发的方式在就业不充分的水平上运行。就特定生产函数而言，总收入的水平取决于投资、取决于（边际）消费倾向，或换言之，取决于投资和收益增殖率（与储蓄倾向相对）。

消费倾向低于1，它就不以同收入增长相同的比例上升；收入增长中的一部分并未用于消费，可以认为它不在消费性开支之列。为补充这个不足额，有必要进行追加投资。

只要没有实现充分就业，额外货币发行量就会以动员闲置经济资源（失业劳动力、闲置生产能力）的方式导致实际国民生产额的过剩；这是生产性通货膨胀的一种形式。

麻烦在于有效需求不足，消费性开支和投资不足；补救措施是增加消费方面的开支，或者以降低利息率、通过政府投资的方式增加投资。

很多后凯恩斯主义者曾详细阐述过这个模式，并对这一模式作出了自己的解释，其中有些人离开了正统的自由市场和资本主义思想（琼·罗宾逊，M·卡莱基），其他人则维护这个正统（利乔赫夫德）。R·F·哈罗德、E·多马尔和J·R·希克思以及稍后一点的R·索洛所倡导的各种“平衡理论”和J·R·希克思在他的另一种解释中再一次倡导的这类理论，无不源出于凯恩斯这个模式。

不能否认，该模式诸如此类的修改版确有某些贡献。可是，凯恩斯模式的基本特征，只有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在一种与20世纪30年代前后联合王国非常相似的情境中，才有可靠根据，而且即使如此，也不是没有明显的保留。

我们这里所讨论的问题是非常特殊的：凯恩斯模式能为一种发展政策奠定基础吗？它是否描述了发展的障碍和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上的不利条件？它是否有助于选择一些措施以弥补这些不利

条件？对所有这些问题的回答肯定是：否。

无需复述别处已作过的详细论述，让我们在图2.1中比较一下凯恩斯模式成功的条件和可以在发展中国家观察到的情况，当然，这里选择的只是那些最显著的方面。

表2.1

凯恩斯模式成功的条件	可在发展中国家观察到的情况
1．货币发行量在一种其作用能迅速广泛传播的环境中流通。	货币发行量的作用以一种非常不平衡不完全的方式传播。
2．人们假定，闲散资金能以提高或降低利率的方式动员起来（在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假储蓄〈囤积〉）。	不存在“全国性”的资本或货币市场，在前资本主义经济中乡村居民的传统储蓄。
3．闲散资源（受过培训的工人、现存生产设施的潜力）的动员。	“闲散”资源在发展中国家里只是潜在的；工人必须经过培训，生产设施有待建设。
4．渗漏，即复合效应的中断是： －偿清前债 －共同抑制开支 －增加进口	发展中国家的这种渗漏归因于结构因素： －累积的、持久的债务 －前资本主义型储蓄 －为进口必需品（如食品）而筹资。
5．同扩大货币发行量有关的积极供给弹性。	由于结构原因无供给弹性，例如农业生产的优势。
6．“自愿”失业（这是一种表示因总需求不足导致的就业不足的相当含混的说法），不存在严重的瓶颈状态。	结构性失业： －作为人口过剩结果的变相失业 －基本设备和熟练劳动力的短缺。
7．出超（$\overline{X}>\overline{M}$）与投资有大体相同的作用。	进口必需品的[illegible]差额和贸易差额的结构性赤字，持续不断的入超（$\overline{M}>\overline{X}$）刺激着发展中国家的资本设备。

这一对比的明显差异已为历史的所证明。这种对比以简要的方式证明，凯恩斯模式基本上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情况。

其他一些研究成果也表明，凯恩斯平衡增长模式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的增长模式相比，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发展中国家的增长模式是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可承受的不平衡，在某种条件下，这种不平衡将导致能够保证有关人口正常生活并使生活标准有所提高、能够适应国际竞争网的经济形态。

凯恩斯模式是在力量对比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时代、从发达国家的观点出发并为了发达国家而构造的。发展中国家今天参考它，是出于完全不同的考虑，并且是在一种同这种正风靡一时的模式非常不同的背景中进行的。使用国民核算（国民生产值、消费性开支、投资）中的集计概念是对各种政策构成要素进行分类的一种便利方法。在发展规划或方案中包括这种集计概念，同凯恩斯根据他自己国家的利益向那些开明的银行家和工商业家推荐的令人难以捉摸的货币至上毫无关系，凯恩斯是指望以解除正统自由经济教条的束缚去解放这些人。

发展水平必然要求在输入的资本主义领域和本地经济领域之间划一界线，并以适当的方式对待双方。除非有一种沟通二者的政策，同时警惕地控制前者对后者的冲击，否则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就会外流，它的经济就不能为全体人民的利益服务。

进一步说，采用一种包括工农业内各行业各部门的战略是绝对必要的。而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对这种中观经济弃之不顾，并使之处于一团混乱之中。

认识到怎样可以使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注意生产性通货膨胀原理，这并非难事。一般说来，有赤字和债务负担的国家是欢迎货

币过剩的，它的整个生产设施都有待于建设。但是必须保持非常清醒的头脑，额外货币供应量对于培训人民、建设工厂或以生产绝大多数生活必需品和出口适合国际市场上特定的、可以预见的行情的产品为方向的努力，不会有任何实际的作用。

需要的是一种参照国外经验、在某种计划的有效指导下制定的方针，无论这有多么困难和复杂，在凯恩斯曾经说过的言论中，既没有以明确的方式也没有以含蓄的方式提供过这样一种方针，肯定也不能从中推导出这种方针。发展中国家如果认为它唯一所能作的选择只是在新古典主义和凯恩斯主义之间二者居一，这肯定是极为严重的错误。这些国家需要自己的发明，并采用根据它们自己的需要加工过的行动方针。

“能动”单位的一般“均衡”

宏观经济学的数学等式不是改善传统理论所需要的那种东西。越来越多信息灵通、能力颇强的经济学家正在抛弃这种等式，并说明他们之所以如此的理由。过去迫使他们不得不这样做的是我们眼睁睁地看着正在逐渐蚕食私有经济或半私有经济的各种形式的垄断和寡头独占。在一种寡头独占中，每个决策者都意识到别人的存在，他所作的任何决策都包含着对另一些人的决策的预见。如发现结果对所有有关企业都有利，冲突－合作、斗争－协作这种典型情况就会出现。

非常清楚，任何偏离完全竞争形式的情况都会对人的能动性，对人们选择努力方向的能力，特别是对他们的扩张能力产生影响，造成其物质环境和人类环境的变化。

承认这一点——经验证明我们必须承认这一点——就意味着我们必须有责任去建立一种相互依存的、全球均衡行动（即造成

一种平衡状态的行动)的新理论①。

这样一种理论的题中应有之义就是抛弃那种取消人、把人简化为无、把人仅仅视为作出自动反应的价格记录器的观念。它不能接受这样一种看法：人们在其中不起任何作用的外部机制把他们带入均衡状态；它把能领悟并有目的的主体活动和反应同在均质空间中被“自然”力推动的不变客体的位移加以严格区别。

现在可以对一般理论作出新的论述了。这就是以一种修正过的形式、用现代数学的语言描述这种理论，其开端是行为者、活动者和能动的单位。

行为者及其能动性

同在其他方面一样，在经济学中，可以认为每个人都具有作为人的能力，他靠这种能力可以在一个地方、即在一个特殊的领域，修正他的物质环境，影响他周围的其他活动者。

这种富于变化、通常倾向于扩大的能力取决于某些变量（个人系数、文化背景、社会地位）。对这种能力的研究在理论上属于人类科学的其他分支。但是，如果我们不认为环境对行为者和行为者对环境的影响属于我们自己的研究领域，就会完全割断我们同其他那些分支学科的交流，而只要我们从事研究活动，这些分支学科就对我们至关重要。

行为者

行为者或活动者是某个个人或某个组织，它在社会中生活并

① 雅克·莱索恩：《经济分析的个人理论》，阿姆斯特丹，北荷兰出版公司，1977年；弗朗索瓦·佩鲁：《主动协调与新数学》，《对一般经济均衡理论的修正》，巴黎，多德，1975年，“被动协调的平衡与主动协调的一般平衡，”*EA*，1978年，第3－4期。

能作出决策。所谓决策，即协调由行为者作主的各种不同手段同他所希望实现的各种不同目标之间的关系，而这些目标是他以其掌握的信息和能源为基础，凭借他在筹划未来方面的记忆而制定的。

因此，活动者不是同其他任何人具有同样规定的、在一般均衡的机械系统中获得生命力、象奴隶那样依附于"相同单位"的价格制度的机器人。每个活动者彼此相异。而且，就任何一段时期内任何一组特定活动而言，活动者也不是等同的。一般来说，他们之间交换的结果，应归之于作用和反作用的冲突，而不是归结为由无个性特征的、被说成是制定价格的自然力量所控制的不变客体运动的停止。

活动者释放出的能量应用于他们的单位，也就是说，应用于他直接可以得到的并由他组织起来的商品和服务。他的决策权得以实施的领域，或以比较简洁的方式说，他的决策领域，可以是（比如说）他的生产单位（他的企业或商号），这种单位有特定的规模和结构，在所考察的整个复合体中占有特定的地位（即有其坐标）。通过这种单位，活动者可以利用划定其活动领域（顾客、投资、信息）的各种活动修正其环境。可以按照集合论的逻辑对它们加以分类，并把它们组成矢量空间，也可根据初等拓朴学的常规使这种矢量空间变形。

个人或联合的决策者以单位为基础并通过单位发挥其能量，这种单位可以是简单单位（一家企业），也可以是复合单位（一家企业和它的分包人，一个主要单位和它与之结合从而形成一个经济或金融集团的单位）。复合单位、或宏观单位的结构就在于：一个起主要支配作用的单位决定着附属单位等某些变量的价值。

由企业经营、顾客、投资和信息体现的经济空间可适用于某

个地理区域，这在两个方面是有利的：

——表明一个国民经济是由分化的经济空间组成的，以及

——提出一种看法，它直接要求对直接投资和一个国家内的跨国公司进行分析。

在一定时期内，活动者能量的发挥既可能由于目标已达到而中断，也可能由于反对者的反对及某些障碍而临时中断。

可以认为，总能量是一种富于变化的能量，而这种能量是所有活动者的能量和所有受他们决策权影响的所有单位的能量之和。

能动单位的总平衡作用

能动单位在整个经济复合体中发挥的总平衡作用，以该复合体中富于变化的纯能量暂时耗竭为特征（在这个复合体中，ϕ表示能量，ϕc表示系统的能量，我们发现$d\phi c\simeq O$）。

这种总平衡同微观单位的一般均衡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这些微观单位以相同和一律的方式服从于价格标准并因此不得不接受相同价格和成本，即均衡的必然性，而且，这种总平衡作为一种共同满意的结果，当它得到实现时，每个单位都获得同整体的最大限度经济利益相一致的最大限度经济利益。

但是，一种经济，只有根据社会角色以及构成它的各种单位在规模方面和相对权力方面的不平等梯次分布，才是可以想象的。

因此，必须考虑到任何经济复合体都是由大单位和小单位、强单位和弱单位组成的，大单位在其自己的层次上实现的共同满意把各种数学意义上的限制因素强加给小单位的共同满意。就行为者、他们的渴望水平或他们对于上述局面的认可而言，在一定时间内，以一种均衡价格实现的供给与需求的平衡本身，并未告

诉我们任何东西。

例如，富于变化的能量已耗竭的寡头独占或寡头独占集团可能会以基本上持续的均衡来应付局面，而这种均衡把它本身的条件和限制因素强加给中、小单位。如果这些条件和限制因素有时没有对这些中、小单位放宽约束的话，那么这些单位只能根据这些条件和限制因素彼此进行竞争。

在一定价格上供给与需求平衡的规则，并非在任何竞争层次上都以同样的形式适用，因而大单位在其自己层次上的满意可能同小单位的不满意同时并存。前者发现，在具有类似规模和实力的伙伴之间暂时中断竞争是有利的，而后者在把力量集结起来之前没有足够的富于变化的能量以改变强加于它们的条件。

更具体些说，以纵向方式供应中间产品的寡头独占共同决定他们的价格：购买这些中间产品的人，在使人感受到他们的联合实力之前，往往不能采取行动来修正这种对自己有利的价格。或者可以这么说，大银行集团可以规定使其满意的利润水平，而它们较小的合伙者则不得不俯首听命；或者大进口商可以在彼此间决定使其满意的批发价格，而中间商和最后的消费者则不得不在等待相当长时间后，才能向他们进行挑战。

我们可以看出，这正是价格制定者和价格接受者之间的区别的推广和具体应用。前者制定或帮助制定价格，后者被迫接受别人制定的价格。这种概括以不平衡结构在某一时期普遍存在这一假设为基础。

瓦尔拉和帕累托的一般均衡意味着由价格制度的力量推动的客体运动的终止，这种力量作用于想象的、不真实的个人，而这些个人又被迫处于完全相同的小单位中。

与此相反，总平衡描述的是产生变化的组合能量的结果，是不平等的行为者的活动的结果，换言之，是一种由规模、结构和

实力不平衡的单位在某些层次上的作用和反作用促成均衡的状况。

乍看起来，随总平衡出现的未必一定是一致的、普遍的共同满意，或者是由所有单位一致和普遍的共同满意所决定的最佳状况。

总水准允许结构上的不平等和各种不同形式的垄断联合。因为它指的是不平等的行为者或活动者的活动，所以它促进了对一国内部或两国之间不同贸易水平上的供求平衡的分析，并鼓励借助于特殊模式对这种平衡每一次究竟意味着什么的问题进行研究。

这与迷恋假定是以机械方式实现的至少是相当长时期内的均衡完全不是一回事。相反，可把这一系统视为可承受的不平衡的延续，这种可承受的不平衡是由各社会集团的组织和行政当局有意进行的各种可变调节造成的。

通过有组织的社会集团之间的冲突与合作，并通过代表各社会团体进行的协调与仲裁（只要这些集团和团体是能动的和消息灵通的），就可以使有保证的增长和发展协调一致。增长和发展不是由补偿和调整机制自动平衡的；这些机制在通过社会学习过程已获得适当反应能力的市场经济中确有稳定作用，但要保证以最佳均衡和一致满意为方向的进步，靠这些机制本身是绝对不够的。

一旦重新把活动者、把个人和群体的活动放回到经过修正的经济活动理论中去，就可以创立一种对于变化着的发展方针严格而有效的观点了。

这种观点同历史主义和制度主义分道扬镳，正如它同作为一种纯理论而被提出的市场均衡分道扬镳一样，因为这种纯理论是以极不可能的条件为基础的，它用的是以拉格朗日力学中借来的

数学方法。

对发展的某些态度

既然一个面对由经验确定的紧迫的新环境的学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已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中也不能得到完全的改造，那么，在发展理论和学说方面始终普遍存在的混乱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

但是，那些可视为代表人物的作者们所指出的基本倾向现在正在出现。

早期的英语经典并未被放弃：以教本几何、有时是以高深的数学武装起来的新古典学派门徒们已使它们得以更新。当然，他们这样做的理由并不完全是知识方面的；这种经典劳苦功高，发现并阐明了有关市场的各种问题，绝大多数西方强国从未打算放弃它们。

其次，既然突飞猛进的经济研究尚未得到新理论学说的配合，帮助它对一系列新事实进行分类、解释和消化；那么，向某种“推理的”历史学求助的诱惑势必在一定范围内获胜。鉴于在一个某些历史学家乐于把历史学说成是科学之科学的时代里理论所具有的某些缺陷，这也是意料中的事了。

最后，卡尔·马克思始终是个高高在上的角色，人们经常引用并歪曲他的观点，但很少有人实际阅读他的著作。这个马克思不是写下早期著作的马克思，甚至不是写作《资本论》的马克思，而是给列宁的基本政治活动铺平道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煽动起义，反对一切社会非正义，虽然这种马克思主义并没有产生任何科学论著，但知识界一部分人至少是将其作为有很高价值的可供选择的一种理论来运用这种主义的，这些知识

分子意识到需要从根本上对市场经济进行再思考，但正在徒劳地寻找一个可供选择的学说。

为了给我们提出的解释提供一些坐标，分别对这三种思潮作出必不可少的简要说明，肯定是有益的。

古典经济学家的遗产①

在1955年以《经济增长理论》为题出版的一本书中，阿瑟·W·刘易斯明确表示，他不放弃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的遗产。我们以这一著作作为重要例证有很多理由。

刘易斯以相当冗长的文字陈述他的方法，强调他打算呆在明确限定的领域内，不越雷池一步。他把增长定义为人均产出的增加。给产出及成本下定义的任务，他留给了搞国民收入的"理论家们"；使我们了解使用某种普遍价格指数固有困难的任务，他留给了统计学家。他着重指出，他既不打算直接探讨分配也不直接探讨消费，更不打算涉及有关人的幸福、满足和福利的争论。只是在本书结尾，他才拿出一个"经济增长是否尽如人意？"问题的附录。正象他一再重申的那样，他的研究与产品的使用无关，只涉及产品的增长。

他用来作为人类参照系的是尽可能简单意义上的国家集团，这是一种人口普查所确立的集团，也是一种保留对外贸易统计资料的集团。

因此，他的著作只与增长有关，除增长外概不涉及其他问题：在他的笔下竟然偶尔也露出发展或进步的字样，但这只是为了使叙述有所变化而已。

---

① 阿瑟·W·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伦敦，艾伦和安温，1955年第1版；《具有无限劳动力供应的经济发展》，曼彻斯特经济和社会研究院，1954年。

有了这样一个精心选择和限定的出发点，读者就不会有误入歧途的危险，换言之，就不会接受这些概念所包含的更为丰富的含义，就不会承认这些概念所反映的现实关系中出现的变化。即使不是出于辩论的目的，我们也可证明刘易斯把亚当·斯密的视野搞得更狭隘了，因为后者曾在《论国民财富的起源和本质》中就国民收入及其构成和发展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广泛而富有成果的思想。

刘易斯宁愿改变自己的陈述也不愿把这些陈述同别人的陈述联系起来，他似乎深信不疑，人性的本质特征是不变的，因此可以提出具有普遍有效性的描述和看法。

在他看来，增长有最直接的原因、中介原因和人的原因。前者就是节俭的努力、知识的增多和运用、资本或其他人均资源的聚集。中介原因产生于制度和信仰。

全书以此为基础围绕对两个问题的回答展开，这两个问题是：各种制度与增长的一致，经济和社会现实在与增长的关系中的进展——这些都依据一个明确的认识：支配经济和社会趋势的规律既不可认识也不能预测。要把握的主要东西是："不同的社会有足够的相同之处，因此有可能推导出人类行为的某些一般规则。"运用这些规则，我们就能说明，如果发生变化的话，它将怎样发生；我们不能预见的东西将会发生什么变化。"如果制度是自由化的，人们就会付出更多的努力，就会有更多的知识和资本用于生产。"

整部著作依靠的是由频繁参照实际经验来说明的演绎分析，但这二者与其说是在一个理论模式的构架中结合在一起的，不如说是平列的。

给人留下的是对这样一位经济学家的印象：他真诚地希望超越曼彻斯特学派的陈腐程式，但归根结底他还是认为，这一学派

是以人类本性为基础的，他们过去独树一帜，取得了积极的成果。这样一来的结果就是不偏不倚陈列某种态度或制度的“优点和缺点”、“正面理由和反面理由。”

问题与答案如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以致根本不可能找到实质性的选择余地。例如，在普遍存在的环境中，无钱寸步难行这一原则，同那些从事非生产性活动者的生活、至少是同他们“规范的”生存是否不矛盾？对这种直接了当不容含糊其辞的问题，显然只有两种答案。

或者是，在任何特定情境中，拯救人的生命都是不可能的——就这种情况而言，是否应对这种不可能性作严格的详细研究，要看它是产生于各种制度还是产生于不可克服的自然条件；或者是，现在以严格方式运行的商品经济是唯一合理可行的经济形式——就这种情况而言，它的优点会使我们无视它的种种缺陷，任其失败者自生自灭。

从来没有一个发达国家自己肯接受这种“不可能性”。况且，从纯经济观点出发，就所有现存的和潜在的资源的利用来说，这种论证方式也说不通。

刘易斯本人把自己的书说成是一份地图，显然，他以无可非议的谨慎说出了此书值得一说的一切。地图可以提供指南——因此，不能蔑视；一个理论的或实践的经济学家必须选择他的道路。不管是由于还是假定由于他真心诚意地绘制这份地图，他在自己选择的方向上表现出来的踌躇不决都可以得到原谅。任何事情都只能取决于具体事实吗？若果真如此，建立理论就大可不必了。

在讨论增长必要性的附录之前是第七章，正文的这最后一章提供了一个选择的实例。在讨论政府时，这一章对九类政府活动和导致萧条的九种选择（见表2.2）加以比较，虽然所列各项并

不一一准确对应。

表2.2

政府的职能	政府造成萧条的方式
1．维护公共事业	不能维持秩序
2．对态度施以影响	对公民进行掠夺
3．建立经济制度	加重阶级剥削
4．左右资源的利用	妨碍对外关系
5．左右收入分配	忽视公共事业
6．控制货币发行量	过分的放任主义
7．对波动加以控制	过分的控制
8．确保充分就业	过分的开支
9．左右投资规模	竞相奢华、比阔气

无疑，作者列出了实际情况：他有广泛的经验，对发展中国家有第一手材料。而且谁会异想天开否认这种情况介绍是以最可靠的常识为基础的呢？尽管如此，仍有很多人感到，不管处于什么经济环境中，要建立一套政府理论，所需要的东西远不限于此。

1955年出版的这本书同21年后发展中国家的一致要求相距何止万里！今天需要的不是应用精心设计的古典学说，而是全面彻底地调整最自由的最广泛意义上的经济关系。

虽然古典理论的代表人物可以诉诸某些国家内某些阶级在发财致富上长期积累的经验，但发展中国家所能指出的却是多少个受苦受难的世纪，在西方繁荣昌盛的美好时代，这些国家与其说得到了拯救，不如说每况愈下。我们无需超出这一简单的提示，仅仅强调指出如下事实就足够了：在当今世界环境中，这种理论显然是不合时宜的。我们从作者本人对合理平衡的好感中得到暗示，我们将要求某种系统，无论这个系统多不成熟，我们都将以它

作为对刘易斯著作的补充，以帮助我们去把握被古典学说的金线束在一起的经验资料的不确定性；当然，这种系统本身也只是个临时的和初步的近似值。

我们还必须考察刘易斯那粗陋的发展模式，它是根据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可找到实际上“无限”的劳动力“供给”这一点推导出来的。据说，这类国家是由两部分人组成的：一部分是传统的或维持生存的人（T），另一部分是资本家（C）。对利润的追求是唯一的投资动力，这种追求激励着资本家，而T部分则靠微薄的收入生产劳动力。

这个复合整体是由预期利润推动、由实际利润维持的，而实际利润又来满足生产性投资的需求。由于在这两部分人之间的初始差异和不平等，整个生产和就业也许会增长，但并不会带来实际工资的显著增加。大部分劳动者只能逐渐地意识到其相对处境，并强烈要求提高其生活标准。而且这种生活标准的提高是在极为有限的范围之内的，由于资本家部分可以远远高于这种标准，所以即使不去专门提高这种标准，传统的或T部分的工人实际上也会享有它。

因此，资本家利润的形成依靠本国劳动者方面的某种滞后（这在某种程度上——虽然环境显然不同——令人回想起凯恩斯早期模式中的货币幻觉，在这种模式中，以充分就业为方向的就业伴随着实际工资的下降）。刘易斯模式描述的正是那种现在发展中国家摒弃了的那种殖民式发展，发展中国家正是靠摒弃这种发展模式而在全世界聚集力量的。

利润率是这两个部分经济的动力。或者由于工人们改善了其谈判地位，或者由于食品必须进口，从而工人的食品费用增加，这都会导致利润率的下降。无论在哪种情况下，利润率降低都会引起资本积累率的下降。由于资本及其积累是“发展”的动力，“发

展”也就失去了势头。显然，如果农业劳动生产率上升，就会减缓工资上升趋势。但是，这终究是资本家得到的礼品，而不是人民及其代表得到的礼品。在这一模式中，资本家和企业主们可以决定在某些地区建立现代农业——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肯定会从农业的一个部分中得到很高的产出，本地农户未必能从中得到什么好处。

这一模式要能发挥作用，依赖的是一种无疑应消除的结构性失调。相反，C部分不会去克服这种失调，而可能吞没发展中国家的整个经济——这种可能性应坦率地加以正视。对于这种情况，刘易斯平静地说明："一个经济进入了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古典经济学就不再适用了。我们现在是在新古典经济学的世界中了。"

在此之后，指出刘易斯似乎认为资本和资本家是发展的主人，差不多是多余的了。按照他的本意，可以作出的抉择不过是根据时间不同，或是当个古典经济学家，或是当个新古典经济学家。这一见解也有功绩，它揭示了以人为中心的发展分析和从资本家战略的观点出发、以逐步"授与"的富裕为基础的增长分析之间的根本不同。

虽然并不尽如人意，但这种历史的态度可能会证明并不那么令人失望。

推理的历史学①

约瑟夫·熊彼特"推理的历史学"这一术语并未取得成功，因为它触怒了两个阵营中的专家。一派认为，除非科学寿终正寝，

---

① W·W·罗斯托：《经济增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60年。

否则他们的工作就是发现规律而不是推论历史；另一派则深信，历史学现在是各学科的女皇，不存在"推理"优先于研究具体问题的需要，这些问题已作出了明确限定并尽可能的定量化了。

这两种批评大都出于误解。没有一位历史学家会同意说他们自己仅仅是叙述者；况且众所周知，叙述本身也不能没有概念、思想和潜在的人类行为模式，更不要说没有个人经历和下意识酿成的假说了。到底有多少有见识、能力颇强的经济学家会因掌握了定量调查手段而感到自豪呢？这种手段不必经常参照那些没有历史学的知识和理论就无法达到的结构。

但是，被忽视的主要因素在于，约瑟夫·熊彼特在提出他那不太通俗的说法时，这位在历史学和现在经济学领域内取得巨大学术成就的专家，正在树立一个谦逊的榜样，并且表达了所有曾参与对我们学科的"科学"性质进行评价的人们所共有的某种怀旧情绪。

而且，只要参与这项困难工作的人明确规定其对象、说明他选择的工具、并不把他本人所偏爱的假设作为唯一可能的和富有成效的假设提出来，多少有点"推论的"经济学史的贡献就是绝对不应受到蔑视的。

熊彼特在其两卷集著作《商业周期》中从短周期（基钦、尤格拉）和长周期（比如100年）的观点向我们描述了资本主义的历史。正如我们已知的那样，由于对这些现象从未制定过广泛的理论，熊彼特对周期理论作出了很大贡献。

专业历史学家沃尔特·W·罗斯托在一个非常不同的层次上，为了非常不同的目标，曾根据1958年他在剑桥就增长问题开的一门课写了一部令人振奋的书。该书题目为《经济增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剑桥大学出版社，1960年）。这个题目言过其实，有点含糊，因而不无缺陷。但是，作者"使现代经济理论适

用于经济史”的意图无疑是顺应形势的。他的研究对象也经过认真的限定。

除了种种应用部分（第73页以前）之外，前五章集中讨论了“起飞”这一概念，即以某种经济的第一次重大增长（在世界主要国家中这种增长都发生在美国18世纪后半叶经历的事情之后）为标志的阶段。该书的目的不是按照明显起作用的力量——人口、革新或竞争规则——对发展进行理论分析，而是要为人们都在描述的相继出现的各增长阶段设置一个水准基点。

罗斯托把思想和历史知识融为一体的作品可能有助于经济学家们创立自已的理论解释。他研究的主题是狭义的增长，没有直接研究这种增长同分配关系，也没有明确描述发展的辩证法。但应说明，对主导部门的研究必然导向对进化结构和方式的研究，虽然他在这本书中并没有揭示出已蕴含在其逻辑中的分析结果。

同德意志学派的经济制度和组织类型相反，罗斯托从辨认和确定各增长阶段的日期出发，他把增长的阶段归结为五个。

1. 传统社会。这种社会使用从牛顿物理学中衍生出来的各种技术；总产值中的一大部分是由农业提供的；政治权力始终是相对分散的。

2. 为起飞创造前提条件阶段。采用并推广了从牛顿以后的或现代的科学中衍生的技术。开始意识到经济的超载会减少收益、甚至开始取消收益。积累性的增长过程相当普遍，其标志是复杂的利润计算。在某一既定国家内，这些变化常常可以明确地归因于一种因外来刺激而引起的剧变。

3.起飞阶段。增长变成一种常态，并被视为“正常的”。新的社会态度及相适应的制度支持并强化了积累过程；投资总额和储蓄总额上升到总收入的5—10%之间。

4. 迈向成熟阶段。此时产出速度惊人。增长大大加快，投资总额和储蓄总额达到总产出的10—20%。社会基金得以形成。新行业从旧行业中生长出来——这是经济开始有能力吸收现代技术的标志之一。

5. 高额大规模消费阶段。人口的增长和以熟练劳动力为基础的人类活动的复杂组织需要有一种广泛的官僚主义机构加以支持。现在，经过充分发展，处于这一阶段的经济面临着在几种政策之间进行的选择：一种是福利国家政策，即权力政策，另一种是消费纵向、横向高质量发展的政策。

广博而富有创见的经济史知识为这一论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它使罗斯托能给14个国家的起飞描绘一张编年表。例如，英国的起飞是在1780—1800年间，法国的起飞是在1825—1860年年间，美国的起飞是在1850—1860年间。在完成具体研究之前，对起飞的确切时间和持续时间提出疑问只能是一无所获。就法国而言，J·马科佐斯基似乎曾确认，从现有统计资料中看不出确切的起飞时期，对从第一帝国战争结束至1900年之间的总产品的长期记录进行初步考察，给我们呈现出来的是一幅由产业群引起的工业持续不断的“突飞猛进”的画面，而不是罗斯托所说的引起一系列发展阶段的某个起飞点。

这些评论不会影响我们当前研究的主导兴趣，我们这里正在讨论的问题远远超出了这些评论所关心的问题：它们是发展的问题，或更具体些说，是全世界发展中国家设想的发展问题。

我们所理解的发展是各个部门之间的辩证法。罗斯托向着这一思想的形成走了一段路，但并没有走到底。他极为敏锐地领悟到，存在着构成经济整体的各个部分，并赋予主导部门以特殊作用，这就超出了宏观经济模式的全球性，并以含蓄的方式承认了推进效应；或许他的历史学观点解除了他继续前进的任务。

从同样的观点出发，对任何一位具有历史感的经济学家来说，对推进的类型、它们运行的条件及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显然是合理的；由此产生的方案或模式是美国历史研究一个合逻辑的结局。

在对世界发展进行的理论解释中应用这种狭义增长概念成效如何，对此提出一些合理的疑问，看来也许更为有益。当然，人们可能会争辩说，这仅是第一步，这个概念以后可以让位于对发展现象的辨认和分析。无论从哪个方面说，这一论据都似乎有点不能令人信服。在发展和狭义增长概念之间所作的选择，是一个涉及到这项研究每一方面的基本选择：初始观点、基本假设的形成、概念化和正式表述。不是认为主要的东西是结构之间的证辩法，就是假设核心现象是总产品的增长，把这种增长与一般原因联系起来就足够了，无需在哪怕是最简单的模式中描述这些原因是怎样相互联系的。科学和技术、人们的习惯、制度等等——罗斯托在我们正讨论的这部著作中考察的所有这些因素——与其说是结合在一起的，不如说是平行并列的。

而且，罗斯托关于发展的基本观点是什么？是一种谁都会遇到的变化，它或迟或早、终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每个国家。走向繁荣的秘密在“第一阶段”、在起飞点，其标志是一个积累过程、各种适当的制度和一个既定的投资和储蓄水平。

他并未完全忽视结构，但不认为结构有决定性的作用。而关于经济成果在总人口和不同集团之间的分配、关于宏观经济系统，实际上则没有告诉我们任何东西。

以土耳其、阿根廷和墨西哥为例，按上述时间表，起飞始于1940年以前。因此就应假定从那时以来的各个相继阶段已经开始出现了吗？最重要的是，不管那个过程是否明显，在增长的后几个阶段到来之前，以人口、地区和社会阶级的命运为中心的发展

的缺陷能被减少到最低限度吗？

全世界对发展的要求，尤其是对新发展形式的要求，提出了引人入胜而且刻不容缓的问题："自发的"增长能带来最优的产业结构吗？它本身能以一种满足所有人口需要的方式分配产品和总收入吗？或者，不论怎样，是否有什么明确而无可争议的证据表明发展中国家正向那个方向前进？

这里有足够的理由持怀疑观点。因为，在绝大多数各类国家中都能找到的其起飞并经历了各相继发展阶段的证据，都是由预期私人利润所引导并通过实际利润以储蓄和投资方式来维持的。到目前为止，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验似乎可以得出临时性的结论：依赖完全相同的制度——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各相继阶段不可能按照总人口的利益分配革新、投资及其结果。在不平等且主动性各异的集团之间存在着结构的和社会的辩证法，只有对这种关系加以组织和协调才能实现这一目标。我们曾说过必须对发展进行分析，这种分析会产生一种协调发展的政策和战略，这里难道不是在用另一种方式讲同一个意思吗？

卡尔·马克思及其追随者①

对于那些在读这一节时可以正当地持警觉和怀疑态度的读者，我愿意提醒他们注意，我的目的仅限于以当代就这一课题进行思考的潮流为背景，提出我本人对发展过程的看法。

毫无疑问，马克思激起了人数众多的诠释者的灵感，他们中有一少部分人亲自研究了马克思本人的出版物，但绝大多数人是依据种种解释、复述和使之通俗化的评论进行诠释工作的。因此，

① 弗朗索瓦·佩鲁：《卡尔·马克思》，巴黎，加利马德，波莱德，第1卷，附有马克西米利安·鲁贝尔写的评论；萨默·阿明："在世界的阶梯上积累：对不发达状态理论的批判，"奥特罗波斯，1977年，第2版，巴黎，IFAN。

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马克思思想的退化现象，这种退化物同马克思原来的见解相比，毫无精确性可言——这是所有具有丰富创造力的学说都无可奈何、必须忍受的一种命运。我们所以有意于考察这一特殊领域，这也是个无可非议的理由。更一般化的理由是，新的发展形式反映了就目标和方法而言是多重性的要求。那些参与这种新发展的人要求全面重建发展中国家与工业化国家之间的关系网络，包括政治的和经济的。这是一个错误呢，还是正相反，反映了一种真实无误的直觉，即在许多方面，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对世界历史中的这一问题所提供的既不是解释性理论框架也不是一种行动方案？

卡尔·马克思及其亲密追随者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以及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诠释家们，在考虑当时的不发达国家问题时决不是一清二楚的。他们观察的主要领域和思考的主要历史题材是英国早期工业资本主义及其最初在欧洲大陆上所采取的形式。只有很少一些著述、一些短篇论文和研究报告涉及到印度和中国。据我们所知，他们对这些落后国家并未进行透彻的分析。在他们眼中，殖民主义无论怎样残酷，毕竟使这些国家在发展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这些国家如想继续前进，必须经过资本主义阶段。

马克思的影响始终在徘徊这一事实，迫使我们为了说明20世纪后半叶的发展问题而重新对《资本论》的内容提出问题。干这种事本身就相当困难，况且还暴露在各方面批评的交叉火力之下。但无论有多大风险，只要是为了我们自己能够独立前进而必须领悟并确定马克思主义者用来指很多不同事物的术语——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可以用马克思本人的思想、他的怀疑和抉择、尤其是他的著作尚未完成这一事实来说明——干这种事就依然是极为重要的。

马克思的社会思想依据的是一种解放工业化国家内在社会和

经济方面处于不利地位、受剥削受压迫者的哲学。这一抱负是以空前浩繁的工作和百折不挠的勇气来支持的，它令人不得不肃然起敬。马克思从未写过不是在这一初始观点感召下产生的东西，在这一观点中，对人类无穷无尽的苦难的怜悯感同永不绝望地寻求一种能减轻这种苦难重负的有效活动方式的理性结合在一起。正如多少世纪以来的经验已证明的那样，如果这种努力不比黑格尔“美丽的精神”更有效力，它就会一事无成。因此人们假定，在物质的现实中，一种不屈不挠的辩证法是解放的唯一推动力。

哪种辩证法呢？不是我们根据我们的说明所定义的那种辩证法。我们认为，在我们的辩证法中，各个部门或部分之间的作用和反作用改变它们自己的结构，但并不毁灭自己，结果产生的结构显然是以前具有不同形式的各种结构的复合物。马克思的辩证法是黑格尔辩证法在物质生活中的颠倒，这种辩证法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上述术语之一——资本主义——最终被消灭、被其对立面所取代，这些对立面就是各种不同形式的社会主义。所有这一切都暗示，资本主义将消亡，给一种非资本主义社会、一种摆脱了压迫、剥削和异化的经济和社会制度让路。

于是，对**进化的辩证法**和**毁灭的辩证法**加以区分就不是无谓之举了。前者公开承认以力为基础的各种关系的存在，但排除该系统的毁灭；后者则以灾变、以系统本身的毁灭而告终。在阐述马克思主义方面出现的很多晦涩难解之处都是来源于这一事实：马克思的许多著作，从他的早期著作到他的生前没有完成而由恩格斯及其门徒继续下去的《资本论》，都可以被人引证来论证这两种辩证法，而毁灭的辩证法显然是马克思作为一位思想家之独创性所在，他所具有的影响中就有一部分是以此为基础的。

资本主义在发展的同时消灭着自己。从经济学角度看，由于剩余价值、固定资本和可变资本之间的关系，由于作为结果的利

润率的下降，资本主义在一个接一个的危机中徘徊，一次比一次糟，直至最后的突变。政治活动可以促进这一过程，当然，这一过程依然是该系统的内在必然性，它以基础结构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以两个阶级之间一分为二的斗争、以生产的物质关系为基础。

至此，我们叙述了作为马克思思想之特征的辩证法的主要经济内容。它依据的是一种把剩余价值增长率、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彼此联系起来，并通过它们，在企业间竞争的推动下，把利润率同前述各变量联系起来的经济机制。资本、资本积累或扩大再生产、剩余价值、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之间的关系——这就是自我倾覆的机制。各种"外源性"因素可能会使之变形，但这一模式就其包含的变量和这些变量之间假设的相互作用而言，是经济的。

由于列宁、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这一情况改变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表述方式足以把人引入歧途：列宁的辩证法徒劳地妄图调和这两种观点：资本主义在经济上不可避免的经济消亡；资本主义的灭亡是靠政治活动来实现的，政治活动以一次致命的打击毁灭资本主义而不是仅仅帮助它加速其衰退过程。这一根本变化在各种牌号的马克思主义者诠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中标志着一次决定性的转折，可以想见，所有马列主义者都会众口一辞，否认有这种根本变化。出于宣传鼓动和政治活动的目的，在适当的时候，或者坚持说资本主义自身正气息奄奄、就要完蛋，或者强调以严厉手段促其断气，这是绝对方便的。

伟大的战争撕裂了历史的织物，使社会震荡不安，使一伙新人飞黄腾达；这些人同过去人口中被压迫或被排斥的部分同呼吸共命运，向他们许诺，在社会中将给他们较高的地位。但是，经济结构的变化是缓慢的：例如，1789年的法国革命留下了一个相

当长时期未受任何触动的经济体系，它奋力斗争以求摆脱封建形式；而俄国1917年革命在经过多年拖延之后才于1928年实施第一个被奉为神明的五年计划，选择了工业化的方向。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同经济进步的要求毫无关系，这场革命是在一个发展最迟、最不成熟的社会中发生的，这一点一直被令人反胃但却是正确地重复着。

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它的进展和结果最终导致了雅尔塔，在这里，欧洲和世界被瓜分了，延续至今的生产和交换的资本主义发展被强加上了政治背景和政治限制。两个武装起来的营垒正在对峙，好象它们不共戴天、冲突难以避免。武装起义、夺取政权、党的机器，这些东西造就了一个新俄国，它绝非资本主义自我毁灭的辩证法的产物。更重要的是，1919年第二国际的崩溃证明了国家的生命力，证明它具有经得起阶级斗争肢解的能力。

列宁于1916年写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以此书继续了希法亭、罗莎·卢森堡和布哈林对金融资本的研究工作，但是，他把这一研究扩展到国际政治秩序及政治意图、决策和方法的领域，并涉及到资本主义通过自身发展而灭亡的辩证法，在列宁看来，资本主义的这种发展是靠资本积累、资本构成的变化、剩余价值的形成和利润率的下降趋势等机制而实现的。

在马克思和列宁本人后来的声明中，在他们的信徒和对手数量更多但质量低劣的诠释中，人们在想象中认为符合他们两人真实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被淹没了。但是，为了消除故意维持的混乱局面，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辩证法和政治辩证法加以区分，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显然，这种区分只是一种分析方法。

我们的目的是探讨马克思主义与发展问题之间的关系，为此，如果小心谨慎一些，不把作为马克思特殊贡献的经济启示同

列宁提供的政治启示相混淆，将会对今天的现实得到比较深刻的认识。这两种启示的含意都在于，如果要改造世界就必须认识世界，在同一意义上，如果要认识世界就必须改造世界，因为人们对他们亲手所为之事的认识，总比对自然界呈现给他们的东西的认识要深刻一些，这是大家公认的。马克思和列宁两人，一个以生产和交换的物质结构、以这种结构缓慢而吃力的变化为中心，一个则以夺取对国家政治和管理机器的控制的暴力方法、以改变政府的组成为中心，寄希望长期受挫的社会范畴的利益和渴望。

无论在哪里，在工业化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凡实行颠覆政策，都会以一种经不住推敲的发明才能使用这两种套话。事实是，马克思的思想受到了历史的抨击：它之所以具有长盛不衰的吸引力，仅仅是由于一种含混不清但在政治上却颇为有效的笼统性。假如《资本论》手稿不是在恰恰可望作出这种定义处中断，马克思的"阶级"概念或许会得到界说。但是，"手稿至此中断"。

那么，在经济利益集团意义上的阶级（《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在围绕着产业工人的"历史集团"意义上的阶级（安东尼奥·葛兰西），甚至在由一切具有"阶级意识"者构成的参与集团意义上的阶级（捷尔吉·卢卡奇），在这三者中应选择哪一个，这一点是否悬而未决？

或许如此，但只有抛弃《资本论》包含的经济辩证法才行。这种辩证法的全部基础是两个阶级之间的对抗：一个掌握生产资料，一个丧失了生产资料。正是在这二者之间，这种对抗——不仅是冲突，才表现出来并被扩大，才与一种经济机制和一种假定在发展的无产阶级化过程紧密联系起来。

可是，与后一种观点相反，工业化国家中的工人阶级已经显而易见的多样化了；这个阶级受到资本主义的"诱惑"，并部分

地被资本主义所接纳，而且，在一个长时期内，这个阶级的人数未必会增加，实际收入也未必会下降，它的生活标准也不会恶化。除了过渡的困难外，工业化势必在实际报酬方面（工资和社会转让）改善参与工业化的工资收入者的地位。只是在那些同现代技术和金融资本处于完全隔绝或部分隔绝状态的地区和经济部门、尤其是在农业方面，人们才会落伍。

至于发展中国家，在非工业环境中，原初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是闻所未闻的；只有在已建立工业的地区，在国外投资的地区，在当地的工业化和城市地区中，阶级斗争才发生。其他地方，在当地的农业体系或在那些依赖传统土地占有制度的地方，地方性的和经常性的集团冲突同工资劳动者、小私有者和聚积在一个集体单位中的农民的社会地位无关，它反映的是对剥削和压迫的反抗。这些农民的反抗不是工业化的结果，如果以明智的方式进行管理的话，工业化甚至可能有助于乡村改善条件，连根拔除贫困。工业对农业产生的推进作用显然是个有利于农民大众"非无产阶级化"的过程。

在全部人类历史中，社会集团之间冲突——合作或斗争——协作的情况一再出现。不能把历史简化为两个对立阶级之间的一种斗争，一个阶级支配生产资料，另一个阶级则被剥夺了生产资料。即使是当前，单这一个标准也很不够：它的重要性取决于作为整体的社会机体的组织状况，取决于使某个既定社会区别于其他社会并从而限定这个社会的权威和信息网络。

由于马克思的思想本身就不够确切并从而产生了许多解释，所以对基础结构和上层建筑的漫无止境的讨论也就难以避免。基础结构是存在于生产力（粗略地说就是能源、工艺和技术）之中，还是存在于物质的商品生产的社会关系之中，这个问题本身就造成了诸多困难，因为不同种类的社会关系与使用相同的技术

并不矛盾。

以社会生产关系为例，它实际是指生产单位中领导与处于从属地位的劳动者之间的关系。离开了使他们具有特性并给他们打上特定印迹的组织，就不能理解这种关系：正是社会关系这个词使这一点更为清楚。说这种社会关系（基础结构）构成上层建筑（法律、信仰、风俗、道德），其实就是提出一种解释对应物的方式，就是假定对应项中有一项是绝对的。

当我们想要阐明"构成"这一术语时，这种混淆就愈加严重了，我们故意针对一个疑点颇多的领域使用这一术语，据我们所知，马克思或他的继承者从来未曾澄清过这个领域中的疑点。换言之，基础结构是决定上层建筑，还是仅仅影响上层建筑？只有选择第一种说法才是同按照《资本论》提出的经济机械论精神作出的严格解释不矛盾的，这种说法反过来又是断言经济关系是产生各种态度的唯一基础，而第二种说法则被认为不是不可能的就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在处于不同发展水平的社会的历史中，受经济关系影响并反过来修正这种关系的态度多得很，不胜枚举。马克思和他的第一位追随者比他的其他继承者更加认真，他们承认同自然或社会强加的约束力量进行斗争的人的创造性。这种创造性排除了基础结构对上层建筑的机械的、无可怀疑的影响的可能性。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历史和这种历史明确显示出的选择与决策的多样性，也对此提供了一个证据。

列宁主义是许多政策中的一个，它强调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来源并一再重申对卡尔·马克思的忠诚：事实也是如此，列宁主义是在历史正在大张旗鼓地批驳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的时代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对那些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尚处于前资本主义阶段、但既不能够也不希望等到资本主义在其领土

上充分发展后才使其社会和经济摆脱国外列强控制的国家，有不容置疑的吸引力。有时候，它还诱惑其他国家照抄它们从很远的地方通过经宣传而歪曲的棱镜看到的苏维埃试验。

处于这种环境中，而且由于一跃成为最强大的政治和军事强国并且尚未"衰败"的苏维埃国家的威望，人们将会意识到，把资本主义和反资本主义、资本和劳动这种抽象作为历史中重要的活动者而使之实体化，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把世界描绘成这些假定的主角之间的拼死搏斗，也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世界在这50年间呈现给我们的、而且在其全部历史中以各种不同方式呈现给我们的，始终是处于进化中的结构和组织中的人民、行为者和集团——事实上，它们是活力参差不齐的小集团。

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即资本及其实质的概念。资本是各种物质结构对象——固定资产、原材料和机器设备——的结合，而这些物质结构对象从属于某种生产计划；它还是一系列受管理机构支配的金融资产、通货、股票和债券。这是对经济资本和金融资本的比较近似的定义，除此之外，有些经济学家纠缠于商品、对象和市场，他们或是特别强调金融资产，或是特别强调商品，而不强调决策者对它们的组织。

马克思使之流行开来的定义，即资本是一种控制资本的人（不是占有它的人）同以脑力或体力劳动为资本服务的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定义，应归于他对行为者、对人民的突出重视。

依属是一种普遍现象，无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也无论发展水平和社会制度如何不同。应当公正地指出，一个制度的标志既不是资本的使用，也不是资本所具有的权力。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的使用是为了获取纯利润，这种纯利润绝不会从一个抽象的市场中产生，只能从受其所属社会调节的市场中产生。苏维埃制度为获得净收益而运转，并没有证据表明这种净收益或社会

主义纯利润从工人产出中扣除的部分比资本主义制度少。

榨取剩余价值的方式——暂时使用这种粗俗的说法——也就是说，付给工人的少于工人产出（它也还需要定义）的方式，无论在任何地方，都一直在激励着雇主的聪明才智。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的固有特征，或者设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剩余价值比在某种前资本主义氏族和乡村经济中、或者比在某个苏维埃计划公有单位中更多。在这方面，我们不可能说出任何更确切的东西来。但是，我们可以提出强有力的假说。

一旦个人不再控制他自己的生产资本（一种近似于小农和手工业者的共和政体，只要工业化来临，它就不可能实现），对工人行使的权威就成了工人力图摆脱的强制。在高度工业化的大都市中，无论何处，工人都为维持生计而被迫去工作，假如他想以蔑视法律和秩序的方式反抗，警察和军队就会出面干预。这种复杂的和复合的从属关系不是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的发明，而是每日每时都可见到的事实，那些装腔作势自称忠实于马克思主义的制度从未消除过这种从属关系，也从未使这种关系的负担有所减轻。极权主义国家的教条主义，高度工业化国家和非工业国家的经验主义，同样软弱无力。

要给工人以某些现实可行的解放，唯一可能的方式在于一个正好相反的方向。这种解放不是生产力或物质生产关系的瞬时的和直接的后果，也不是以任何直接的和明确的方式依附于它们。无论控制生产资料与否，都不会以机械的方式获得解放或阻碍解放。解放事业取得进展同各种制度和社会竞争规则有关，当然这是在受这类制度和规则影响的范围内。这类制度和规则是各种变量相结合的历史产物，确实可以把这些变量描述为技术的、政治的、社会的和道德的，但它们不能孤立存在，也不能说是按照特定法则组合的。这种历史的组合是人类在各种情况下坚持说明冲

突、要求合作的结果。

冲突与合作按照不同的比例组合起来，但绝不会消除职能方面的等级和不平等。直至今日，从未找到过把资本的生产性使用同自由而全面的自愿劳动结合起来的方式。破坏性的暴力于事无补，它改变不了任何东西。自由工会在程度不同的民主环境中实行的调节，以及接受知识的能力和各有关政党的成熟，这是曾被证明为有效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工资劳动者就会在一定范围内发现，通过自由时间，按日常生活的说法，也就是有酬假日，是有可能摆脱对工厂的从属关系的。并非不需要付出某种代价作为回报，因为劳动生产率下降到确定界限之下，就会成为降低实际工资的理由或借口。这绝不是自动的或机械的，它在各个层次上都是受人类行为者或活动者的决策和活动支配的。

马克思主义思想中最薄弱的一环是对国家的分析和国家理论。如果资本的主人和从属的工人之间的对抗是对社会运动的唯一决定性的解释，那么国家就成了一块银幕，一个使我们又回到阶级斗争的视觉幻象。果真如此，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一元论解释就会合逻辑地接踵而至：剩余价值、资本有机构成和资本积累的法则或扩大再生产的法则将会说明一切。

我们以后还要回到国家地位的现实状况问题上来，巩固国家地位是新发展方案中最重要的目标，是发展中国家最坚定和明确的希冀。但现在我们还是把注意力限于那些引起上述分析并导致后面分析的看法上。

世界的规模是一回事，世界组织的范围和形式是另一回事。除了严格意义上的殖民主义消失和新国家出现之外，19世纪和20世纪国际资本主义之间的差别在于寡头独占在两个层次上的确立：一些重要政治强国的组织和垄断集团及相关集团的发展。我们自然会联想到美国、日本、欧洲和各种经济和金融联合集团。

根据所从事的经营活动的不同，后者在不断变化的程度上彼此合作和竞争，它们从事商品供应垄断的竞争，主要是靠市场之外进行的交易和革新来支持。至于政治强国，两大强国已牢固地确立起来，而第三个，即欧洲尚处于胚胎形态中。

面对这种瞬息万变的复杂情况和日益发展的各种形式，我们想起了梅罗·庞蒂这位目光敏锐的哲学家的名言："资本主义是混乱的。"资本主义由从事着非传统的但却极为有效的各种形式竞争的不平等部门构成，因而在其与公共管理机构的关系中，这些部门处于不平等的和可变的实力地位。如要简明地描绘一下这种局面，我们必须要提到世界范围内的各种积累和各种市场，并强调多元性。还没人敢这样干，因为这将使所有大国密征用作为一种整体的发展中国家的价值而实现的纯积累成为需要讨论的问题。

另一方面，如果对东西方的垄断资本主义进行详细比较，马克思主义方法还是受欢迎的。在东方势力范围内，有关的构成恰恰是"资本主义的"，甚至是更为"垄断的"，肯定是更"受国家控制的"。苏联势力范围内各国资源向苏联的转移已经制度化，因此对此已开始的研究，对于科学的比较这两种制度无可否认是有益的。

最后，把阶级斗争转换为世界级的，宣称它"不是发生在一国之内，"而是发生在世界体系中，这就是假定在与"世界资产阶级"成分对抗的"世界工人"成分中有一种不可能证明的团结。卡尔·马克思出于论战的目的谈到过同一国家内在同集体资本主义进行的斗争中抱成一团的集体工人。但是，把世界规模的合作要求和各种不同形式的冲突简化为实体化了的资本与劳动之间的撞击，而且两者都是抽象的实体，这真可谓登峰造极，公然与历史背道而驰。

那么可以得出的唯一结论就是，除了一种关心被剥夺者及其集团的社会哲学所作的杰出而具有刺激性的抨击外，马克思及其继承者的思想对于发展理论和分析很少有什么贡献。

发展的动力和动力学

上面所考察的各种理论贡献中无一包含着对静态和动态的一般经济理论的改写，虽然这在透彻地考察发展现象时是绝对必要的。因为L·瓦尔拉和Y·帕累托的理论为基础的传统均衡理论是以行为者在其中是无足轻重的各种条件为前提的，而且是静态的，所以它不能以经过分析的方式与决策、风险、信息、冲突、学习和计划、或换言之，同在今日高水平研究中必须考虑的现象联系起来。传统的均衡理论用一种形式化、机械化的方法去陈述客体在均质空间中运动的方式；既然这一体系处于平衡点上，只有源于外部的变化才能够使它离开这种平衡状态。

行为者及其活动单位的平衡绝不仅仅是对传统均衡理论的纠正或对它的一系列调整，而是在对经济活动的整体研究上，以及对这种活动的表示上都有根本的不同，平衡理论包含着不平等的、不同的"活动者"的相互作用；它们造成的变化之所以中断，原因在于它们耗尽了产生变化的能量——这总是暂时的。就这里涉及的是作为整体的系统而言，只要该系统内包含的持续平衡作用过程达到了这样一点，以致产生变化的纯粹总能量暂时耗竭，它就不再发生变化。在不可逆的时间中，可以观察到这些新的序列，并以分析的方式建构它们。

因此，在这种新的解释中，决策、风险、信息、冲突、学习和计划是题中固有之义。同以单一时期为基础的模式不同，既然这些内生性变量的均衡在一个时期终结时只能由外生性因素所打

破，我们就有了一个连续时期的解释，由于行为者在整个不可逆的时间过程内实施其活动，并不在某一既定位置上最终停止下来，所以这些时期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行为者正是通过自己的活动修正并改造其环境的。

人类的动力和动态学自然而然是这种新普遍互依论的一个特征，而在传统均衡理论中却没有它们的位置①。

有些经济学家认为，可以根据能给各种事件确定日期这一事实给动态学下定义。我们相信——这当然全不是一回事——可以把动态学定义为一种没有使行为者的时间中立化的解释。如果假定一个完全调节系统必然将以机械的方式矫正任何不均衡状态，这种时间肯定就被中立化了。事实的确如此，当行为者本人及其活动都被完全竞争的假设所排除，行为者的时间就不仅是被中立化了，而且完全被取消了。根据完全竞争的假设，价格是一种调节因素，它给各种事物以秩序，把这种秩序强加于种种实体，而这种实体却被错误地称作"行为者"，因为，这种实体根本没有记忆，没有对于将来的计划。

那么，从一开始就抛弃完全竞争这类毫无根据的不能容忍的限制，就可以在三个方面阐发动态理论。

第一方面涉及到背景动力，通过这种动力在极其丰富的历史因素和对这些因素的经济分析之间建立起相互联系。

可对三组因素加以区分，它们分别为（1）人口；（2）技术，包括发明、革新和应用技术所需的全部知识；（3）社会中涉及法人经济实体（如企业）的形成和支配它们之间关系的规范（如被认定为"私有"的财产、契约）的"竞争规则。"在这些制度性实体和制度性规范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

---

① 弗朗索瓦·佩鲁，"法国高等院校课程概要"，法国高等院校年鉴（1955—1975年），巴黎。

采用的方法是，最初把这些因素视为在某一既定复合体内独自运动的东西，分别考察人口方面数量和质量的变化，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变化，社会竞争规则方面的变化。采用这种方法的目的是在极其复杂的系统中区别开可控制的子集。

这并不意味着不承认或不充分估价当前为逐步揭示背景动力怎样在内部发挥作用所付出的势力，换言之，这并不意味着不去认识和分析在一个人口、技术和竞争规则的模式中各种变量的作用。

可通过这种内部活动（如产品对每一种动力和全部因素组合的反作用）观察到的现实似乎取决于发展的程度。例如，在发展中国家里，独立的研究和发展——就结构和效用两者而言——是不充分的或实际上不存在的，因为可以投入研究和发展的资源不足，研究人员和合格的管理人员也基本上缺乏。同样，对于总产量和人均产出增长的作用和基于人口增长率的得到改善的生活标准，也已进行过简要的分析。对修改竞争规则来说，结构之复杂程度有增无已是因素之一，对此也曾提出过一些假说。这些片断的研究和反映是有益的，但它们毕竟没有形成一个按逻辑的方式组织起来的并以统计学方式验证的一组命题。

与经济动态学中其他因素相关的背景动力表（表2.3）在概念上划分了各种关系，并显示了它们的复杂程度。

表2.3

	人口	技术	制度	作用与反作用方向
背景 C.历史动力结构	C_1	C_2	C_3	←↕→
S.构造—D.自毁	S_A	S_B	S_C	←↕→
发挥职能	产品—$S.D_A$	产品—S.D	产品—$S.D_C$	←↕→
M.市场动态学	供给—需求	供给—需求	供给—需求	

所示各因素集划分为子集，在这些因素集中，以组合分析这类熟悉的程序，或在某些特定条件下应用构成法，可以揭示出这一复合体的数量方面。

关于联系，经济学家或社会学家可以——尽管存在令人遗憾的零乱现象——举出如下例子：

1.各宏观组变量之间的作用和反作用：技术——人口、制度——技术，等等。

2.各宏观集变量与产品或产品的有效构成之间的作用和反作用。

3.各宏观集变量的有效结合与产品或产品的有效分类之间的作用和反作用。

以这种方法获得的必然是简单化的模式，如果以这种模式提供解释的话，它们肯定会以各种因果关系为先决条件。但是，在为实际目的而确定发展在短期、中期或长期内的形式和程度方面，并没有取得什么进步。

对于建构那些改变由基本单位（个人、小公司）组成的环境或改变其他结构（影响农业结构的工业结构、在发达或不发达环境中对外投资的结构以及其他等等）的结构，结构的动态学表示怀疑。

总之，任何具有科学精神的经济理论，如欲成为有效的，就必须考虑包含在“所有其他相同事物”中的数量浩繁而且实际上纠缠在一起的各种变量，我们如想大致上了解一种模式或方案可以告诉我们什么，以及它所提供的信息的局限是什么，这些变量就应毫无遗漏，并经过预先研究。

根据提出的问题，必须对变化不那么频繁而且范围较小的结构变量和运行变量（价格、供给和需求）加以区别。只要采用现代科学中采用的方法，把注意力转向各因素集和它们构成的系统，

对从那些假定是脱离其结构环境而孤立的市场模式中提取的信息的数量和质量，就不会产生错觉。

即使是类似于均质经济背景的情况，或类似于在一个经济区域或地理区域内均匀分布的相似增长的情况，或类似于能够均匀地适用于一个经济或地理空间中各不同部分的发展辩证法的情况，在历史中都找不到任何一个实例。国家构成的“整体”和一个国家整体内部的各个子集结合起来，融为一体，在一种不对称关系中发展。

因此，基本模式是把子集A（推动子集）和子集B（被推动子集）结合起来的不对称关系。

这种关系可以表明诸如产出增加这类有益效应，这种效应既可以是积极的（推进），也可以是消极的（前一次推进的受阻或下降）。为简化这种证明，我们选择某一子集的增长对另一子集的增长的作用，为了同一目的，我们以积极推进为例。在一个有构推进子集（例如某一行业）同另一行业之间，推进效应可以归因于：

1. 对价格和流通的效应，

2. 劳动生产率的转让，

3. 信息的转让。

用最简单的方式表达，这种效应可视为受动行业(一组活动)（gcB）的增长率与推动行业（gcA）的增长率之间的依存关系。

这可以写作：在某一既定时期内：

gcB = f(gcA)

在把代数的表示转换为统计的表示时，推进效应的测定要求有充分的解释，我们在其他地方已作了这种解释。由于这种解释具有无可置疑的重要性，所以，在国民会计和官方统计文献中往

往都可以找到对它的明确表述。

当把这一模式变得更为具体时，就可以看到它涉及到相当广泛的各种经济子集。

1. 在基础分析的非有构空间中，这一基本模式就开始以含蓄的方式在对基本供求曲线的静态比较分析中起作用了，无论在供给根据需求还是需求根据供给进行调整（或曲线上的移动）时都是如此。

新古典经济理论按其内在的和固有的规范逻辑，强调需求以引起假定是弹性供给的调整。这个系统为满足有支付能力的消费者的口味而运行。在各个层次上，在微观经济学、中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层次上，需求决定供给这一假设在确立消费者的自由或主权的"法则"方面，都是至关重要的。这里认为，整个系统是按消费者来调节的。

但在考虑到对销售成本的分析时，即使是基础理论也不能否认供给对需求的作用，人们普遍把销售成本等同于环境改造费用。需求曲线表示的是对某一公司的初始需求。公司首脑为保证这一曲线向右移动，同意承担各种费用，他们这样做时，就是在为自己的成功创造某种条件。供应商的供给和活动干扰了新古典理论传统逻辑的推导；在观察到这类活动的地方，唯一要做的事就是搞清楚它的发生是否反映了消费者的口味，或者它是否只为确保超额垄断利润而改变这些人的口味，置消费者利益于不顾。在任何场合，尤其是在不发达环境中，都必须作出这种区分，因为这种活动取决于消费者的信息和制约作用。

因为某个消费者购买了某些东西就断言这表明已经适合了消费者的口味，实际上就是拒绝对客观上有益的效果和社会效用作任何比简单的事实观察更深入的分析。如果已经最终决定在以资源、权力、信息各方面都不平等为特征的情境中运用完全竞争的

一套范型，拒绝这样做倒的确是不言而喻的。

2．就发展而论，将在有构空间中发现对这一基本模式最有益的应用。它们是：

刺激性投资，它不是凯恩斯具有多重效用的货币投资——我们如果想要避免常见的错觉，这一点绝不能过分强调——而是靠引起相互补偿来刺激其他方面的实际投资；

刺激性公司，它在一个地区内的商品、投资和信息的流通方面是先导；

刺激性区域，它以同样的手段并通过城市中心的影响而刺激或抑制某个“民族区域”的发展。

这些个别模式把我们引向增长或发展的**焦点**、**中心**、**轴心**概念。

这一概念的意思是在某个非地理基质或处于某地理实体内的人的有构群体中的生产行为者、有组织的资源、技术和经济能力的**集中**。

集中是有效扩散的先决条件。不可能找到发展的任何一个实例，因为工业化的开端已被正确地认定为**两极化**，这时，不存在集中这类现象，或者也可以说，这时并不以集中的意义为条件①。

---

① 弗朗索瓦·佩鲁：“培训的结果：从分析到统计学的定向，”*EA*，1978年第2、3、4期；“一个地区的车头公司和国民经济的增长”，*CISMEA*，*A*、*D*系列，1961年3月；“工业的车头公司和国民经济的成长”，*EA*，1963年第2期；“‘增长极’概念的解释”，*EA*，1955年，第1—2期；“发展的两极和国际经济”，“发展的挑战”研讨会，1957年8月；“发展中国家政治的两个不同概念：发展点和进步的焦点”，*CISMEA*，*F*系列，第12卷，1959年11月；“发展极思想与非洲总体工业”，《欧洲的道路》，1957年，第1期；“发展极与东方政治”，《外国政治》，1957年，第3期；拉戎吉亚、约瑟夫、德尔方德、皮埃尔、拉康、克劳德：《区域空间与领土的整治》，巴黎，达罗兹，1979年。

两极化这一概念风行全球，但在某些情况下造成了大量误解，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则引起了广泛的错觉。

指出两极化或集中化（不管是地理的还是其他什么的）是以牺牲其他经济区域或地理区域为代价而出现的，这不过是说出了显而易见的事实，并未使我们有所前进。关键不在于发现资源最初是否是从其他地方取来的，是否被集中在一个部门或区域，而在于揭示出，在根据集中点的结构和实质所选择的观察期结束时，集中化影响所及的整个地区或领域从那种两极化中取得的利益，是否不如它从较为分散的发展中本应获得的更多。就这点而论，这种历史的证据显然带有结论性。

当然，最佳成功机会不是靠在任何环境中确定任何集中点而获得的，要造成这种机会，靠的是选择适合于一系列经济因素或有关地理区域的焦点类型，靠的是为从这一焦点向外扩展准备最直接条件的环境。

在讨论发展政策时，我们还要回到这些问题上来。

我希望，我们已经论证了关于经济活动的经过修正的一般经济理论的统一性。

行为者及其活动的总平衡作用填补了对传统均衡理论的普遍而且非常正统的批评所留下的漏洞，传统均衡理论是在无时间限制的前提下建立的，它根本不考虑实际行为者本人。

这个新理论提出了一种新式的静态分析（或更准确说，是一种新式的变态学）和与之紧密相联的在逻辑上一致的动态分析的构造。

可以在各种国家中应用这一理论，因为没有一个国家能说是充分发展了的；这一理论关心的主要是还不得不在同一时期内构成其机制和结构的发展中国家。

而且我们将会看到，在当前科学和哲学思想的趋势中，它已

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在考察了这些问题之后，我们就可以继续考察发展方针了。发展方针是这种修正过的一般理论的延伸。

发展和科学的趋势：一些导向标

我们的确切目的，是揭示20世纪后50年间各种科学趋势同这种修正过的关于活动单位总平衡的经济理论之间的相互关系。对于这一修正过的经济理论，行为者及其活动是基础；对于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新发展研究的需要，行为者及其活动同样是核心。

因而，可以从三个领域中不断变化着的趋势之间看到某些趋同现象，这三个领域是：

科学

经济学

被剥夺者的渴望

一些导向标能说明新发展观的概念。

瓦尔拉、帕累托、古诺和埃奇沃思这些创立了一般均衡理论的人，其著作大多于1850年至1914年间出版。他们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强行简化了早期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广博而且开放的叙述，建立了一种纯经济理论，这种理论经过大力删繁就简，以适应按当时的数学方法进行处理的需要。

当时的经济状况同这种简化了的理论虽有矛盾，但并不明显。商品、股票、资本市场正在迅速扩大，中小型企业占绝大多数。在环境和社会教育的强迫下，挣工资的工人逆来顺受；私有财产和商品交换只受到无足轻重的鼓动家集团的挑战。科学和技术的进步唤起了热情，在一派繁荣昌盛气氛中，滋育了工人阶级解放的幻觉。社会的态度和价格波动的习惯性反应，使经济活动在

某些范围内是自动的这种思想具有可能性。循环被视为经济机体中的生理现象，其结果是势必忽视危机；紧缩似乎是扩张"应付的代价"，还包括对扩张的指望。似乎通过对价格运动进行预测的人的主动性，通过利润率的重新构成，就能消除错误投资，从而实现扩张。人们认为，金本位制能够纠正国际贸易中的不平衡。久而久之，广大公众习惯于按照价格机制和不平衡的自动纠正来思考问题。

至于学院派理论家——不多见的一类人，在许多实际问题专家中没什么势力——则尽力消除外行人类似的看法和那些头脑中带有不同程度阶级偏见者一再重复的言论；那些具有科学修养的人自然倾向于利用当时流行的数学理论。

杰恩·斯塔罗宾斯基作了一个简明扼要但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对比，他用两段引文总结了古典机械论的兴衰①。

拉格朗日在其著作《分析力学》（1788年）的前言中这样描述他的意图："把机械论的理论和解决与之有关问题的艺术简化为一般公式，只要略加发挥，它就能提供解决各种问题所需的各种方程……"。

19世纪末，物理学家恩斯特·马赫在比较百科全书派同拉格朗日、拉普拉斯的思想时，得出的结论是："在我们看来……这一概念是一种机械神话学，与古代宗教的泛灵论神话学相对。二者都包含着对片面知识的过分的和虚构的详细论述。"

要总结西方科学的机械论阶段，肯定挑不出比这更合适的说法了。

熟悉数学并对经济学感兴趣的作者想要改造经济学，使之成为归属于"社会物理学"的一种机械论。这在很大程度上要求助

① 杰恩·斯塔罗宾斯基，《理性的标志》，巴黎，加利马德，1978年。

于工程师；在牵制公众舆论并在得便时为政府和那些操纵生产和货币者的活动提供方便的运动中，存在一种神秘主义措施，给他们提供据说是同科学决定论一致的“经济规律”。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早就开始的变化迅速加大了步伐。企业越来越大、越复杂，在金融上越强有力。经济集团和金融集团采取了复合单位的等级制形式，决策中心对附属单位的产量和价格发挥着直接和间接的影响。随着企业的集中化，整个经济具有了新的形态。至于各个层次上的工资收入者，他们建立了工会，并利用政党去谋取较高的工资，在劳动生产率和产出中谋取较高的份额，并修改社会竞争规则。

在外部关系方面，各国之间在资源、权力、科学和技术能力方面的不平等促进了各种联盟和联合的形成。由于主要大国的引力作用，许多制度化的卫星国和一长列非正式的依附国环绕在它们周围。

在国内的各有构集团之间，在各国之间，一种互惠经济的网络开始出现，公共管理机构或直接参与其间，或在其中有某些发言权。论证仅是价格就足以公正地协调各种利益并造成现有和潜在资源的最佳配置，就意味着无视事实。

当在政治和经济秩序方面发生这些变化时，科学群落也在改变其观点和方法。

虽然科学在量子力学的精密阐述中仍在继续凭借力学，但它对分子生物学已产生了巨大兴趣，非线性热力学同分子生物学显然有联系。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这些科学沿着独特的道路达到了必然发生的、不可避免的“完整人的肉体、心理和精神统一的客观性。”当然，并不是说科学开始洞察人之最隐秘的内部深层世界，而是说，它们以理性的一致性和意识到其局限的实验方法的名义，摆脱了前一时期的机械主义的理论，牢牢地抓住了同把人

视为机器人的概念相矛盾、同受无情的外部力量支配的物理机械论相矛盾的现实。

新生物学和新物理学在不可逆的时间中建立其理论，辨认出在这种时间中被分叉点不断间隔开或被休止期和“灾变”所中断的进化路线，并在这种时间中寻找要求修正克劳胥斯一卡诺第二原理的耗散结构；这些科学提出了熵这个新概念；它们并不屈从于预测吉凶的诱惑，坚持把希望寄托于从大自然中学到许多东西并知道自己是在大自然中起一种积极作用的大自然中的人①。

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在对这种变动不居的趋势进行方法论研究从而与时代并驾齐驱方面，毫无作为。经济学家读的东西非常之少，令人惊异，阅读了大量书籍的熊彼特有如是说。有些人，其中还有专家们，正在仓促地试图泡制就事论事的实际方案。另一些人，即御用文人，则在故意或不自觉地发展使现存制度正统化的理论。极少数没有堕入这两个集团的人追求一种具有科学精神的经济学，这种经济学是他试图通过科学去净化、掌握并控制的有机知识体。但是，研究的组织方式和经济学的教学方式根本不能促进他们这种值得赞赏的努力。

有助于摆脱社会惯性的只能是现代社会中的实际经验。

与保健和卫生、教育、人口统计和环境相关的所谓人类变量势不可当地闯入了经济理论，而这是个很久以来一直把它们拒之门外的领域。对于信息和通讯有革命性作用的各种变量淹没并改造了传统的经济变量——价格和数量。

同时，现象与表示现象的数学之间的关系式样也已发生了变

---

① 弗朗索瓦·雅各布：《从生命中产生的逻辑》，巴黎，加利马德，1971年；杰克斯·穆得，《偶然与必然，评现代生物学中的自然哲学》，巴黎，斯瑞，1971年，伊亚·皮卓金：《新的联合》，巴黎，加利马德，1979年；G·尼古利斯和I·普利戈吉：《非均衡系统中的自我组织》，伦敦，约翰·威利父子公司，1977年；罗杰·凯罗斯：《不对称》，巴黎，加利马德，1973年。

化，正如随机模型、概率空间以及能适应各种潜在变量的软模型所证明的那样。系统论、博奕论、组合分析和前拓扑学的应用已经取代了古典力学以及带有严重局限并且信誉不佳的数学。

对事实的观察表明，现在需要的东西远远超过了传统的机械的均衡理论，现代科学的发展为此提供了新的动力和新的手段。

行为者或"活动者"在不可逆的时间中生活和工作。他们记得过去，规划未来。为了他自己的利益和他的社会，他表现为一种"熵"。他与年迈、疾病、事故作斗争。他和他的群体从平准前进到平衡，从一组平衡前进到另一组平衡，从存在表明可忍受的不均衡前进到另一种存在表明可忍受的不均衡，总是尽可能长久地推迟最终的"均衡"。

他和他的社会的进步不是沿着一条有规则的笔直的道路；那条道路必须经过波动、加速、减速、中断和障碍。无论所谈及的制度是多么自由，作用和反馈都要受某种等级类型的集体调节。这种调节绝不是机械的。它的效果和稳定性取决于实际社会中上下波动的信息处理和通讯。

新经济理论包含行为者和行为者在其中从事经营活动——购买和销售、投资和信息——的可延伸可收缩的弹性空间，这种理论可以毫不困难地适应新科学方法的背景。由于要实现规定目标、碰到障碍和受到其他派别的反对，行为者的扩张能力暂时受到抑制。两个行为者之间暂时的均衡是双方彼此对立的扩张能量暂时抵销的结果。整体的均衡总是暂时的，它将在扩张的纯能量接近于零这一点上得以确立。

这种新观点是从机械解释向热力学解释的转变，它正在开始修正经济思维的所有方面：激励理论、最佳条件、所谓的经济理论以及静态（同质蜕变）分析与动态分析之间的关系。它肯定会招来非议，因为它动摇了惯性，瓦解了常规思维，并揭露出传统

经济学所具有的绝对规范的特征。

参照科学并遵循科学的榜样而精心建立的新理论，直接导致了对新发展研究的需求。这种发展显然应归于各国中那些正在主动发挥作用的具有主动精神的精英们的工作，他们非常正确地相信，市场是为人而设的，而不是相反；工业属于世界，而不是世界属于工业；如果资源的分配和劳动的产品要有一个合法的基础的话，即使是在经济学方面，它也应依据以人为中心的战略。

因此使人认识到，传统经济理论始终外在于科学的运动，而新经济理论则是科学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并非无关紧要的。

本文现在依然在揭示哲学中的各种趋势，以便找出在高水平经济研究中最近的各种发展之间的某些相互联系。

发展和观念中的某些趋势：一些导向标

我们的注意力刚刚转向当前科学思想趋势和改善经济理论的尝试之间存在的一些相互关系。可以指出，显然只存在两种一般经济理论。

在一种理论中，市场孤立存在，被认为是一种与其环境毫无关系的概念中的实体；它的范例就是机械模式。

在另一种理论中，强调的是行为者、他们的活动，以及在使用他们的产生变化的能量修正其物质环境或抵抗其伙伴活动者的能量作用时产生的水准；其范例是一种热力学模式。

第一种理论强调市场，第二种理论强调组织；第一种以瞬时的、静态的、无时间限制的形式表达，而第二种则以动态的方式建立，处于不可逆转的、有方向的、从一开始就不认为是中性的时间中。虽然这一时间概念不应与历史时间混淆，它既为创新和发明提供了余地，也为持续时间提供了余地；行为者持续存在，

他有一个生命周期；固定资本持续存在；各种制度也持续存在。

两种一般理论之间的对立突出了它们都有一种通常没有明确阐述的哲学基础这一事实。

一眼就可看出，新发展观点和新国际经济秩序近似于这两种理论中的第二种，我们所有的研究都表明了这一点。发展是活动，是辩证法和精心建立的组织；个别系统的自我组织形式充满了冲突，它要求有更高级的组织为其提供相互的和谐。

除了早期的经典作家，除了少数享有崇高荣誉者之外，经济学家很少有人受过哲学训练，即使有这种经历，他们也讳莫如深，因为这会使其同事不以为然。这种情况使我们面前的任务更艰巨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根本没有可能把任何一种经济体系同任何一种哲学体系联系起来，但就我们的目的而言，为对经济学和哲学之间的联系感兴趣的读者精心选择出几个导向标仍然是有益的。可以认为它们指出了不可能由单个研究人员和一个研究小组单枪匹马承担的研究途径，对科学趋势的研究证明了这一点。

英国和美国的经济学家甚至直至今日似乎还在受功利主义的影响，这是个事实；约翰·斯图尔特·穆勒的著作对我们现在正从事的任何研究而言都不是个不适当的起点。

鼻祖们的功利主义，由于虽然并发但却各不相同的理由，逐渐被程式化、搀假并退化，在某些极端情况下，甚至到了这种程度，以致成了被讽刺地命名为“经济主义”的思想漫画。

在各个层次上都可以观察到对这种极端情况的反应。今天，没有任何一种重要的哲学落入简单的决定论唯物主义的陷井。可以说，所有哲学都是行动哲学，经过深思熟虑，可从中选择某一种。正是在行动哲学的思维中，将会发现与活动者的水准、与那

些精心设计的、复杂的、经常是矛盾的活动的最显著的相互关系，这些活动在一个由第三世界力量的兴起所支持的、与现存经济和政治秩序针锋相对的、以重建一种更合理的、明言的秩序为目标的运动中结合在一起。

约翰·斯图尔特·穆勒的功利主义①

据我看来，当穆勒众所周知的思想路线发展并逐渐成熟起来时，为理解其中固有的作为基础的一贯性、坚定性和创造性的关系，所需要做的一切是认真阅读《政治经济学原理》（1848年）第4册中以"论静态国家"为标题的第六章，并对穆勒论《功利主义》（1861年）的论文加以比较。附带说一句，这也将有助于避免把值得尊敬的功利主义混同于随后产生的伪造版本。

在上述那一章中，穆勒对资本主义的未来抱有雄心勃勃的期待。他认为，资本主义通过降低利润率和资本积累率而主动地走向静态国家。但这不是我们的主要兴趣所在。

穆勒并不把这种经济活动的缓慢下降视为无法补偿的罪恶。相反，他欢迎这种下降，因为它提供了机会，从获利的自大中，从使更高的价值受到危害的管理不当的"进展"努力中逃脱出来。资本和人口可不再以人类生活难以忍受的速度增长，这一事实可能有良好的效果。资本和人口的静止状态，"绝不意味着人类状况改善的静止状态"。当精神不再被"谋生的艺术"所独占时，对"各种精神文化"、对"道德和社会的进步"、对生活艺术得到改善的可能性来说，始终存在着广阔的余地，甚至工业艺术也能

① 约翰·斯图尔特·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方面的某些应用》，第1、2卷，多伦多大学出版社，罗特利奇和基根·保尔公司，1965年；《功利主义》（法文译本，乔治·坦内西编年表、作序和注释），巴黎，加尼尔·弗莱迈林，1968年。

被用来节省劳动。当他写道，他“为了子孙后代”而希望人类早在必然性迫使他们就范很久之前就“心甘情愿处于静止状态”时，穆勒这位自由的功利主义者淋漓尽致地道出了他最深刻的思想，一览无余。

对于绝不能仅仅限于物质享受的人类命运的信念，人们还能想象有更明确、更强有力的表白吗？

在就政治经济学写完一篇长篇论文后，穆勒在一份篇幅不大、论证严密的方法论论文《功利主义》中阐述了他的学说。

对穆勒的功利主义和J·边沁的功利主义，通常要加以区别。后者认为所有人类活动都可以被简化为计算快乐与痛苦，这不是重复某些哲学，就是某些哲学速写式的反映。把这类“幸福”扩展到尽可能多的人并不能使这种情况有所改观，后一种限制使这个理论凌乱而笼统。有些评论家已指出了边沁思想与当时盛行的各种观念相比的激进方面。但是，尤其是在工业资本主义还刚刚产生的时期，要求统治阶级或国家去作所有它们能做的事，不是显得对它们要求过高了吗？特别是当人们考虑到，边沁并不关心道德问题，或者说，即使他关心的话，也只是私下论述或过于谨小慎微的。

我们现在的思想气氛与穆勒的时代完全不同，这种变化就在于传统哲学要求正确方向，它导向被认为是人类固有属性的理性价值。

本书从一开始就表明它的目的是确立一个能被我们的“理性才能”所把握的善与恶的标准——它本身既不是快乐，也不象这个时代的某些道德家所担心的那样是与快乐相反的用途。人生活的唯一目的是其理性、感性和道德情感所领悟的幸福。有些快乐比另一些“更有价值”。对智者来说，就是判断并说出哪一种快乐与发挥我们的高尚才能有关。

因而才有那段驰名的话，“得不到满足的人也比得到满足的猪好一点；得不到满足的苏格拉底比一个得到满足的笨伯要好一点。如果猪和笨伯之间有什么不同意见，这仅仅因为他们只从自己一面考虑问题。”

所有人的幸福是功利主义的理想。牺牲没有道德价值，除非它的目标是保证其他人的幸福，而且在我们社会设置不完善的状况下，为他人牺牲自己是至上的美德。

在阐述其种种学说时大量利用个人利益来说明问题的那种经济学家们是否重新阅读过穆勒的著作？符合私利的眼前利益远远没有与有益结合为一体，它有某种有害的结果。只要存在对他本人或对社会是“高尚的”利益，有道德的人是不会同意按照是否符合私利去塑造其行为的。应用这一标准来对谎言和唯利是图作出判断，崇尚美德是对一切幸福最为有益的情操。功利主义之所以适用皆出于这同一基本态度。

重新读一下穆勒的著作，可以使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他的基本意图，但也对他使用的词汇产生了某种忧虑。

他的意图是道德的意图，是追求一种严格的、无可置疑的高尚和美德。

他所使用的词汇是一个无意放弃本国某种传统的英国人使用的词汇。功利是指追求能够而且必须要求的、但绝不能有粗俗唯物主义嫌疑的幸福的实用形式；它必须通过生活本身去传播；不必详细说明它最严格的要求，这样就不致使向善的意图感到沮丧；不过幸福仍然扎根于精神的升华，并从正义和团结中获得养分。它杜绝无休止的“贪得无厌”，而且对一个人所享有的财富数量不屑一顾，只关心他的选择在理智上和道德上的质量。

熊彼特说，穆勒的学说不过是一种表述自然规律的新形式，是对社会中人的自然规律的陈述，在这里，社会被认为是极为稳

定的，人的本性被极度简单化，能彼特这样说很可能是正确的。

穆勒的功利主义是以价值观念为尺度而建立的，上述这些保留丝毫也不贬低这一毫无疑问的事实。

原初功利主义的退化

这个与其说是依赖苦行不如说是依赖节制的、高尚但并不严峻的学说，也蒙受了真理衰退之难。即使最深沉的冥思默想也不可能脱离思想家周围的社会而独处一隅。把穆勒以哲学术语表达的观点作为当代英国贵族及其热心模仿者中最受尊敬的代表人物所特有的生活理想，这并不武断，穆勒希望看到这一理想在人民大众中广泛传播。果真如此，贯穿在穆勒著作中的暗含的儆戒或明确的证明已经逐渐丧失了其中肯之处和说服力量。血统贵族的重要性已经下降，他们在被疏远的人民中引起暗淡模仿的威望及权势肯定也已没落了。社会环境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就整体而言，追求平凡的幸福已获得日益增长的号召力，这种号召力并不象我们的作者所赋予它的那样同高尚的价值观念联系在一起，有“法定资格”的法官中的佼佼者把这种价值观念想象为幸福的标准。

工业经济和商业经济的演变并未重新形成资产阶级的意愿，同样也没有重新形成工人和中间等级的愿望。教育普及了，但并未伴之以伦理教育，信息更多了，但肯定不是更好了；而且当社会阶级之间的裂痕缩小时，穆勒的道德原理就丧失了它的含意，丧失了它的实践意义。有过这样一个时代，那时，高标准的幸福和与之相适应的价值尺度被当作理所当然的东西接受下来，那个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事实上，与穆勒试图使美德具有“吸引力”但并不削弱其道德力量这种乐观的尝试相反，致富已成为目的本身。

在随后一个世纪中，具有数学精神的经济学家，用其“中立的”功利和“极限”(为了经济满足）的理论，不能阻止和减缓这一运动。实际读过他的著作的人很少被一种对经济学的机械解释所吸引，这种解释由于同被非人格化的人无关而容易被认为是“中立的”。在这一系列的“科学”思想的终结处，我们发现了市场的自治和它的所谓自动机制的相互作用。

同时，对于基本需要和真实需要，人口中很大一部分缺少直接理解。广告宣传扶持起来的生产攻势刺激起购买欲望，这种购买欲望常被人讽刺地称为“消费癖”，表明它已成为一种流行病。产品的新颖实际上已变成一个价值，为推销更多商品而对人为需要进行的开发获得优先考虑，压倒了特权阶层、中间等级和工资收入阶级中境况较好者的真实消费。历史否定了穆勒各种高尚的意图并给他用以取代勤奋和义务伦理学的功利主义伦理学投上了怀疑的阴影。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生活方式的传播以及它在欧洲生活方式中的侵蚀更加重了这种普遍的混乱。沉迷于消费品和作为取得消费品之手段的金融利润，社会生活日益加快的步伐和道德松弛、世风日下，导致了那种粗制滥造的功利主义的出现，这种东西有助于“经济主义”这一术语的产生、应用和广泛传播。现在常随心所欲，漫不经心地用它来描述实际上颠倒的价值观念。由于这种颠倒，赚大钱的价值观念或理财学已占优势地位，压倒了同一种以家庭和社会为基础的制度紧密联系着的传统实践的经济价值观念。我们必须意识到“消费社会”、“福利和闲暇社会”以及“随心所欲社会”这样一类说法可悲的含混不清。无论我们愿意与否，这些说法都反映着社会联系的贬值。在一个认为消费“取决于”消费水平、消费水平使消费“合法化”的社会中——即使这只是一种笨拙的表述方式——如果消费水平下降的话，这个社

会将丧失其凝聚力和稳定性。当繁荣势头疲软时，在一种已惯于把增长视为自我保持、认为无需付出额外劳动和发明而提高工资是社会应得权益之一的环境中，这种需求将会使人倍感痛苦。

处于研究酝酿阶段中的两种行动哲学

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道德混乱加速了原始功利主义蜕变为腐朽享乐主义的过程，这一过程是对今日欧洲各国社会的惩罚。它们宁愿沉迷于吸毒和悠闲自在地寻欢作乐，而不愿如实地通过以具体化为基础的方案并从近似于社会冲突中有效武器的那些种种牌号的意识形态着手去留意各类哲学。

一般人从J·P·萨特的无神论存在主义中所吸取的是对于绝对自由的要求——假如他们懂得这种存在主义的话，但在这样做时，他们把它降低到最低水平。

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即他对马克思作出的复杂而又的确引起争论的解释，把对于历史演变的推理解释改造为一种“科学的”理论，这也被视为马克思的另一种论证，没有人还在不辞劳苦地在更深的层次上对它进行分析。

最伟大的思想往往最容易成为某种简化主义的牺牲品。这种简化主义是肤浅的，它为了能被懒惰的读者和职业鼓动家所接受而背叛了思想本身。

尽管如此，思考行动已成为有识之士的当务之急，这种思考同修正过的经济理论的主要目标不谋而合，并支持这些目标，也就是说，这种经济理论的基础是个人和行为者，他们或作为群体或作为个人进行活动，以改变其环境、削弱其对手。这种哲学与那些曾宣告“上帝死了”而现在却宣称“人死了”的理论，总是背道而驰的。

其中某些哲学提出了结构主义。如果这种结构主义同提倡固定性的学说是一回事，那么它就使人类活动毫无意义；如果这种结构主义被理解为一种使理性和道德范型分崩离析的手段，那么它就不过是一种思维可以全面展开的方法。

另一些哲学总是把意识和有目的的活动还原为下意识和下意识冲动。就极端情形而言，这类哲学使主动的主体和行为者荡然无存；如果这类哲学不仅是给自觉性和主动性划定界限，而是要澄清混乱，揭示它在类人猿难以理解的运动中所发现的混和物的危险，它们就是在呼吁对理性保持更高的警惕，对意志实行更严格的戒律。

那些我们无需照此方式加以考察的哲学，势必同我们作为解释历史运动而迫切需要的行为概念及对活动的解释背道而驰，那些最具有主动精神的人从这种历史运动中看到一种新发展观和光荣而宏大的新社会方案带来的希望。

在这一领域中的抉择无论怎样困难、怎样带有主观性，我们都认为，在世界迫在眉睫的激剧动荡迫使人们进行的研究工作中，可以而且应当从卡尔·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中、从基督教的行动哲学（产生于莫里斯·布隆代尔的个人人格至上）汲取宝贵的训诫。

行动受技术、经济、社会的环境制约但并不为这些环境所决定；行动从环境获得某些特征，这些特征表明行动在何处适宜，并说明它能以何种方式发生效用。

这类影响着我们制定生活方案、选择手段的限制因素是不能否认的。在一定范围内，人文科学中的理论和学说实际上总是价值论的：已知的人类现象不能简化为客体的状况，除非你要抹煞它们的本质特征，况且，当理论家把自己的解释模式应用于这种现象时，他总是带有或公开明言或秘而不宣的意图，企图对他所在社

会中的行动、这种行动的过程或某一方面施加影响。他只能在带有明显规范性的理论和规范性不那么明显的理论中进行选择。例如，在经济学中，纯主观主义是站不住脚的；正如不存在完全市场一样，不存在与世隔绝的、纯理性的经济人。同样不能接受的另一种看法是认为有完全受外部因素制约的行为者。大量难以反驳的证据证明了这一点：从大工业时代以来，工人、工人团体及其领导人物深思熟虑谋划的行动一直在改变着资本主义。这种改变从来不是由产生于利润、剩余价值、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之间各种比例关系的无情而盲目的机制的作用完成的，而是靠有组织的工会和政党有计划的活动进行的。

殖民主义的消声匿迹不是经济矛盾的结果，而是由于有组织的政治压力和对政权的军事征服。

马克思原初理论中保留下来的是被剥削被压迫者对自由日益高涨的渴望，当时，他们在一个有利的历史时期，成功地把政治活动同广泛的、潜伏的拒绝接受制度性弊端的运动结合起来。①即使在人们考虑到马克思的思想绝不仅是“无产阶级的自发哲学”时，它也是具有极其深远意义的教益；但马克思的哲学显然不是一个完整的行动哲学。

可是，在莫里斯·布隆代尔的著作②中，则可以找到一个精心设计、结构完整的行动哲学。甚至那些不接受这种哲学并且实际上已紧紧地抱成一团的人，也可以在其中找到榜样，用来构造他们自己的学说。

---

① 关于马克思主义向“乌托邦”运动的研究，见非常有趣的选辑：《乌托邦与欧内斯特·布洛赫的马克思主义》，杰拉德·罗莱特公司出版，巴黎，柏约，1976年。

② 莫里斯·布隆代尔：《行动：对生活和实践的科学评论》，巴黎，艾利竹，1893年；亨利·邓梅尔：《行动的哲学：评布隆代尔的理智主义》，巴黎，安波尔，1948年；杰恩·拉诺克斯：《莫里斯·布隆代尔：生平及其著作》，巴

在布隆代尔看来，不能把行动简化为一种活动主义或外在于人的操作，就整体而论，它是一种构成思维、意志和活动的能动性。它正是每一人类个体的基础，理应被视为一个现存的“我思故我在”。人类个体如不是有这种能动性，就将不复存在；这种能动性是意志、知识和生命的综合体。布隆代尔告诉我们，“避而不见”、“敬而远之”是不可能的；我没有能力“自我满足——自给自足和自我解放。”个人不是宇宙的自然产物，也不是生命本身成功的实现，而是一个其意识“仿佛来自上天”的行为；它是从“竭尽全力使其生成”的宇宙中产生的。

这一学说暗含着对上帝的信仰，它事实上揭示了自由的源泉和精神的秩序；它在所有思想中和实践思想的各要素中看到了宗教的成分。

这一哲学（在一页稿纸上难以论证其合理性）是一种能够指引并调节渴望“意识的交流作用”并为之而奋斗的每一个人和人类群体的行动哲学。

即使那些不赞成这一哲学的人也必然会承认，它为我们提供了最为一致和高尚的解释，说明了每一人类个体身上理智和行动的活生生的综合。

黎，法兰西大学出版社，1963年。

为使正文提及的那些地方更明确一些，下面是对卡尔·马克思著作中的人类能动性（A）和实践概念（B）以及莫里斯·布隆代尔著作中的行动概念的一些初步想法。

（A）能动性是人类所固有的。也许可以按照创造、活动和斗争来给它下定义。

个人创造一种与众不同的自我想象，这种想象是他所渴望的东西的化合物，是他自己、其他人和这个世界的投影。这种想象先于他的文字阐述和理论概括——换一种说法，它具有前认识的内容。

这个人通过以自我及其环境为基础的工作开始构造一个动态的、进化的世界；他尔后的活动，在因人、因环境而异的范围内，由一种目的所支配，这种目的的说法和要点会因其获得的经验和知识而改变。

在其活动中，这个人与自然和时间搏斗，他一般是靠平均信息量发挥作用，他也同他的对手和敌人进行斗争，这些人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他的同伴。人群关系是种既恨又爱的矛盾心理，它结合了冲突与合作、斗争与协作。合作的参予者也许是自觉的、认识到的、有意的，也许不是果真如此，时间造成的变化，一般将修正这一初始内容。

于是能动性从创造性想象前进到活动（工作和斗争）。无数的观察证实了这一初步的解释，由此推而广之，可以说它贯穿整个人类历史。它有助于理解由主动的个人构成的群体，但必须加以严格阐述。

对这个群体来说，创造来源于我们上面说到的合成想象，尔后这种想象也从这一群体本身的生活中产生。在个人的思想中，这种想象被组合在一起——而且也被歪曲：它先于它的口头阐述而存在，先于认识的过程而存在，它产生于日常的接触和该群体的集体生活方式、行为范型和姿态所施加的影响。

每个个人都可以对这个想象加以解释和阐述，可是，一般说来，使它见诸文字的是少数积极的解释者及其领导人物。现代通讯技术授予控制这一解释活动的少数人以巨大影响。

这个群体的活动就是它的工作，它是为了适应环境而以协同的方式组织起来的。它也通过这种有组织工作的内容和条件引起主动的个人的形成和变化。

斗争是群体形成和认同的工具，斗争是从一个群体内部或它与其他群体之间冲突——合作的形势造成的。

在一个地域的、协作的和亲属的群体中也会发现这些特征。无论在任何条件下，这些群体也不能被简化为物或抽象结构。

在个人和群体生活空间中存在着无数的接合点和交叉点。在一个诸如民族——国家这类较大的群体中，重要的东西是整体。这蔑视我们正规的分析或描述工具，只要使用这些工具，它就必须对它们以之为基础的抉择作出明确的限定（见附录：模型，它们的局限与适当应用）。

（B）卡尔·马克思所设想的实践是劳动的结果，这种劳动是在与社会的关系中由反映权力关系并分配社会角色的各种制度所限定的。实践首先适用于依附性的工资劳动；当达到资本主义阶段时，它改造着自然和人类习性。劳动者是重新建设世界和人性的工人，虽然他并非没有直接或自发地意识到这一事实。劳动者与结局已预先注定的历史过程联系在一起。

马克思在这一背景上描绘了一幅饱经磨难最终得救的图画，另一幅是与某种经济机制结合在一起并因此而确保胜利的自觉斗争，即利润率下降趋势的画图。战斗必须继续进行下去，但人们笃信不疑战斗将加速这种制度的崩溃，因为它的内在矛盾已经注定了这一制度是在不可改变的毁灭命运中运行的。

这个人通过行动创造了自身，在历史过程中，工人的群体通过自动实践再创造出它自身（马克西米利安·鲁贝尔：“无产阶级的自发实践”，《经济与社会》，*CISMEA*手册，1975年）。在其起源和发展中，这一过程与严格的决定论唯物主义全然无关，尤其与政治上的专政势不两立；这一过程由对其合法性和有效性日积月累的意识而发动并保持活力的。在这种意识中，理性的分析扮演一个伟大的角色。这一链锁反应的起源是什么？它来源于活动者不

能控制的一个基本的生活事实：人之固有本质。人类是创造者、工作者和斗争者，他们在行使这些内在能力中，并通过这个过程找到满足和实现。

现在我们来看看莫里斯·布隆代尔自其1893年的论文后在《荧仙座》（艾尔坎，法兰西大学出版社，1934年）、《存在与本质》（艾尔坎，1935年）和《论活动》（艾尔坎，1893年，法兰西大学出版社，1936年——1937年）中所阐述论哲学。

为理解行动中的个人，布隆代尔回溯到智力和意志力的"共同来源"，回溯到"他们由之吸取其行动力量的精神存在的原动力"（杰恩·拉克罗克斯：《莫里斯·布隆代尔》，法兰西大学出版社，1963年，第69页）。整部著作都是对"在行动中暴露出的思维与存在之间关系"的研究（上引书第63页）。

布隆代尔的行动哲学是理性探讨的结果和智力劳作的产物。这种劳作对于克服不能靠理性的调研、而需要信仰证明来处理的困境是不够的。主动的个人及其群体就其本性而言是有能力对其行为进行理性研究和理性思维的。在一个长时期中，这种理性思维可以揭示那从人类之初就潜藏在其下意识中的问题：为什么而行动？

人是"毫无目的地被抛在这里的"，还是"注定要并能够得到满足和实现"？答复这一问题是个超越所有逻辑的信仰的举动。

让我们同意纯粹为了得到启发的目的，把布隆代尔独特的、个人的和一致的观点放在一边，不顾不信仰者把什么东西仅仅视为上帝的假设，暂时接受他的体系。在理性思维和理性论证的另一面，存在着主动的个人的原动力。在它们之上，面对着最大胆最严格的理性探讨所带来的不可思议的选择，存在着一些东西——一种信念，一种对将来、对终极价值和目的的信仰，其中一个基本的实例（尽管是许多实例之一）是"人是自由的，每一个人都是自由的。"这是一种超越理性知识的确定性，超越其抽象构造和其经验的论断。从这一角度看，行动在某些方面是一种对自由之信仰及这一信仰之扩展的保证。它证实了处于可观察形态中的自由，这些形式就是解放的形式。

马克思在其思想遭到背叛之前所看到的实践，布隆代尔不参照上帝所解释的行动（只是为了更好地向那些否认上帝的人作出解释），提出了在两个并不彼此矛盾的体系中存在着的知识运动和抱负。这种知识的推动力从超越于理性探讨的源泉中流出，来源于人的原初存在。二者都达到一个信仰和选择归结于价值观念的地方，但单是理性思维既不能选择也不能培养这种价值。

对于主动的个人，依然是通过理性探讨向他们推荐据认为在空间、时间和环境的背景中对人类冒险事业是可能的各种道路。但是不管这种战略和策略的内容如何，假如行动乞灵于"所谓的历史需要"，以便逃避或嘲弄对历史作出判断的价值观念的话，它将背叛它的实质和尊严。

因此没有个人自身发展的无法压抑的原推动力，就不可能存在多方面的人类发展。

行动作为对价值观念唯一无可辩驳的诚挚，它为全面研究既是知识又是意志的精神提供一种无穷无尽的信仰力量，而且有能力通过研究获得对其客观的诚意和历史有效性的证据。

第三章　方针与战略

权力、强国与人类社会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带有矛盾心理的；冲突与合作往往密切地交织在一起，因而可以用“冲突—合作”这一术语来说明它们同时存在于一种“相互联结”之中①。

一旦明确了这一点，就会理解，在不可逆的时间发展过程中，冲突与合作并不一定是共同扩展的：它们的范围是根据不同的活动和两个相互作用着的社会在其规模、结构上的变化，以及两个社会所获得的信息的变化而变化的，同样，也是按照包括所有社会的所谓“全球”社会的发展而变化的。

在分析上，一切都可以根据物理学上的物体、力和力群——它们在经济上的重要意义，我们已在别处就其中某些细节讨论过——之间的不对称现象，即一个物体对另一个物体的不对称作用可以引起一种相称的、过之或不及的反作用这样一些现象来加以解释。这就最后提出了(a)权势、或(b)支配(强制)、或(c)服从。无论把它们制度化还是没有制度化，于分析并无多大关系。为了简单起见，我们可以把(b)和(c)作为主要的权力形式来考察。

如果按照让娜·赫希的说法，把权力定义为“把自己的意志强

① 弗朗索瓦·佩鲁：《权力与经济》，第2版，巴黎，多德，第43页及以下等等。

加于各种人和物的能力”[①]，那么，权力的目的性就被揭示出来了，

权力涉及到一切人类活动。但传统均衡论或新古典主义的支持者们过去则别出心裁地把权力排斥于市场之外，将市场仅仅看作是客体运动的场所。这种别出心裁纯粹是徒劳的：历史和分析已经恢复了权力在任何现实的、行之有效的经济思想形态中的合法地位[②]。

权力的形式是多方面的，包括技术的、政治的和社会的。由于个人从属于不同的团体，同时由于劳动分工和社会分层，因而在不同的权力范围之间存在着无数的交叉点。既然各个行为者或行动者是有差异的、不平等的，所以在他们所追求的目标或价值标准之间必然存在着各种利益冲突和不协调。政权（为了方便起见，我们用大写字母P来表示政权；用大写字母G来表示政府）在每个可以观察得到的社会中，都扮演着一定的角色。政权的职能一般被认为是保护团体的物质和文化遗产，充当可能会危害团体存在的各种冲突的仲裁人，并且促进团体目标的实现。

为了发挥这些职能，政府必须在现在那种有些语焉不详的所谓“集体意识”中去取得个人的赞同与默认。政府由于经常受到攻击、怀疑，处于不稳定状态，因而不得不反复为自己辩护，设

---

① 《权力》，日内瓦国际会晤，纳沙泰尔，巴康涅勒，1978年；让娜·赫希：《权力的本质》，第75页及以下等等。

② 赫尔穆特·阿恩特：《市场与权力》．蒂宾根，J·C·B·莫尔，1973年；琼·莱奥梅：《权力与经济社会》，巴黎，库亚斯，1965年；《当权的大资产阶级》，巴黎，法兰西大学出版社，1960年，冈纳·米尔达：《经济理论发展中的政治因素》，伦敦，罗特利奇与基根·保尔，1953年；艾伯特·O·赫希曼：《国家政权与外贸结构》，伯克利与洛斯·安吉利斯，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45年；伯特兰·罗素：《权力：一种新的社会分析》，1948年第6版，伦敦，乔治·艾伦；奥斯卡·摩根斯顿：《经济学研究的范围》，爱丁堡，霍奇公司，1937年（由维拉·史密斯译成英文，1934年以德文出版），弗里德里克·冯·威泽：《社会经济学》，纽约，阿德尔菲公司，1927年（由A·福特·欣里克斯译成英文）。

法证明自己的行动是正当的。政权常常寻找合法性，因为只有这种合法性才能使它成为一种政治权威。与我们有关的新的发展研究方法，其实质就是对权力的一种世界性挑战，是在世界范围内和各国中间建立一定形式的合法地位的要求，而这种合法地位决不能受到萨特所说的“欺诈”行为的玷污。由此便产生出一种超越利益冲突的美德，这种美德的重要意义就在于能够降低我们正在经历的各种危机的深度和严重程度。

既然要详尽无遗地调查西方和发展中国家各种传统权力的冲突是完全不可能的，那么，可以提出两个一般模式作为对西方和其他文化之间在合法性上种种冲突的系统分类与研究的基础。在经过长期抹煞与忽视文化研究之后，现在必须对文化给以认真的思考。

这两个模式都不能完全符合于任何具体的表面现象，而仅仅为研究各种具体问题提供了一种指导。

这两个模式中，一个是“马克斯·韦伯模式”，另一个是“反韦伯模式”。第一个模式人们都比较熟悉。自从它对于各种权力类型的研究成果问世以来，曾经引起很大争论。按照这种模式，力量是通过获得合法性而变为权力的，而这种合法性则是来自传统、功利和领导超凡魅力——这三种观念形态实际上是互相混合在一起的。应当指出，这种合法性在哲学上仍然是非常值得怀疑的。它的明显特征就是通过社会的合法程序把暴力变为实力。暴力的极端例子是一些人通过适当的法律程序——意思是依靠蕴藏在法律之中的意志力量和价值力量——把一些人处死，而法律本身则是由上面所说的合法性的任一根源使之合法化的。

无论这种根源可以是什么，在承认每个人的特殊性、不可替代性、无法预言性的许多世界宗教和哲学的相同观点看来，它是和人的生命没有共同尺度的。一个扼杀社会成员生命的社会，并

不会知道它在做的是什么，由此证明，这样的社会是轻视人的。然而，普遍地重视人则是一个社会能够正常运行和保持稳定的关键之一。不过，我们在这里希望引起注意的重点并不在于此，问题的焦点是：有何咨询程序来完全正当地要求社会成员奉那种通过行政机构起作用的政府之命，发表他们对扼杀生命合法性的看法呢？我们完全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这样的程序是没有的。

对别人处以极刑，我们是同意还是反对，这是一个道德问题。由组织机构恰恰在一定条件下——也就是说，在一定的抑制因素制约下——所编制的任何法定程序都不能足以敏感地如实反映各种道德决定。如果这些决定能够有什么道德力量的话，也一定是按照实质上是个人的看法来被理解的：每一项道德决定只是对他的良心负责，并且在任何情况下，这些决定都尽可能地摆脱所有的强制。

这种观点旨在指出投票箱与法庭的严重不足，而不是要为这些不足进行辩护。选举制度依赖于参加选举的各方，其中每一方的动机总是混杂的，道义立场受到野心的侵蚀。而法庭的裁决则是建立在警察调查的基础之上的，这些调查并不能完全排除对犯罪行为认识的倾向性。正象法院或陪审团的判决决不能不受到个人看法以及社会上未被公开承认但是非常现实的等级特权的影响一样，事实的"完全真相"也决不会被真实地揭露出来。

就是对于各种不同于我们自己的文化研究，韦伯的模式也至多或者最好不过是一个很少实际意义的社会学结构。把源于一定生活信念的东方或非洲文化称为"超凡魅力的"或"传统的"文化，我们能够从中获得什么呢？在何种理智的、合乎道义的辩论中，西方实用主义的无神论者能够按照其功利合法地位的立场来参加呢？这种功利合法地位实际上是建立在按照西方合理性的标准而衡量的社会利益基础之上的。

甚至在西方，韦伯的模式也并不是象人们一般所相信的那样，它并无多少说服力，并不具有"现实意义"，因为它不能解释和超越事实已证明是与提倡新型发展的人们的愿望正相反对的东西。

因此，不能匆忙地否定"反韦伯模式"。对于这种模式所提出的西方文化问题以及其他大陆文化问题，值得予以考虑。其他的文化正在探索自己的特点，并试图对它加以重新规定，但不是加以贬低、背叛和损害。所有迹象表明，这些文化都没有忽略财产问题，这就使它们处于与西方人的契约关系之中，但它们仍然是在现代世界所强加的、实质上是追求现代效率的情况下，从其自身寻找一种自主与统一的方法。

"反韦伯模式"可以用一个简单公式来概括：暴力从何处结束，政治就从何处开始。这个公式需要作一些解释。

不幸的是，各种暴力行为——犯罪、谋杀、持械抢劫、放火烧毁庄稼和森林、绑架勒赎、毁坏住房等等——都是那些拒绝接受法律、秩序或要求的个人和团体的产物，他们的各种犯罪行为就是由拒绝接受这些法律、秩序或要求而引起的。除了带有本能性的、类似反射作用的犯罪行为之外，为抑制其他犯罪行为所行使的权威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对那些法律或秩序的重新肯定。然而，没有证据，就不能做出任何肯定。这些证据既是从这样的推论中产生出来的，这种推论能够提供某种相当于明确的道德权利的东西，或者能为较小的罪恶提供法律根据；也是从在一个共同体内造成持久和平的各种态度的实际经验中推断出来的。因此，对暴力设定了一种评价和判断，这种评价和判断暗含在一定的社会制度中，同时被社会团体的某些成员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莫里斯·豪里敏锐地看到，制度体现着"社会休战"。制度为那种因各个对手富于变化的能量暂时耗竭而处于停滞的局势建

立了一种正式记录，这样，这些对手在相互对抗之后，至少会暂时地在一种合作的基础上取得一致意见。当然，环境一旦改变，其斗争又会重新开始。

西方社会现在视为最重要的政治成就和社会成就的东西并无任何其他历史渊源。这些成就所以被认为是合法的，主要是由于通过用实力的检验代替残杀的交换而使暴力很少经常发生，更不是那么残酷无情。能够使实力与暴力相区别的各种环境是靠长期的斗争建立起来的，这些斗争既不能归为在一定时间中被认为是合法的政府行动，也不能归为政府司法机关的裁决。

这些斗争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沉默的交换：它们始终是通过语言来进行的；要是在其不发达的形式中，就是用说话方式提出可以交换的意见的。斗争中的言语交换并不是对话，而是按照知识界所自觉或不自觉地确立的价值标准来说明人类斗争。它试图通过对所涉及的价值标准，如正义和自由的基本解释，来证明实力的检验是正当的。这些价值标准被故意用晦涩的、模糊不清的术语来表达的，并被各种观点所混杂。对于这些观点，对手们都明知是不正确的，但他们还是要更为肆无忌惮地坚持它，他们总觉得自己是在同社会丑恶行为作战，对此坚信不疑。

因此，只要通过对构成为社会制度一部分的暴力进行批判研究，暴力的动机就不仅能够有前提地而且能够合法地被消除或削弱。在每种社会制度中，都存在着“代言人”和“非代言人”、能公开表明的事情和不能公开表明的事情，这一点已被非常恰当地指出过。各个社会都是有等级的，“代言人”一般维护高级阶层，而“非代言人”则反映低级阶层的服从地位。只有通过对制度的讨论，制度才能更广泛地为人们所理解：对一个制度接受的程度，只能根据其所吸引的有见识的、有分析头脑的拥护者数量来衡量，而不能根据那些无知无觉的盲从者数量来衡量。

这样，分析就把我们带进了对话的领域①，或者换句话说，带进了自由交换的领域。通过这个领域，对于象自由、正义这些价值标准的看法就可以暂时地一致起来。

对话的每一方都要冒各种危险：进行对话的最初观点和声明很有可能被全部推翻。对话如果不是灵活的就会毫无作用，它只能是由各种陈旧规则所支配的一种理想化的冲突—合作形式。这些陈旧规则是西方从希腊人和犹太基督教徒们的传统中继承下来的，也是从其他非欧洲人的传统中发现的。

这些规则自然会排斥暴力以及诸如此类的力量，而不排斥那种具有说服力的、令人相信的论证力量。对话的提议者们应该在一种没有暴力的人类空间中开始、进行和结束对话。

这是一种确确实实的需要，这种需要直接指向理智的态度与社会的结构，如果没有这种理智态度和社会结构，对话只能是虚假的，或者从最坏处想，只能是象暴力交换那样具有危害性的言语交换，尽管采用的方法不同。

到现在为止，我们已考察了假定是在所属的各个社会团体中完全单独行动的个人之间的对话——这种对话已近乎不可能。而政治对话则显然是另一回事情，它实质上是各种有组织的社会团体或国家团体之间的对话。就是每个团体发言人的选择，也不能放弃对话的准则：对话不是由哲学家们所组成的，而恰恰是由共同意识到特殊利益的个人所组成的；团体往往愿意选择能够有效地应付各种特殊时空环境的发言人，而不愿选择那种只会对诚实与正义原则俯首听命的发言人。一般说来，发言人在严格的对话中不应该丧失自己的诚意，更不必丧失已经赋于他的团体的诚意。

---

① 热拉尔 贝尼斯和蒂阿诺："冲突与社会对话"，载《法国百科全书》第5卷，拉鲁斯，1960年。

这就是工会间或国家间“对话”的棘手情况。

正如政治本身有着内在的联系一样，政治“对话”也是相互关联的。人类进步的政治原动力就在于：不能把个人的良心简化为一种社会准则或者一些风俗习惯。其解决的办法不在于强迫压制各种冲突，而在于创造各种条件有助于使冲突的各方意识到冲突可能带来的后果，这种条件与某届政府或知识界精英们的思维产物截然不同。

这种新的发展运动，如果不能在全世界引起熊熊烈火的话，无论如何必须采取一种新的探究方法，一种指导原则，并以反韦伯模式为基础，经过一个缓慢的、持久的和累积的发展过程。

“反韦伯模式”为文化交流留下了充分的余地，这种文化交流远远超过了经济交换。这种模式要求在决定发展方针的内容之前首先革新其精神实质。现在，我们转过来研究的就是这个问题。

经济的和社会的发展辩证法

发展越来越被看作是社会灵魂的一种觉醒。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7——1982年中期规划》第64页，第3106节

很少看到真正有作为的经济学家或观察家至今还坚持认为无控制的市场力量自身能产生出一种具有完备功能的经济。

在整个西方，市场经济的逻辑受到了计划经济逻辑的修正。因此，按照美国经济学家K·博尔丁的观点和我本人十年前的看法，商业交换必定恢复到各种强制性转让关系——税收、公共征集等等——以及象授予、赠款和社会政策这样的社会转让关系

上来①。

计划经济的逻辑在《世界人权宣言》第3条中用每个现代头脑都可接受的语言作了表述，它声明“每个人都有人身的权利……”。因此，坚决阻止一些人对另一些人所实行的各种毁灭行为和暴力行为，并使社会组织把注意力集中到有害于人类存在完整的问题上来，不管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应如此。如果按这种方法所制定出来的权利是有效的话，那么，这比标明借方与贷方、利益与贡献交换上的平等来说更为重要。从表面上来看，这也是明显的。所以，必须对各种伤害行为对于人类存在完整所产生的直接和间接影响进行调查研究。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近来关于完善人的发展的普遍权利的文献中，可以发现《宣言》第3条杰出的续篇。

不论在一个国家还是在整个世界，这些原则就是被那些公开地或隐蔽地拥护现状的人们看来，也是具有革命意义的，因为他们是赞赏民族利己主义和阶级利己主义的。

到了20世纪，这些原则又得到了各种极其强大的社会力量的支持。被剥夺国家的社会力量在某种意义上已接受了上世纪被剥夺阶级的各种要求。非殖民化、发展中国家政治上的兴起和信息的传播，都在世界范围内向商业经济提出了挑战。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已“暴露”出来，象“正义”、“平等”和人类“团结一

本来面貌：它们是一些为既得利益服务的意识形态。

未必把人变为处于市场机制之中的机器人才可检验和应用科学上可证实的和经济上起作用的各种规律。

“纯”市场理论与被计划原则所“修正”的市场理论相互冲突，已成为工业化以来西方经济史上的一个明显的特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危机所引起的恐惧不断加剧，这种冲突已遍布全球。在增长速度惊人地提高的时期，计划的代价还比较容易承受，而自从危机以来，这些代价已在阶级之间和国家之间引起了激烈的争执。

最为重要的是，恰恰是西方经济组织的那些基础——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和国家主权——现在受到质疑。分散的资本主义经济尽管由其各种垄断集团和财团所控制，但它如果不能使世界摆脱饥饿与贫穷，那么，它能够逃避各种批评吗？而且，从大国与小国之间各种赤裸裸的不平等关系来考虑，国家主权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这些小国严格说来是一些“准国家”，因为它们不仅缺乏真正的内在结合，而且缺乏抵御外部世界的强大力量。

因此，用一种新的方法来研究发展问题的需要是产生于一种历史潮流之中。而这种潮流又混合着各种怀疑，如对自由经济学能否解决它预先没有计划解决的各种任务与困难的怀疑，对国家主权原则是否真实的怀疑。

在这里，发展方针与建立新型国家的方针是一致的：它们共同向政治的和经济的正统观念提出了挑战。前者目的在于改组有弊端的发达经济，调整这种经济不太协调的流动，改变外国控制和人力资源的浪费；后者则是试图重新制定新兴国家同其周围国家的一切关系，使这些国家挣脱所受到的各种控制，加强其内部结合，增强其交涉能力。

所以，新的发展研究方法的各个方面都是紧紧相互依赖的。

1．它从国内和国外市场的各种限制条件中来探寻自由度，这种自由度实质上是人的尊严：这就是基本需要与购买力的辩证法。

2．它试图降低由强国所强加的结构优势，寻找进入世界经济之网的各种通道：这就是独立与合作的辩证法。

3．它试图在工业与农业之间确立一个适度的平衡：这就是内部经济结构和外部经济结构的辩证法。

基本需要与购买力的辩证法①

这种反映极度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各种悲惨状况的辩证法，在发达国家也是起作用的，因为发达国家也是不能完全取消贫困的。而且，尽管这些发达国家已经在所搞的私人核算和社会核算上面取得了很大进步，但在与处于工作和生活中的人的完善相一致的对人的尊重方面，这些核算也可能是骗人的。

国家会计制度产生于私人簿记，而私人簿记基本是个人主义的，勉强是经济学的。所以，正象西蒙·库斯尼茨早已指出过的那样，国家会计制度根本没有扣除人的折旧。

对于社会成本的数量与结构对"人力折旧"所产生的各种作用，必须进行长期的调查研究。固定资产和生产资料的折旧一直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对于人力方面来说，这种折旧仍未恰当地实施，尽管人类工程学和对于工人疲劳的研究工作已取得了很大进展。

更重要的是，即令在最发达的国家，一些居民还没有享受到

---

① 雷金纳德·赫博尔德·格林：《人的基本需要是概念或口号、战略或计划、动员或迷惑吗？》，苏塞克斯大学发展研究所，1977年（复印本）；参见斯特里特·保罗的重要文章："基本需要：前提与前景"，《决策杂志》，1979年；伊洛：《就业、增长和基本需要：一个世界性的问题》，日内瓦，1976年；弗朗索瓦·佩鲁："人的成本"，《应用经济学》，1952年第1期。

一种最低限度的基本生活工资，或者是维持他们所在社会的一般生活水平需要的最低收入。

远在1952年，法国学术界就认为有必要计算“人的成本”，意思是一种确确实实的人的全面生活的成本。这些成本可以分解为三个部分：一部分是维持个人物质平衡与精神平衡的成本，一部分是能够使每个人享受智力与精神生活（教育）的成本，另一部分是给每个人提供最低限度的闲暇时间的成本，因为没有闲暇，就不可能有自我意识。

把这些成本引入私人会计制度和社会会计制度，完全是违反支付能力逻辑的，因为它承认生活中的个人在产品分配和收入分配中具有优先权。人的生命在法律上比财富的增长更为重要，虽然这一原则同其他原则一样，常常受到时间、地点和文化背景的制约；显然，它也可能遇到各种绝对不可能的事情的限制。但不管怎样，它要求对可能的东西进行严格的探究，因而要承认补偿的等级，并且发挥那种根本不同于支付能力所支配的补偿等级的作用。

对于“人的成本”的要求与计算，应当考虑到如下几方面的因素：

客观上各种“有益的”效果；

人的各种潜力；

多方面的最大化。

这种不加虚饰的说明又需要我们回过头来考虑内在于新的发展研究方法的一些要求。这些要求间接地来源于社会制度，同时又会引起各种情绪上的反应，而起码会引起重视科学的经济学与一般科学发展趋向的明显汇合。

客观上各种“有益的”效果。现行的经济理论是建立在主观价值和中性效用（或经济满足）基础之上的。它的力量就在于主张尊重个人选择的自由，这种自由显然是与政党控制下的计划中心所实行的硬性定量配给完全相反的。而它的弱点则在于：在一个人能够选择之前，他必须存在与生活；而且，只有当主体获得信息、能够作出合理判断时，主观选择的自由才能实现。然而，无论是用生产的观点来看，还是用消费的观点来看，市场只能部分地用严格的推论来加以解释。因此，那些能够出入市场的人们的偿付能力是和历史条件有着密切的关系，而这种历史情况就是与最不严格的经济推论也完全无关。结果是在每个人维持生命的（或生物学上的）需要和关于生存的需要，即那些与人的生活水平有关的需要被满足之前，先满足对奢侈和半奢侈品的欲望。

发展的目的决不是要强迫人们不情愿地象牛一样被喂养，或者永远作为小孩来抚养；也不是要通过把今天的人们压抑在受国家政策强制的计划机构中来寻找后代人的最终解放，而是要通过共同的努力，使人们能够自己养活自己，有意识地自己教育自己，并且不用暴力来实现自己的解放。

论战与反论战已经造成了越来越多的混乱，并使各种观察资料丧失了信誉。这些观察资料虽然是扼要的、原始的，但仍是无可辩驳的，决不能用讥讽或保持缄默来予以否定。尽管现在对于减肥的食物、最为安全的日光浴准备工作以及鸡尾酒和威士忌的优点等有着大量的报告，但也很难同意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全面地了解人体的客观需要在补救以偿付能力为基础的经济学的某些破坏性后果中，或者在指导顾客选择中，不起任何作用。安德烈·迈耶所写的关于用卡、配料和痕量元素来表示的正常食物构成的著作，对于个人与政府进行自我批评无疑是一个指南，它可以帮助有关人员来评判在所有方面都不尽合理的态度和行为模式，

而不是强迫他们采纳实验室的合理意见。

世界卫生组织为了人民的利益和政治领导人的利益，已经依据最充分的医疗知识，对于主要是通过市场控制来追求的各种目标进行了鉴别与分类：预防疾病、治愈一切能治好的疾病、降低由不易治好的疾病所造成的痛苦、帮助那些遭受长期疾病影响的人们恢复其社会地位并得到工作以及为病人及其家属提供各种需要，等等。我们中间有哪一个人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会拒绝接受这样一个计划呢？负责制定地方政策和国家政策的那些人，显然也不能忽视科学上提供给我们的有关空气量、阳光量和家庭所需的卫生这些知识……

客观上各种"有用的"、有益的或无益的效果已被重视科学的经济学所接受，尽管这种学科坚决反对这样的划分，但它还是将其注意力转向从这些效果中所接受的各种教训。它正在放弃维也纳学派和新古典学派的主观效用，并且超出了帕累托追随者们的中性经济满足。这些追随者们把使用或购买物品的各种愿望全部进行了分类。

人的各种潜力。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总是按照一定的目的起步的。对于发展情况的未来展望总是先于各种计划、方案的制定。为了鉴定地下资源，需要对矿物或能源进行预测，海底的物理性质和化学性质也需要调查研究。探求目标的投资应当先于为产品的生产和分配所需要的各种基本建设、基础设施、建筑和机器的投资。

探索未来远景要经历数十年的时间，并且有没有官方的援助，总要耗费各个财团所控制的巨大财力。因此，在发展中国家，私人利润的经济把一切都押在潜在的自然资源上，目的是运用这些资源来制造打算让顾客购买的产品：这纯粹是保持了它自己的

商品经济逻辑，而低估和忽视了对人的潜在资源的识别。实际上，这些资源不能就其本身来理解，而只能从其能为私人企业提供一个劳动大军的角度来考虑。由于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太穷，因而，人的各种潜力很难被一种营养、卫生、健康和基础教育的有效战略所发现和开发。这种全社会和各激进党派都充分意识到的矛盾，是产生各种暴力行为的根源。而国家政权在没有民主制约的条件下，只能设法暂时压制这些暴力行为。

真正的补救办法就在于经济学理论与实践的深刻变化。现在能够看到这种变化的最初端倪，但其进展受到商业经济学传播的错误思想的影响。

在“学究式”经济学中，这种变化的一个典型范例是设法用不同的办法来计算一个人的价值。① 可以常常根据一个人的大概寿命时间来计算他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撇开这种计算上的技术困难不说，这种“估价”的价值对于社会与对于个人来说，显然是不会相同的。同样，参照国民生产总值也不能准确衡量个人对其所在社会的各种贡献。另一种选择是计算在任何特定的时间中，一个人的死亡会使消费性开支缩减而给社会带来的损失。假如这个人是不能生产的，那么，他的死亡会降低社会的净费用。显然这就是这种方法的潜在内涵。最后，可以计算个人为使自己免受一种不幸事故的危险而付的保险费，但这只是与他希望为其家庭得到的财政补贴有关，而决不是他的生命价值的一种标志。

这些不完善的方法表明，从严格的意义说来，社会没有任何精确的方法来计算社会某一成员各种贡献损失的后果。

但这并不明显地意味着，就统计上同类的社会团体来说，不能非常近似地用数字来表示培养一个成年人所花费的劳动和他提

① E.J.米沙：《生命价值的计算与界限》，《政治经济学杂志》1971年，7——8月号。

前使用的社会产品。对于一定的团体来说，它的每一个成员首先要在40年工作生涯中占用大量的成品（如膳宿、实际工作职业用品、各种税款和社会费用）；其次，还要花费20年时间的培养费用（如生活、教育和业务培训费用）。在这两个时期应该选用什么样的价格指数呢？对于发展新商品、新技术应该给予什么样的津贴呢？在这里，由于不能考虑到生活于社会中的每个人之间的质量差别，而这些差别又没有反映到市场应该根据它们来决定的产品或成本上来，因而目前统计上的困难变得更加复杂化。

在那些更为重视人的命运本身的发达国家中，社会方针的制定先于计算，这就可能引起长时期的计算困难。但是可以说，尽管在最终分析上存在着各种障碍与危机，而劳动者和“被抛弃者”的命运也许会由此得到改善。

在发达国家中对人的能力还没有完全探索出来，而在发展中国家又会怎么样呢？

多方面的最大化。人显然有着与他作为市场上的买者或卖者，或者作为商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所运用的那些能力不同的能力。生态学、人类工程学、职业医学和精神生理学的各种研究成果有力地回击了狭隘的所谓市场经济计算，为经济学家展现了新的前景，迫使他们重视其通常忽略的各种事实。

正象消费易损货物不能成为一个利益集团的目的一样，重视科学的经济学也决不能忽视这些消费后果，即消费由其量与结构的原因而对行为者的身心平衡和他对知识、社会和经济的贡献能力所产生的各种后果。任何人都不会否认消费具有特定的内容，但也决不会承认这些消费后果宣告了市场经济完全无用，或者这些消费后果会促进各种“扩大消费”政策的实现。这些政策要求政府援助、对消费性开支加以社会控制以及对购买者进行教

育。

生产不仅仅是能够改变无生物的结构，而且也会影响工人，使其向好的方面或坏的方面发展，提高或贬低其全部价值。

总的说来，社会生活体现了行为者的活动与行为者合作的一种结合。行为者彼此给对方提供了一系列变化着的客观社会经济条件。在市场研究中，这些都被忽略。但如果我们要建立一种对经济和人来说都更加完善、更加有效的知识体系的话，则必须予以注意。

一种重视所有人和所有民族的经济学，决不是一种单纯的道德说教、一种产生于基督教伦理学并用以对付各种经济机制的理论。恰恰相反，它是一种属于经过科学检验的经济知识之列的对客观现实的正确反映。它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到，只有在开始探索、运用和开发人力资源的潜力之后，我们才能知道自己究竟是会变富还是变穷。这对于那些干予资本积累和干予适合于顾客支付能力的产品制造的老牌国家来说都是正确的，而对于那些正试图跻身于现代经济之网的发展中国家则更是正确的。

为了论述各种基本需要而必须指出的这一点，从这些需要自身的内在联系中也可以看得出来。

对外贸易领域中的援助方针和各种有利条件（象全面的优惠条件）只是产生了非常有限的效果。现在，在第二个“开发十年”之末，方针的制定者们和普通人们都在对目前所运用的各种战略的有效性表示怀疑。

就那些最穷的国家来说，任何人对需要进一步的援助都没有产生过怀疑。而对于那些中间国家来说，提出的怀疑是：工业化的战略要不要根据其内容以及进展的方向与速度来进行审查呢？

这种由发达国家为其自己的利益所制定的战略，导致了在带有大量从事农业生产的农业人口的经济环境中，小型工业孤立地

区和工业飞地的建立。这种战略以牺牲本国粮食消费为代价来鼓动出口粮食的生产，这就保持或加剧了有关国家贸易平衡中的赤字，因为出口粮食使肥料和机械的进口成为必要。

先进的技术从来不是孤立地引进来的，而总是伴随着本国生活方式的变化以及不加鉴别的模仿行为，这种行为实际上是发展中国家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对发达国家的一种反映式的模仿。常常受到批评的这种模仿，打破了各种传统的一致形式，使普通老百姓的各种需要和愿望受到忽略。为了使产品制造得象进口货那样好，为了填补技术上的空白，结果是牺牲了老百姓的利益，并使他们对国外的依赖长期存在下去。

作为对这种错误行为的一种回击，“基本需要”与“自力更生”的学说正在开始形成。基本需要决不是要缩减正常维持生存的费用量；得到这些费用量仅仅是一个必要条件，是第一步。

无论是在哪里，无论文化环境如何，人作为一种“使用符号的动物”（鲁耶），总是在他的食物、住所和工作上面标有各种符号价值。如果试图剥夺他的食物、住所和工作，那么，即使对于仅仅能够维持最低限度的社会治安也是危险的。假如他通过教育得到了发展，那么他将会用其他符号来取代其原有的符号，但决不是要完全抛弃这些符号。工作环境或生活环境、车间或乡村，都是传播信息的。符号经济不只是限于物质结构，而是渗透于整个社会。这种符号经济有着独特的功能，这种功能不能被简化为物质生产率或市场条件下的赢利能力。

发展中国家有助于我们理解“真正现实”的经济，这种经济不是由在物价指数引起物价下跌条件下的市场价值所能表达的，它涉及的是市场活动前后的实物及其符号意义。发展始终是文化和物质的发展，这种发展是比买卖交易更为重要的问题；它所提供的选择机会仅仅是环境所暴露出来的各种选择机会的一个

组成部分，而且可能是并不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组成部分。工具作为由人制造的生产手段，其意义既可被人接受，也可被人反对；在一定的报酬水平上，它既会促进也会阻碍人们的积极性。

如果发展中国家人民认识到自由时，其政治领导人便设法拿起由以前殖民国家所使用过的武器来维持其统治，这就是国家主义；反过来，他们又用国家主义来反对那种殖民国家。

另一方面，由已经引进来的工业所确立的典范又会对引进者自己产生一种迷惑力。

最后，一旦具备了许多条件，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显然会有助于收支差额实现平衡。

结果我们发现，在具备正常条件之前，各种相互作用着的因素的变化促成了仓促的、不协调的工业化。

为了阻止这种事态的继续蔓延，“自力更生”的口号现在被非常适时地提了出来。自力更生意味着这样一种发展形式，在这种发展形式中，能够充分发挥和利用人们自身的力量，教育人们运用合适的技术来在国内生产他们维持生活所需的各种东西，而不破坏他们通常的习惯和传统，这既与现代技术合乎机宜的逐步转变完全相一致，也与从国内储蓄筹措资金而实现的内生工业化完全相一致。

总之，在转变时期，自力更生不可避免地要依靠两种真正的和基本的倾向：要求工作的倾向和要求变革(革新)的倾向。

前者是由追加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决定的，而这种劳动是一个团体在某种既定的生活水平上，由于一种特殊刺激会情愿付出来的。

后者意味着产品制造单位组织上的实际变革。产品制造单位的负责人有能力引起这样的变革，以求从某种既定的水平出发，实现某种与利润完全不同的附加成果。

这一公式包含着各种类型的动机因素(财富、权力、威望),并且适用于所有单位(私人的、国家的或混合的)。它对于阿道夫·伯利所讲的"超越边际",即高于私人利益的成果边际始终是保持开放的。而一个社会如果能够唤起人们对于某种伟大的共同事业热情而持久的支持,那么,这个社会就能实现这种成果边际。满足基本需要可以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援助方法,另一种是收入方法;或者说,人们可以得到东西的援助,或者是可以找到要做的工作。

正象保罗·斯特里特在一篇有趣的文章中所讲的那样,把第二种方法看作是与第一种方法相平行的方法,也许是正确的。

我们假定生产资料已经准备就绪,那么,问题就是还没有满足基本需要的人们是否具有为被雇用所需要的能力和业务训练。如果没有的话,为了使他们能够就业,就要求工资上涨。他们一旦就业,我们必须过问就业者所得的工资是否会足以使他们继续工作下去,而不致有损于身体健康。按照雇主所作的计算,普遍地忠实于生产率的原则,曾经在殖民史上以及在殖民后的历史上毁灭了许多人。

而且,完全撇开工资雇佣劳动不说,自力更生还可以包括各种改进的行业活动形式、小单位或生产团体的合作联盟,这些行业活动形式和合作联盟都取决于国内习俗。国家本身招收和适当培养的教员,也能够帮助改进技术,提高生产,并使农村地区的居民从一种最糟糕的依附形式,即对食物的依赖中解放出来。

谁也不会否认在世界范围内,基本需要的满足程度是依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消费结构的变化而定的。有主见的专家们的证据和详细研究成果同样会明确地得出这样的结论。而且,在技术或组织上也没有任何不可克服的障碍。只是到某些事情无论如何是按照这些原则来做时,我们才会同意象朱利恩·本多在其一本书的结尾中所表达的观点:"所有这一切……都是非常麻烦的事情!"

独立与合作的辩证法①

所有发展中国家在其对外贸易方面，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严重依赖。在这一领域中，它们容易受到权势、支配和部分支配的各种不对称现象的影响。

在"权势"方面，经济状况比较好的阶级总是步那些与他们经常打交道的富有者的后尘，模仿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反过来，他们也被新的中等阶级所模仿，并被大多数人们所羡慕。

在"支配"方面，破坏正常贸易的威胁（A·马歇尔）和技术知识与财政资源方面的绝对不平等，使私人协定或公共协定的制定以及说明书的起草，经常受到沉重的压力，这对发展中国家极为不利。

在"部分支配"方面，在一些特殊部门中，商品销售的数量和出售的价格实际上是由那些控制市场的经纪人决定的，而这些经纪人受到各自国家的支持。

这些确凿的事实决不会符合于传统的对外贸易模式，无论是李嘉图—休谟的模式，还是赫克谢尔—奥林的模式。因为这些模式具有静态建构起来的特征，它们是以充分的竞争、相同的生产要素、既定的和不变的技术、以及被设想为非常完美的生产替代为前提的。

尽管这些模式不断得到更为复杂的补充和阐释，而且这些补充和阐释具有更大的独创性，但总得说来，它们基本上没有多少改变。这些模式是驱除国际贸易现象的结构，而不是为了理解而

① 弗朗索瓦·佩鲁：《赫克谢尔－奥林－萨缪尔森原理：关于国际贸易与发展不平衡的理论》，《发展社会》，1971年第1期；《重新建立内外经济平衡的理论》，《发展社会》，1976年第16期。

简化这些现象的结构。它们试图把纯市场理论应用到各种组织中来，但是，这种纯市场理论按其结构来说，是排斥任何组织形式的。

关于发展中国家，必须提出如下问题：我们所谈的贸易究竟是大公司之间的贸易，还是在能够为小单位和个人提供机会来表现其兴趣和偏好的对外贸易活动网络中，小单位之间和个人之间的贸易？

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富强国家的生产者与贫穷弱小国家的购买者之间垄断障碍的干涉，很可能促使出口交换比率的通行原则徒具形式，并从其大量物质贸易中获取利益。

象技术差距理论（M·V·波斯纳）和生产周期理论（R·弗农）这些新理论，非常正确地把各个国家看作是各种相互不同的结构；因而这些理论是对那些传统模式的突破。

在对外贸易关系中，发展中国家结构迫使它们处于为其合作国家服务的地位。

由于发展中国家接受外国的直接投资，因而使这些国家向其国外发展。这就导致了贸易结构的畸形发展，并使某些贸易种类处于优先地位。

在许多场合下，发展中国家面临着一个“非资本化”的过程：由外国公司输出的资本大大超过新输入的资本。

此外，商品的流动也是于进出口交换比率在某些方面遭受长期损害的条件下进行的。

另外一个因素是“智囊流失”：最好的工程师、科学家和技术人员被富裕国家所能得到的薪水和设备引诱离开自己的国土。

总之，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不仅私有的，而且公有的——逐渐陷入到外国决策者的控制之中，所以这些国家正在遭到物质上的损失。基于这些情况，因而在对发展问题新的研究中可

能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对外政策问题应该确定为：有步骤地、不懈地努力去实现与局外人必要的合作和需要自主发展之间的协调一致。

新发展方针的要旨。 在接着分析实现这一方针的条件和资源之前，我们可以先从整体上考虑这种方针的各种目的与目标入手。

其目的非常简单，就是要使人们从国外控制中解放出来，并使这种解放与每个人的体力和智力的发展相一致。一个国家就是一个蓬勃向上的民族，它是一种把活力逐渐灌输到整个社会机体的发展过程的结果。

体力的发展与智力的发展这两个目标本身未必是完全一致的。

接受奴役或服从地位的人们可以获得福利或事业上的成功，历史上不乏其例。

而且，由其他人，例如由一个寻找顾客的卖主所评价的体力发展，完全不同于由一个关心维护其文化特点（一种在所有意义上，甚至在产品的生产和交换方面都是丰富的占有）的民族所评价的体力发展。我们在开始时就面临着多种尺度的决策，而这些决策如果包含着心理的和文化的价值的话，那么，这些决策总是难以、事实上也不可能以模式的形式来表达。

然而，如果忽略了国家利益或国家利害关系的概念，就会忽略具体的、实际的和迫在眉睫的问题。这一概念在知识精英和精神精英之间是非常敏感的，而且在一些新兴国家统治阶级之间以及受这些阶级统治的人们之间也是非常敏感的。因而，这种讨论不能仅仅局限于纯市场经济的范围，尤其是在目前世界形势要求我们把眼光放到市场经济的"不纯"上面，或者确切地说，放到"纯"

经济的“不纯”上面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尽管这些都是按照实际情况推测出来的理由，但也更多地是分析出来的理由①。

一个国家或一个国家的经济都是有结构的组织。组织属于无实际意义的、形式上的经济领域。它是以在实体中建立一种等级制度为先决条件的，而这些实体从整体上看，则是一个更大实体的组成部分。这完全符合于单独的公司和公司群，也符合于各种行业和地区，因为它们也包含着一种组织因素。国家和国家群也同样如此。

与组织密切相关的是标志国家的另一个基本特征，即：国家是一种“结构”，也就是没有时间、努力和花费就不能改变的一套整比例和关系。一个国家可以被描述为“工业化的”或“农业化的，”描述为工业产品的“出口者”或原材料的“出口者”；它也可以拥有具有整套轻、重工业的完整工业体系，或者可以拥有与重工业中心无关的加工工业，等等。但是，无论如何不能忽略这一点，即一个国家或一个“国家的”经济既是由依赖于本国人所制定的各种决策的经济空间组成的；同时也是由依赖于外国人所制定的各种决策的经济空间组成的。显然，发展在于结构上的改变。一个单位或一个统一体的适应性，即打上其数量与结构烙印的变化，既不是零，也不是无限，而是依各种价格和其他许多参数而定的。一方面，地方化固定资本的广泛利用，以及组织结构上的惰性会限制这种适应性；另一方面，一般技术信息的传播和对熟练工人以及管理人员的多方面的培训，又有助于增强这种适应性。总之，与在充分竞争条件下设想的流动性和可分性相

① 弗朗索瓦·佩鲁：《国家的独立与相互依赖》，1969年第1版，巴黎，奥比埃·蒙泰涅，1971年第2版，第10—18集；卡里·莱维：《平稳的妥协》，前言由雅克·帕里泽所加，奥塔瓦·凯贝克发行，马松公司再版，1972年；“阶级冲突与国家冲突”，《发展社会》，第1、2卷，巴黎，《经济杂志》，1979年；F·佩鲁：《垄断集团的对话与国家的对话》，P·U·G，1982年。

反，不充分的适应性和不可分性现象会加速发展中国家结构上的危机，而这些危机总是伴随着各种灾难性的后果。

综上所述，“国家”作为一种组织和一种结构，不能被排除于国际贸易理论之外。这样的国家是一种有结构的装置，它是由许多子集（无论是地方化的或不是地方化的）构成的。只有政府或国家行政出面，才能够改变象纯市场理论的拥护者们所描述的各种生产功能。

所有这一切的后果是多种多样的，而且都不利于发展中国家：

1．各个“国家”的结构彼此是不同的，那些具有能够自由支配储备和信贷的结构，至少在正常条件下，能够减少来自外面的冲击，而其他的结构由于对外贸易集中控制，因而非常易受冲击。

2．强有力的结构能够借助国外的财政援助和市场组织来“推动”出口，而不是由事先的外部命令来“拖动”出口。后者只是传统模式所理解的那种出口。

3．强有力的结构不仅允许非价格的竞争（通过多角经营和销售价格），而且允许主要公司间混合的竞争，这些公司和一个强国共生地运行，并且选择较弱的经济和国家来作为扩张的范围。

4．所有这一切长期积累下去的结果，必然会给前者造成一种对于后者持久的结构优势。

因此，不平衡和不对称是一种经常的现象。在我们回顾过去时，眼前的严酷现实有助于我们了解19世纪世界贸易的扩张。这种扩张是以英国霸权、通过国外投资而形成的市场、以及在生产和金融领域中贸易关系和垄断组织之间的密切联系为其特征的。

因此，新的发展方针、伟大的解放运动具有这样一种特殊的、

显然已经决定了的要意：

A—发展中国家受到了一个由外部利益决定的、并且适合于外部利益的“结构变化过程”的影响。

B—这些国家要想按照其政府要求的、并从人民的利益出发所规定的路线实现“调整”，必须进行经济的和政治的斗争。

A.最终由外部所强加的结构纯粹导致了发展中“进口”的不平衡以及贸易与生产的向外发展，同时也影响到在基础设施与生产资料上的投资结构。不仅如此，它还影响到这些国家的生活方式、企业家与管理人员的培养以及顾客的口味。由于更富裕、更强大的经济一贯违反群众的基本需要，因而引起了一种普遍而畸形的发展。

B.如果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进行反抗的话，根本不需要为此而寻找新的理由，因为在某些非常陈旧的理论中就可以找到现成的理由。

保护新兴工业是由美国在其早期提出和发挥的一种论点。这种论点曾被反复收回，直到最近才又重新提了出来。但这种论点的一个重要含义至今还未被人们所理解。不过，它所包含的真理成分最终会迫使人们承认这样一种必然结论：如果竞争的各方太不平等的话，竞争就不会存在。

竞争具有自己的运动规律，如果事先就规定了竞争的结果，那么它就丝毫不能发挥其自己的优势。经济竞争应该导致“最好的”生产者的胜利，这种生产者以最低的成本生产，因而能够以最低的价格出卖。假如竞争中的某一方实际力量非常强，足以生产它所需要生产的任何东西，并迫使其他各方暂时地或长期地接受由它自己所定的成本和销售价格，那么，竞争就不过是一种欺诈。这样讲，也许有点夸张，但我这样做的意图只是为了引起人们对于被现行垄断理论或市场控制理论所忽视的各种支配问题的注

意，因为现行的垄断理论或市场理论实际上仅仅依据的是两个参量：价格与数量。

希望摆脱这种结构优势的发展中国家也应该借助于预计比较成本的概念，因为那些经济上最强大的国家力图寻找理由证明取消以现行当代比较成本为基础的关税壁垒是正确的。它们所推崇的自由主义不管其最初作用如何，只是一种表面上中立实际上是有偏向的学说。

我们可以以美国历史悠久的、欣欣向荣的工业为例来加以说明。美国的工业是在高技术部门中运行的，它的成本（例子不是虚构出来的）可能是一个欧洲国家工业成本的1/5到1/6。我们也可以随便举出一种“纯经济的”例子来加以说明。为了避免结构优势所造成的严重后果，给目前还缺乏竞争的工业提供发展机会，必须适应和实现高效率的生产和销售能力，因而要求制订一定的战略。这种战略将依赖于各种因素，而仅仅研究成本与数量是不能把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的。那么，如何检验美国一个经济集团或金融集团同发展中国家一个企业之间的实力呢？

为抵御结构优势而制订的各种战略是众所周知的：它们是由进口替代、出口的多样化、以及对进入世界贸易市场特定位置而进行的仔细而持久的探索组成的。发展中国家缺乏的主要是财政资源和讨价还价的能力，不管怎样，这些国家靠各种与特殊的产品、成本和价格有关的孤立活动是不能解决其各种问题的，需要的是一种整体的、内生的、综合的防御战略，而且这种战略要一直坚持到有可能转入进攻阶段为止。

进攻的战略非常简单地说来，就是通过在本国资源的管理以及由此引起的利润分配中供本国居民占有更大比例的办法，来组织有关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我们并未谈到本国居民的专有利益，因为假使运用了所有合乎需要的纠正办法，国际分工的问题还会

依然存在。

在这种结构方针许多相互关联的问题中，我们应该选择哪些正在出现的有关两极分化的问题来加以研究呢？

在整个经济发展史上，还找不到一个不同的群体和地区曾经经历了相似的、平衡的、分布均匀的增长这样的特例，也找不到一个不同的群体和地区曾经经历了分布均匀的持续增长这样的特例。

事实上，增长和发展是与地域集团有关的，而且也是与在某些特殊方面投资、人口、贸易、信息的集中有关的。这对于那些大公司、公司联合体、地区经济密度不均匀的国家以及整个世界都是成立的。

我们可以将注意力集中到一种单纯的两极分化形式，即工业上来，因为工业对于当代任何国家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一个工业公司集团就处于一种经济空间之中，这种经济空间（一种没有任何特定位置的发源地）指的并不是一种地域，也不是处于一种地域空间（一种有位置参照系的发源地）之中。

如果一个集团在其所处环境中引起不对称的增长和（或）不对称的发展现象，而且这些增长与发展现象至少在一个时期中是相反的而不是同步的，那么，我们就可以将这个集团称之为一个增长的极或发展的极。

让我们只考虑地域空间。经验表明，如果开始时说空间在经济上是“空寂的”，那么，一个工业集团，或者为了方便起见，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之为一个大单位（LU），能够象一块磁铁一样地吸引一群其他企业和公司（在零售贸易、运输、通信等部门）。这种集中过程所需要的追加资料，不是从同一地区、同一国家的其他地方借来的，就是从外面进口来的。如果是从其他地方借来的，这种集中就会伴随着各种分散的情况，而这些分散的情况曾

经引起上面所说的误解，同样引起了大量无谓的争论。

这些动态的互补性现象是大单位吸引力的的结果，因而大单位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一种推进器。它一旦形成，就会通过对原材料和劳动力的需求，或通过产品的供给，来实现其进一步的扩张。不管以前的运输线和通信线是否能用，也不管大单位是否有助于把这些线路让官方修建好，不同地方的联系总是要产生的。结果就形成了轴心。由于新的投资机会展现在经济行为者面前，因而扩大了他们的视野；与此同时，刺激了信息和消费需求。

不同技术领域（包括制造、组织、运输、人力资源的培养）交界面的相互作用增强了这些联动作用。

与动员短期内闲置资源正好相反，这是一种能够在长期产生“推进效应”的各种互补因素的联合行动。如果我们考察这样两组顺序：投资顺序和分配顺序，就会明显地看到这一点。

1.一种典型的投资顺序描述的是某种投资行为与它所引起的后来的投资行为之间的关系。

在任何增长过程中，总投资（I_T）都是最初增长引诱的投资（I_E）与劝诱投资（I_c）的总额，而后者本身则是在各种吸入线（劝诱投资线〔1，2……n〕）上各种劝诱投资的总额。

$$\Delta I_T = \Delta I_E + \sum_{1}^{n} \Delta I \qquad (1)$$

因此，从额外投资到额外产品（P）的转化通常是把资本产出率的倒数（1/K）应用到投资上来表示的。显然，这是一种运用产品构成因素（S）所能改进的并不令人满意的方法，因为产品的构成不是单纯取决于资本的数量。

这样，我们就可以列出一个通用的公式：

$$\Delta I_T \frac{1}{K_T} = \Delta I_E \frac{1}{K_E} + \sum_{1}^{n} \Delta I_e \frac{1}{K_e} \qquad (2)$$

或者列成下面的公式：

$$\Delta I_T S_T = \Delta I_E S_E + \sum_{1}^{n} \Delta I_e S_c \qquad (3)$$

如果我们再加上两项，表示产品(P)和效果显著的各个时期(T，t，t+θ)，那么，就会得到如下的公式：

$$\Delta P_{T_E} = \Delta P_{E_t} + \sum_{1}^{n} \Delta P_{e_{t+\theta}} \qquad (4)$$

这些方程式可以清楚地呈现在任何时期，特别是中、长期中从投资到产品的转化。

这些方程式也突出了严格意义上的凯恩斯主义效应（通过把资金注入一个稳定的结构来动员闲置资源）与产生于结构变化的互补性效应（新兴的工业，各种技术交界面的相互作用，以及不同地方之间的联动作用）之间的根本区别。

2.典型的分配顺序反映了投资与劳动收入的关系。

这些分配顺序曾经被工业化国家或明或暗地所接受。

这些分配顺序可以直接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地区，而且，随着某些适当的调整，它们也能用来说明在那些工业化地区没有完全并入农业环境的国家中投资与劳动收入的关系。

在发展中国家，就连运用于工业地区的各种有利的、乐观的方案也会引出这样一系列问题，即在工业地区投资与积累的有益效应为何不能传播或只能部分地传播到农业地区。

在工业化国家中，或者就工业地区来说，投资（I）所产生各种效应会引起付给工人（W）的那部分资本（K）的增长，而投资（I）的来源可以是私人经济部门的超额利润，或者在某些条件下，也可以是国营经济部门的干预。由于付给工人的那部分资本增长了，因而就会增加工人（W）得到的产品（P），相应

地，在某种情况下，也会增加工人的实际收入（S/P）。

换言之：

$$I \rightarrow \frac{K}{W} \rightarrow \frac{P}{W} \rightarrow \frac{S/P}{W} \qquad (1)$$

或者按照不同时期的增长来表示：

$$dIt_{c} \rightarrow d\frac{K}{W}t_{1} \rightarrow \frac{dp}{W}t_{2} \rightarrow \frac{S/P}{W}t_{3} \qquad (2)$$

在这种序列中，一个时期到另一个时期的转变并不是自动地或必然地产生的，尽管上面粗略的描述可以给人一种不同时期的差异感觉。观察和经验表明，在每一个时期的转变中，传播过程是中断的；只要市场上还不完善，这样的中断在分析上就是不可避免的。

在发展中国家，讨论的重点不应该是工业化国家中具有通常涵义的工资，而应该是小农和**雇工**报酬这样更广泛意义上的劳动收入。这就易于理解从上面给定序列中的一个时期到另一个时期的转变为什么会完全有根据地发生。资本（假定它没有离开国土）往往会流向或被重新投资于那些赢利率最高的部门；平均到每个工人头上资本的增加只能影响那些受到某种程度培训的工人；在强烈的、持久的通货膨胀情况下，数字上的增长并不意味着购买力的增长。

这里所作的概括性分析可以更深入、更专门化地进行下去，并被运用到工农业关系上去①。

---

① 可以把系统分析有效地应用于方法的分类。通过方法的分类，可以利用推进效应来促进农业，并抵御发展中国家工业对农业的结构优势。参见“平衡与调整”，《应用经济学》，1978年第3·4期，还可参见“系统论与博奕论”，《应用经济数学研究所手册》，E·M·系列，1980年第6期。

结果是运动的工业和（或）运动的地区对其他经济成分产生了一种全面的推进效应。主要的极引起次要的极。当这些极与其所处的环境联系在一起时，一种新的经济结构就会形成。

完全可以这样说，这种分析说明了一个移进发展中国家的大公司怎样会动摇该国家原来的环境，并引导它对外开放；同时也提出了专门为把那种对外的环境再转向对内而确定的方针的要旨。这样的方针应当在于：为建立大公司创造条件，以便使这种大公司有利于把它们的一些活动引导到国内经济上来，或者用适当的投资把当地的活动同大公司自己的活动联系起来。组织上的作用推动或控制着其他各种效应的传播和新市场的出现。

工业与农业的辩证法

在整个世界上，工业与农业的联系并不是那么令人满意的。这符合于由美国牵头的、依靠大量干预来维持付给农民的价格和吸收剩余的先进资本主义制度；符合于农业产量不足的苏联；符合于农业的重要性排除把大部分人口献到“世界价格”祭坛上的可能性的欧洲大陆；也符合于那些具有高度集中的农业（和矿物）出口、而这些出口又严重地受到国际市场波动影响的发展中国家。更为普遍地是，世界饥饿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发展中国家的食物依赖仍是一个未解决的问题。

一些明显的混乱状况掩盖了当代工农业关系问题的重要程度与紧迫程度。这些混乱状况一方面是来自似是而非的历史对比，另一方面是来自传统理论的不正确应用。

在讲英语的国家中，有时存在着一种把工业化早期阶段的英格兰情况与今天观察到的某些情况相混淆的倾向。英格兰农业比较早的发展是为那里的工业发展铺平道路所作的一项重要工作，这样的观点——其本身是有严重争议的——不能被提出来估价发

展中地区或发展中国家现在的情况。其理由很简单：一个结构完备的工业部门今天是在整个世界中运行的，并且早已在不发达的国家中奠立了基础。这些不发达国家最初的情况决不能与18世纪末英格兰的情况相比。因此，那种认为工业化必须等待本地市场的建立并在农业人口中生长出一批商行顾客的观点，是建立在似是而非的对比和不可靠的互换基础之上的。就是在19世纪，市场的开放也常常依靠国内外投资的力量。

此外，对外贸易的传统理论也很难把我们的问题阐述清楚。因为它设想有相同的完全竞争的世界、相同的要素，并且它是以完全静态的形式加以系统阐述的。产生于这种理论的天赋要素原则（资金或劳动力的相对缺乏）同样是有缺陷的，它忽视了结构现象。幸亏它还没有阻止发展中国家维护它们工业化的权利，而国际权力机关今天正式将这种权力赋予它们。

尽管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方面取得了某些进展，并在都市化方面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但这些国家都程度不同地保持着以农业生产和农业人口优势为特征的经济。由于这种原因以及许多其他原因，这些国家仍处于一种对外部世界依赖的地位上。在这些国家中，妨碍各种经济作用快速而恰当传播的不牢固的内部协作，常常由于气候条件和居民较低的教育水平而变得更不牢固。人的能力不能充分地发展，常常会降低教育水平和生产率，并导致人的潜力逐渐退化。新的发展研究方法就要求从整体上调整不发达的国家和整个世界。这种调整主要与工农业关系有关，或者更准确地说，与工业同农业不同形式之间的联系有关。

如果这种联系能够得到改善的话，下列两种类型的矛盾将会得到解决。

1．由于结构上的原因，工业处于一种与农业不对称的关系之中。因此，普遍发现工业对农业具有一种结构优势。市场活

变。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是否有可能使工业满足于农业的需要，而不是允许农业在许多方面受工业的支配？而且，如果有可能的话，应当怎样去做呢？虽然这个问题与许多国家，包括发达的或不发达的国家有关，但这里只能考查有关发展中国家的问题。

2. 当不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从事贸易关系时，它们对于这种调整所作的解释是会非常不同的。同样，"整体"的观点，即从世界观点出发来对各种优势所作的估价，既不同于发达国家的估价，也不同于不发达国家的估价。因此，没有充分的理由说国际分工在农业领域不是非常明显的。这种估价也适应于目前的市场功能。然而，要解决的问题是一个长期的结构上的问题。结构上的变化需要长期的不懈努力，并且要付出极大的代价。如果处于风险中的人们不愿听任命运的摆布，那么，目前的国际竞争状况就迫切需要改变；而且，这一点已更加被证明是正确的——为了再次突出这一点——因为任何发达国家都不会以它所确立的工农业关系为满足。

那么，这就是我们必须着手解决的问题。

在详细地说明这个问题并考虑合理的解决办法之前，让我们先来清除一种可能出现的混乱。

我们在这里主要涉及的不是工业产品和农业产品。因为农业产品无论如何是借助于工业产品而获得的，即使这仅仅涉及到劳动工具和起码的运输手段，如象各种最不先进的农业形式那样。而现代工业一旦通过贸易渗透到某一地区，其产品就可以在该地区使用，而不需要在该地区建立自己的生产机构。买卖进口的工业产品是一回事，而在一个农业地区建立工业组织则是另一回事。因而，我们主要关心的应该是后者。我们的注意力将集中在

一个特定经济空间中有组织的工业生产要素和有组织的农业生产要素之间的关系问题上。

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分析：

（1）不对称现象及其交叉点①；

（2）政权（政府）的作用；

（3）政府对生产团体的控制和生产团体所处环境的组织；

（4）本质上是新发展的新的筹资；

（5）多国公司活动中的一些具体因素。

1．工业一般比农业享有较高的生产率和生产增长，因而我们可以普遍看到工业的累积效果。由于收入是和生产率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工业领域的收入势必要比农业领域的收入高。

工业与农业在革新方面也是处于不平衡的位置。一个主要的、先进的工业部门一旦建立起来，其技术上和经济上的革新就会朝着明确的方向进行。革新首先是从工业部门开始，然后转到农业部门。拖拉机、推土机、电气装置、自动设备和机械设备、

---

① 有一系列专门对工农业动态关系进行新的分析的读物，如《ISMEA手册》，《经济与社会》（编著：米歇尔·塞肯德、路易·马拉西斯和约瑟夫·克拉兹曼）；特别有趣的是下列期号：第13期（1976年）："混合集团与工农业的联合"，第10期（1972年）："农业的综合发展"（尤其是伯纳德·罗齐尔题为"关于经济结构及其动力分析的注释"的文章，第1163—1183页），第11期（1974年）："工农业关系"；对路易·马拉西斯所写的主要文章也应引起注意。

必须再一次强调，把依据英格兰工业以前的"农业革命"而建立的各种模式应用到目前的形势是错误的。在这方面，人们并不是充分了解农业较早时期的各种优势——这些优势是由土地改革、更多地是由通过机械化而改进的耕作方法造成的——和工业的惊人进步之间的各种关系。历史学家W·W·弗林和H·J·哈巴卡克认为，农业的改良对于工业的兴起只起很小的作用。

在历史学家们提出这些问题之前，这方面没有任何突破。历史学家们提出的这些问题是建立在对于这些模式的解释基础之上的，这些模式考虑到了各种推进效应，并且对各个时期的时间与次序进行了预测。莫里斯·尼韦在一篇题为"当代经济现实的历史"的简要论文中正是那样做的（巴黎，法兰西大学出版社，1970年，论文集第14—17页）。

抗生素、脱叶剂、杀虫药剂——这些创造物都是来自工业的努力。工业的努力通过给这些创造物的最初创立提供资金来使其得到发展，并经常对其在农村地区的传播起作用。已建立起来的工业化国家的历史肯定了革新所传播与扩散的主要方向。革新成了那些比较老的发达国家但今天已变为不发达的国家、以及那些不发达地区国家中工业的核心问题。在那些革新具有明显影响的方面，产量的增长和生产率的提高会加速度地进行，因而能够产生新生事物的结构和能够适应新生事物的结构总是需要放到一块来考虑。就我们时代的主要革新来说（核能和数据处理的日常应用），革新的根源及其发展的方向是非常明显的，而且由此产生的“革命”后果也已经被清楚地看到。

如果我们再来考察各种生活方式、社会态度以及耐用品的消费和使用方式，所说的不对称现象也是不可否认的。在工业化国家，大部分日常生活的变化来自对城市中心的模仿和对工业所生产的设备的使用。在运输人和物方面以及通过报刊和其他有广泛影响的宣传工具（如广播、电视等）来传播信息方面各种可能性的扩大，对新奇事物兴趣的增长，以及或多或少地带有依样画葫芦的模仿倾向的产生，都是在整个欧洲农村地区已经看到的各种深刻变化的根源。电影、电视和丁烷气集装箱对农村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习惯产生了一种动摇的作用。

相对说来，在给予内在很大差别以应有重视的情况下，相似的发展过程在发展中国家是非常明显的。这些过程已在社会学专著中得到研究。众所周知，汽车或拖拉机会改变一个村庄或地区的面貌，而且，这种变化好的或坏的影响不能根据市场价格、利润水平或当地工资增长率来评价。发展中国家的模仿倾向超过了杜森贝里所说的“示范作用”，这些“示范作用”主要地是和消费联系在一起的。同时，这种模仿倾向也会影响生产者、当权者和所

有经济行为者在其日常生活中的行为。

与上面所描述的那些现象完全不同的另一类不对称现象需要单独进行研究。比如，在拉丁美洲发现的半封建土地占有制具有超乎寻常的能力来抵制土地改革。这样，就不能直接涉及工业。我们在这里所要论述的是永远使农民群众处于愚昧无知和从属地位的社会制度的一种历史残余，即“社会休战”的持续。在这种情况下，统治阶级应受到指责，因为它们不能运用国内外的工业化来帮助它们的雇工获得解放。在统治阶级与外国企业相勾结并“输出”自己的利润与资本，以及工业有助于保持强大的土地所有者和雇佣工人之间难以逾越的社会鸿沟这一限度内，统治阶级对于帮助雇工获得解放的作用只能是非常间接的。

我们所谈的这些情况是人们都比较熟悉的，因而不必细谈。而另一方面，关于筹资——它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关系中一个关键性要素，因而不能加以忽视——问题上的各种不对称现象至今还远远没有作出过条理的和透彻的分析。任何较大的工业投机或商业投机都需要预先筹资来作为正式筹资的前奏。为了探明矿物与能源的储藏量、生产单位建立的合适的地点、对工程的可能赞助者和现金定期供给者，必须进行各种长期的、代价较高的事前研究。这种预先筹资是在为投资购置设备和租赁运输公共设施之前产生的。即使预见到了风险，也需要做好准备工作以防止这些风险的产生。在这些风险中，最重要的是那些与技术过时有关的风险，因为技术上的陈旧过时可能会危害到那些最仔细制定的计划和方案的实现。

以上所说的这些只是筹资能力的主要方面，而这种筹资能力比组织能力或技术能力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所有这一切均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这个问题可以用一句反映直接参与者经验的口号，或者用一种关心这些问题的某些普

通群众的直觉洞察来加以概括总结："财政创造工业，工业创造经济。"这个公式用简洁的形式和夸张的手法，突出了经济活动不同部门之间一种假定的但通常又是确定的关系，即各个有构子集之间的一种能力关系。这种关系不仅使微观经济学，而且使宏观经济学大为困惑不解，因为在其现有的形式上，它们都不能考虑到这些小集团的结构及其相互关系，考虑到在不可逆的时间中各种变化着的不对称现象。发展和新发展研究方法恰恰取决于这些不能适应各种现行模式因而被无视或忽视的因素。

如果再考虑"财政创造工业，工业创造经济"这一公式，那么，我们可以进一步提出这样的问题：工业能否创造农业？或者说，财政是直接地还是通过工业的媒介作用间接地创造农业？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显然取决于所考虑的特殊情况和环境：如果有可能建立特殊模式的话，回答将和这些模式有关。然而，虽然这种相关的说明可能是有益的，但问题却超出了这种说明：需要我们发现的是，以市场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逻辑能否允许一种能够作为回答各种具体问题依据的一般前提存在呢？

我们这里要考虑的逻辑是财政实力的逻辑，或者是大体上可以归结为与财政实力逻辑相同的逻辑，即预期利润的逻辑。如果在一个长的时期中，由于结构上的原因，一个部门在其产品、生产率和劳动者的收入方面比另一个部门有较高的增长，那么，这个部门就会成为财政上优惠利息的对象。

在发达国家，财政与工业有着紧密的联系。除了某些特殊情况，或者除了受到政府干预之外，政府往往忽视农业，尤其是忽视这个部门中的那些落后地区。

在发展中国家，财政关心的是那些服务于工业的活动，而且，如果政府不采取纠正措施，财政就决不会关心农业，更谈不上关心农民。

筹资上的不对称现象对于理解非协调的发展和部门间的失调，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

我们刚才已经考察了发展中国家明显的不对称现象，而技术上和经济上的不对称现象、普及革新中的不对称现象、土地占有上的不对称现象、以及筹资上的不对称现象，这些都是现行理论所不能解决的问题。

这些不对称现象在各种极为复杂事物的网络中，不是相互并列的，而是相互交织的。集中于人的发展决不能忽视这些不对称的现象，因为这些现象对有关人口有影响。在尖端的经济研究中所定义和分析的各种推进效应，既是相互区别的，又是相互混合的。由不同部门所产生的推进效应和对这些部门某一联合体的产品所产生的全部推进效应，需要与整个人口的关系来加以规定和说明。确保这些推进效应能够符合人的需要，其意义不仅仅在于这些效应有助于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而且在于它们能够成为提高整个社会及其所有成员文化水平的杠杆。市场和资本并不能发挥这样的作用。一个被新古典学派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所轻视的伟大行动者，需要确定自己的目标并检验自己的能力。

认识行动者的重要性可以提醒我们防备另一种不对称现象。这种现象支配着许多其他不对称的现象。一方面它涉及到政府及其行政机构的关系，另一方面涉及到全体被支配和管理的行动者；假如它没有堵塞从每个人身上涌流出来或喷射出来的创造力的源泉，那它就会长期产生良好的效果。

2．事实很明显：现行的理论只是把注意力集中在财产与实物上面，非常细微地考察公共产品、集体产品和有价值的产品，而从不考虑统治者的决定和行动。术语上的前后不一致反映了思维过程的不确定性。但不管怎样，参考实物为使这些术语并入市场的概念化和形式化开辟了一条道路。这种市场当然是以完

全竞争为特征的市场。

理论家们不是注意辨别国营经济成分那些明显的特征、规定其具体活动，而往往是直接或间接地把这种国营成分纳入到在私营单位之间起作用的市场规律中来，纳入到这些单位根据其共同的利益所制定的价格制度中来。实际上，这是把用来衡量私有经济作用和性能的标准应用到国营经济成分上来。显然，这是一种容易在日常经济教育活动中被忽略的怪论。

政府并不是象一位老法国自由主义者朱莉娅所说的那样，是一种“真空”（“政府，即真空”）。实际上，它是一个决策者，一个积极的参与者，而不是一台惰性的机器；它起源于国家并渗透在整个国家的所有方面；它在与国家的“牵连”上，与国家各个组成部分及其各个成员冲突—协作上，显示出这种格言的力量：“国家不是物，而是行动者。”国家正是通过政府而成为一个决策者和行动者。

捍卫国家的特殊利益，维护每个公民的尊严，这是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因此，这不仅仅是国家的职责，或者只能依赖于国家统治者的抉择。这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甚至比发达国家更为重要。

个人的发展属于个人本身的职责，相对于其他人来说，任何人都不能摆脱对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所负的责任。这种要求已被许多文化所公认，并被许多宗教教义所强调。然而，从完全不同的经验观察和历史的观点来看，同样明显的是，个人的活动是发展的主要动力，并且是对任何发展形式的最终检验。那些和土地保持着最密切联系的传统农村公社和群体具有来源于祖传的各种能力，而这些能力是不能完全被外部作用所毁灭的。

这样说，决不意味着要描述“崇高农民”的神话，而只是为了引起对各个群体中持久的文化价值和传统价值的注意。各个群体与自然界保持着直接的联系，并且按照人的需要与欲望经常致

力于改造自然界。就发展中国家来说，如果接受农民创造国家的观点，那么，任何一个国家都必须注意不能全盘照搬欧洲的经验。然而，这也是一个被大量事实证明的和无可辩驳的事实：新兴国家在现有的条件下，如果不改革其经济与政策以使农业生产者和农业团体成为国家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这些国家就不能巩固其地位。如果将此运用到工农业的辩证法中去，就会成为发展方针中一个社会性的和社会心理性的基本组成部分。

在发展中国家，政府面临的任务是：

（1）通过使全体居民能够自觉地按照自己独特的文化内含的价值标准来生活，改进和加强各种组织结构，以便给全体居民能够提供一个有利于那些有学识的和负责任的精英多方面创造才能得以发挥的制度，取得全体居民的支持。

（2）通过充分的考虑，把政府原有的各种机构连结起来，以便形成一种合适的总体结构。

（3）在对生产者和消费者进行教育的基础上建立一种先进的市场体系。

这三个方面主要是集中于农村居民的组织问题。对这些方面加以研究，可以减少对强迫的实质上是强制的劳动制度依赖的危险。这种劳动制度最接近于这样一种制度，即在对待各种潜力时，能够最充分地利用人力资源的制度。这种劳动制度因其本身的缘故与现代化的方针完全对立的，同时与在进口的模式的基础上对部分居民进行的培训也完全对立的，因此，它实际上听任外国人的支配，而割断了与人民大众的联系。

那些目前正在探索自己的道路或者正在进入自己的道路的新兴国家，显然经过沉思之后，会起来反对经济主义，因为经济主义对于人的生存是具有危害性的，而人的生存则是实现其自由的最可靠的保证。

其任务是促进和指导这种变革的国家，面对那些具有更大的军事实力、金融资本和技术能力的其他国家，是无能为力的吗？

根据战后的发展趋向以及各种意想不到的发展情况，回答显然是否定的。一个新兴国家，即便是一个比较弱的国家，也会在对资本主义的或集权主义的欲望采取有力行动上留有很大余地，假如它是消息灵通、不屈不挠的话。它能够在政治棋盘上利用自己的战略准则；它能够利用各种联盟和同盟；它能够出入于国际组织；它在信息传播日益加快的当代世界中，具有独立的交涉能力。总之，这种国家在维护国家自治地位上并不是无能为力的。这种国家自治不仅体现了牢固的相互依存形式，而且体现了对其文化特点的表达方式。

3. 在这种背景下，关于工农业合作发展方针的经济方面必须包括两项最密切相关的任务：a，活动的选择和准则；b，在出现发展的地区中环境的规划。

(1)新兴国家并不是白手起家的，它可能已拥有工业中心——其作用需要内省。现在需要建立的是新的工业中心，这应是政府决策中一件主要的事情。对整个体系的调整将取决于新旧工业中心之间所建立的联系。从一开始，我们的研究就在各种各样的工业与农业之间作了区分，目的在于由前者促进后者。

用“农业优先”或“工业优先”这样的提法来思考问题，只能造成一种似是而非的二难推理。它无助我们了解真实情况、提出一个可行的战略。问题的真正焦点在于：何种工业与何种形式的农业是相联系的？

前面曾经提到，被国外利益集团主张和强加的出口农业占去了大量土地，从而引起肥料与机器进口的增长。而要帮助国内粮食生产收复这些失去的土地，通常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通过使用当地资金，运用适合于当地需要的各种技术，以及加强对当地

农民的培养，可以促进国内粮食生产的发展。粮食“不足”是由于错误的实践和进口的策略准则所造成的不足的一个典型范例。毋庸置疑，国内粮食作物生产不能够满足人们的基本需要：这并不是自然界带来的，而是由大公司和经济与金融集团所强加制定的策略造成的结果。目前，似乎是对这种权力不平等的日益增长的抵制力量正在形成。

“农业优先”的战略是建立在维持已经确立的贸易形式和逐渐建立国内储蓄的基础之上的。历史已经表明，这种“聪明的”设想曾经不只一次地被那些试图放慢其附庸国工业化速度的工业化国家所提出，但附庸国逐渐认识到，这种建议远远不是那么巧妙的。

“工业优先”的战略是把重点放到资本积累、生产率的增长以及单位产品追加价值增殖上面的。这种战略的倡导者们掩盖了在累积债务和国外结构优势条件下所要付的价格。如果引用新工业国家作为这方面例子的话，那就谈不到这些长期的劣势，这正象一般忽略技术损失和社会损失的差异方面一样。

从一定的条件出发，通过把各种工业子群和农业子群结合起来，实现所需要的整体结构，一般可以取得最佳效果。这样做，其目的是利用在工业部门本身范围内工业投资的各种推进效应，以及不同的工业形式对不同的农业形式所起的各种推进效应。

我们可以举出许多例子来清楚地说明这种结合。比如，出口的矿业能够为初级加工工业提供基础；单纯的粮食出口能够为使产品多样化的加工工业提供基础；从国外引进的重工业能够为轻工业的同时出现提供基础；粮食作物的生产能够为建立由当地储蓄所集资的、运用适当技术的小工业提供基础。此外，对于通过和国外大企业协商而进行合作生产或者进行更简单的转包合同这些可能发生的事情，也需要予以考虑。

在这里，关键的问题是要摆脱工业领导农业的抽象观念，按照在以相互推进效应为特征的普通环境中，特定的工业形式领导特定的农业形式的思路来考虑问题。

有构子群同样常常需要进行价格调整和流动的调整，而系统理论则能够为这种调整提供出一个有合理根据的精确方案。比如，某种农业形式在投入阶段，可以和机器工业与化肥工业相联系；而在产出阶段，则可以和初级加工工业与罐头食品工业相联系。无论在投入阶段还是在产出阶段，都可以在一定时期内引进各种调节器来控制价格和流动。

(2) 这些活动的结合只有伴随着环境的规划才能产生实际效果。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这种集合主要是指在一定物质水平和社会水平上工农业之间稳步发展的结合。

运输网的建立要求按照下面两种可能出现的研究方法的其中一种来进行。

一方面，考虑的主要问题可以是各种基本产品——如果它们产生于国内，那么一般是农业产品；假如是工业产品，那是由国外利益集团根据其自己的利益输入进来的。在这种情况下，目的在于增进内地交换或促进港口货物装运的运输网的发展，将会根据主要产品来进行。这就是不久前殖民者所采取的方法。事实上，新殖民主义也仍然采取的是这样一种方法。按照这样一种方法来进行各种计算是比较容易的，但结果是：整个内地或者大部分内地得不到"滋润"，或者在所选定的地区或地点的发展活动中只能得到很小的、非常间接的"滋润"。

另一方面，追求的目标可以是给全体居民以一个能尽可能利用现存的和潜在的人力资源的有利时机，如果是这样的话，方法应该是适当地"滋润"整个地区，其目的是为了大量农业的、贫困的和长期被忽视的居民的利益而运用新的交通网络来发挥外

界有利因素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精确的计算就要让位于整体的估价。这种整体估价是根据不太精确但又难以精确的方案研讨而进行的，在方案研讨中进行选择并不是困难的。通常的情况是把主要的生产中心和次要的生产中心连接起来。所有已知的情况表明，值得重视的各种有利条件都是来自于地方之间这样建立起来的连结和技术之间的相互作用。

环境规划的目的在于保护各种工业和各种形式的农业之间适当的联系，这种环境规划也有一个社会方面。建立与农村居民相通的信息交流网要和建立各种学校与职业培训中心同时进行。总的教育方针应该是一个“自我创造”过程中的国家，即一个“准国家”逐步具有成为“传播信息的独特地点”（R·卡弗斯）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特征的手段。这对于各种农业子群和工业子群的妥善结合也是必要的。国家的统一及其经济后果同样取决于一种多方面交流方针的成功实现。

4．在直接赢利能力方面农业所处的相对不利地位，以及某些类型的农业对于国外结构优势所处的依附地位，都是正确分析不发达的关键性因素。而资金的可供量则是克服这些主要困难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

我们刚才所讲的那些联合战略，也就是为了使整个国家能够得到一个合理结构的联合战略，都是以资金的可供量为前提的。

任何希望国家储蓄可以实现这一目的，或者可以让金融资本主义转变到与其逻辑不相一致的态度上来的想法，都是不切合实际的，因而必然会破灭。所以，必须加强这样一些方面，在这些方面，资本主义的利益不仅能够得到满足，而且还能自发地、间接地满足那些依靠农业制度改革而发展的国家的长期利益。

至少在一方面，历史经验是具有结论性的：资本主义还从来没有拒绝把对于基础设施的财务责任推卸给政府，或者拒绝在其

各个财团中分配这种责任，那些负有新型发展责任的财团应该仔细关注这种事实，并且应该在其财力和同伙的范围内，同那些与新的金融业务有关的财团合作，并参加它们的各种经营活动。

新的金融业务是混合性的（私人的和公共的）、多国性的（在贷方和借方中间聚集着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工业化国家）和共同性的（即计划通过世界力量的重新改组和政府的警惕来促进各群体的长期利益）。

一种突破传统财政理论的金融形式已经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产生，但如果要对发展中国家产生决定性影响的话，那它还必须伴随思想和观念的的变化。

正是通过对部分新兴国家的政治压力，也正是在各主要强国之间更有情报根据的谈判过程中，那些并不是严格按照各种有益的专门计划而规定的目标，才更有希望被接受。

尽管对于新发展极为重要的新金融业务依赖于政治上的决策和支持，但它能够变为并且确实在变为现实：

——通过适当的机构（半公营公司、国家参与的控股公司、国际财团、专门从事技术与工艺转让的公司、在对共同的产品和服务项目进行联合投资中、或在某些产品由英格兰银行投资而其他产品则由私人投资的计划中与世界银行合作的企业）；

——通过适当的经营（利息津贴、国家担保、与贷款相联系的技术与技术人员的交流、信息的交流、工作人员的联合培训、合资经营、市场的分布、生产的分配等等）。

假如这些金融方法注意用新的发展研究方法来表达的话，那就会给我们打开各种灵活多变的地方与多国的经济空间与金融空

间，而这些空间可以根据需要和环境的变化不断得到扩大和改变。正象地方货币制度和现行的世界货币制度可以相容一样，经济地方制度和金融地方制度也可以在世界经济发展中扮演一种合作的角色。

为了实现共同目的在于达到各种工业与各种形式的农业最佳协作这样一种方针的各项合作目标，看来必须进行全国性的规划。而在没有具体规定这种规划的内容之前，这种规划始终是一个模糊的概念。

某些宣传极力说服我们相信：全部动员居民的劳动是增加社会产品最有效和最迅速的办法。如果这种办法有害于人的生活、有害于人的能力的话，那么，中心是人的发展就与这种办法水火不相容。在考虑规划时，我们所要遵循的准则必须是人力资源的充分发挥。

现在，苏联正在设法改进各种规划程序。

在多瑙河地区各个国家中，苏联的朋友和伙伴们都接连出来支持行政分权，它们或者是以改革其价格制度为目的（如匈牙利），或者是把行政分权作为维护国家自治的一条途径（如南斯拉夫、罗马尼亚）。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愿使自己的农业屈从于外国利益集团。

如果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允许这种依附地位存在的话，那么，“指示性”规划——称为一种“能动规划”（皮埃尔·马西）更恰当——对于设法实现工农业合作以有利于全体居民，就是一种有效的方法。这种方法的先决条件是要具备这些能力，即在国内充实政治领导人和技术人员的能力、通过适当的方式获得统计资料的能力、以及说服人们接受各种有关纪律的能力。

而非指示性规划则对于一个计划成功的各种政治条件和技术条件并不能作出系统的表示。在这两种规划之间，只有“指示性”

规划才是降低外部优势、抵销价格与收入的波动、依靠增加的信息来改变对外关系上讨价还价能力的各种不平等的一种最合适手段。

在一个国家范围内，规划能为各种选择提供指南，并能确定在建立各个子群时应当选择的重点，以及对这些子群的作用在其中传播扩散的环境进行规划与调整所必须依据的重点。而且，完全是在另外一个层次上，尤其是在各种政治紧急状态中，我们认为，规划也可以充分利用阿道夫·伯利所说的动机上的“超越边际”。这种“超越边际”是用来表示在直接的个人利益之外所接受的附加劳动和牺牲，而这种附加劳动和牺牲可由热情关心共同目的的民族来获得。一些从事于解放斗争的新兴国家都非常清楚地意识到了这种可能性。

看来，重要的事情应该是认识到这种实际情况，即在基本上是和平的时代，积极的规划甚至在其作为善于随着情况变化而变化的适应手段之前，就是一种收集信息的手段。由于这些信息已经进行过整理，因而现在更容易被吸取。这样，不同部门的决策者和行为者就会了解他们在整体中的地位以及他们从事各种活动的大概范围；而统治者、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行政人员也更能够明确他们之间应当怎样相互合作，更能够开创与有关人员更先进的合作。

发展中国家在开始按照自己所精心设计的标准来把它们的各种工业和各种形式的农业结合起来时，会遇到有关各方利益之间的冲突，这些冲突被农村与城市生活方式的差别所加剧，同时在某些情况下，被种族隔阂与宗教隔阂所加剧。如果面对的是这种潜伏的或公开的冲突，在这种冲突中激情与感情比理智起着更大的作用，那么，根本不可能指望介入冲突的各种人物有更多的美德，即便伴有各种天真的解释也是如此。不过，称职的和老

练的解释者也可以站在中间地位上，依据计划的某些具体方面或整体计划提出自己的看法。

由于同样的原因，在一个发展中国家中，计划能为仲裁提供多大帮助，对此也不能估价过高。那些早已实行了工业化并且具有大农业的国家的经验表明，工业生产者和农业生产者并不是那么容易地被一个计划所提出的各种观点协调起来的。

更为复杂的情况是：计划者通常是在外国培养的，而外国是依据他们的经验、按照他们的方法来进行教育培养的。对于那些能够使西方人教育他们的各种方法适应于自己新兴国家的独特结构并有益于自己国家的技术人员进行正规的培训，是一个长期而艰难的过程。鉴于各种农业形式的差异以及它们相对分散和远离城市中心的特点，进行分层次的规划是比较适宜的。然而，从何处才能得到必要的技术与能力呢？

为了把前述的意见同实际生活最密切地联系起来，我们可以用简明扼要的方式来考察把工农业紧密联系起来的两种方式。

一种方法是充分发挥大农场的优势。只要市场在运行，这种方法就易于形成，有时还可得到政府的直接鼓励。大农场能够为接受一揽子技术提供最好的结构，而这种一揽子技术则是实现“绿色革命”的希望之一。计划用来提高产量的各类成分可以全部提交给农民，而农民则可以使用对他们有用的各种资金、工具和方法。但是要有效地使用这些资金、工具和方法，必须依赖于经过慎重考虑的各种辅助手段。

然而，根据反应以及初步经验来看，如果对各种地球物理条件还没有进行过适当的研究，对各种市场条件也没有进行过预测，对农民的各种动力因素同样没有进行过正确的预见，那么，这种只是在纸上——或许在实际计划上——完美无瑕的方法，很可能被证明是令人失望的。假若刺激农民的因素是利润的话，他

们所期望的总利润一定要超过总的联合费用。

各种详细的研究表明，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个体农民追求的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成果，而不是一种由应用于市场价格的通货紧缩所获得的成果。每个人都希望产品在种类与实际数量上能够满足自己及其家庭。可以说，每个农民都有其自己的生活动力，但是，他所希望改变的各种地位在顺序上并不同于那些与各种货币利润与货币成本相关的地位。因此，与各种货币因素有关的预测可能会造成错误。

第二种方法适用于设法把农民与政府联合起来的“农民基础战略”。农民家庭都接近于土地，在此基础上，它们在各方面都比较相似：尽力避免垄断的资本积累；把重点放到小的或中等规模的工业上；指导因素是适合于他们需要的各种技术、技能与方法。

这种粗略的概括不仅说明了与计划工作相符合的目标的多样性，而且说明了这种多样性所能实际引起社会变化与经济变化的限度。正象在一个不完善的市场中一样，在一项计划中，各种管理机构会互相对立，同时它们又作为处在变动中的整体而与政治权力即政府相对立。

5．“活动组织”理论的应用为我们理解跨国公司①或多国

---

① 弗朗索瓦·佩鲁：《跨国公司与新的世界经济秩序》，导言由吉尔伯特·布朗多涅和丹尼尔·迪富尔所写，里昂，社会科学应用研究所，1980年；乔治·莫德尔斯基，《跨国公司与世界秩序——国际政治经济读物》，圣弗朗西斯科，N·H·弗里曼，1979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多国公司对技术的转让》，全集第1、2卷，巴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研究中心，1977年。

如果还没有达成一个政治协定，那么，跨国公司从其自己的战略利益出发，就会采取各种技能与技术转让的决定。在同样的范围内，同样的决策者——跨国公司——可以有助于减少特有的粮食短缺，从而获得一种强大的产粮能力。最后，如果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的农业没有产生直接的兴趣，它们也可以使其受到投入（化肥与机械）与产出（加工制造与市场买卖）各种作用的影响。（后接155页）

公司对工农业关系的特殊意义提供了必要的基础。

跨国公司，皮埃尔·梅西常常将其称之为"主要活动者"。这些跨国公司都有着自己的经济空间，这种经济空间符合于商品交换、投资和信息的需要。跨国公司将商品交换、投资和信息应用到处于一个国家地域空间中的各种经济空间。如果具有各种必要统计资料的话，我们就可以把每一个国家看作由两类空间所组成的国家：一类是受国家权力制约的空间，另一类是受非国家权力制约的空间。这种区别可以使我们更清楚地了解国家究竟是什么，同时也能够使我们提供一些有助于对国家统治权的具体方面进行评价的数量指标。对于跨国公司对各主要农业国农业所起的作用进行调查研究，将是非常有益的。

无论跨国公司是高度集中的还是不那么高度集中的，就其地位和目的而言都是一种私人组织。它们的目的就是要最大限度地增加私人利润，这些私人利润则是由跨国公司在那些它们已经站稳脚根的国家中所控制的各个单位（分公司或联合公司）创造的。这是一个总的目的，其实现根据时间、地点、条件可能要包括许多利润战略。

作为私人组织，跨国公司难免要和东道国中其他组织——政权组织（政府）、行政机构以及中间团体机构——发生关系。政府和政府当局都是负责保障全体居民共同利益的，正是在这一点上，它们发挥着特殊的功能，其作用是用社会效用、社会产品和社会成本这些抽象术语来表达的。如果没有这些参照点，就要以

（前接154页） 在我们所考虑的这种特殊领域中，各种双边反击力量只具有非常有限的作用，因为国际工会制度没有多少实力，各种行为规则实际上并不能改变交易的力量。

在国际组织中由于发展中国家的作用日益增强，而且这些国家坚定地站在本国政府一边，因而，世界范围的政治行动在目前似乎是反对跨国强权制度唯一的力量源泉。这种制度如果不是自我灭亡的话，其结果除了与人们的购买力可以相称之外，其余不会使人们满意。

实际形式来表现人们的需要与愿望。

经过一定的时间之后，那些不仅富于变化而且富于扩展的主要私营单位和公营单位，就会发生各种相互交叉和冲突。这些冲突根本不可能在协定的条款中或任何诸如此类的文献中得到透彻的预示和解决。由于时间的变化经常会产生新的情况，因而它必然会改变各种交往的范围、效用的转移以及最初在特定时间中商定的权力关系。

跨国公司与其起源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它从起源国得到资本、“研究与发展”、普通信息和专业信息，并获得与政府当局的联系。如果它发展到一个发展中国家，就要考虑和那里的政府当局以及各个私营部门的公司进行合作的各种条件。这些合作中的不平等来自于有关股份公司的经济结构和各自的外部情况，而这些外部情况则是由它们的国家与政权造成的。

象从事制造的跨国公司这样一个“主要活动者”，在其他从事运输、贸易和金融跨国公司网以及各种信息中心网中也占有一定的地位。对于美国的各种跨国公司和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各个单位来说，将这些网络加以比较是具有重要意义的，通过比较，可以发现一种综合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比任何明确的合作或正式建立的联合更为重要。

这些因素可以使我们更易于理解那些产生于最强大的经济，如美国和日本经济的跨国公司所进行的各种特殊形式的竞争。

跨国公司之间对垄断市场的竞争是和各自国家所有的活动手段密切相关的。对于国家本身来说，这些手段是和占领国外市场的能力联系在一起的。这些国家显然不同于那些新古典主义模式的“国家”，这种模式的“国家”是由顺从于价格乃至被降低为孤立的要素和产品的各种小单位组成的，并且是由各种价格差别推动的。

跨国公司是和强大的公共组织同生同长的强大私人组织。真正说来，跨国公司往往脱离于自己的国家。但是，这种脱离完全是相对的"自主"，它决不能从根本上破除原有环境的结构、各种原则以及声望，或者冲破政府当局所达到的各种势力范围。

此外，与一个同样规模、同样结构的大公司相比，跨国公司是在另一些完全不同的条件中来进行它的各种活动的、这些条件使它具有不断增强力量的特殊优势：它能把采购或市场交易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它能把东道国中的部分当地储蓄吸引到自己手中来；它还能建立起自己的各种商品、资本、信息流通网。

就以加拿大这样一个强大的国家来说，它的经济是由交易市场组成的，其全部投资的80%以上是来自国外的直接投资，这样，新古典主义理论早已开始探讨的"智力报酬递减"的问题，现在就可以得到非常恰当的解释。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从其人民的利益出发而希望造成工农业联合的基本含义，可以说是比较清楚的了。

第四章　目的与价值

新的发展研究和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是比要求重新分配资源并根本改变各国竞争规则更为深远变化的依据。第三世界长期积累起来的不满情绪正在从外表上流露出来，并且在严格的交易、各种威胁和暴力行为的爆发等方面显示出自己的力量。

从整体上来看，西方并不是一个特别谨慎的殖民者，它没有用其军事优势和经济优势来将其科学、技术传授给殖民地人民，并给殖民地人民挑选出来的精英授予逐渐形成他们所选择的现代化形式的方法。

这种估价需加公正的评判，而不是用非常激进的言词来形容欧洲扩张的不稳定状态。应该承认，殖民化在一定程度上培养了当地的精英，引起了各种经济活动，不过，这些精英和经济活动都是受宗主国支配的。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发展情况来看，殖民化除了某些可值得保留之处外，决不能再以它给殖民地所赐予的好处来作为其存在的正当理由了。

殖民制度是在一个特定的政治与法律地位上产生的，而这种地位又是由科学、技术和经济上绝对的优势来支撑的。由于殖民地的独立，这种地位已经在名义上发生了变化；但无论怎样说，殖民地的独立已深刻地改变了原来的状况。由于现实的各种经济变化总是缓慢的、逐渐的，而且资源的不平衡始终存在，所以，“新殖民主义”这个词的确还包含着大量的合理成分，尽管它是有争议的。

可以把新兴的国家看作为"准国家"，因为它们所合作的是这样一些国家，这些国家由于其规模、活动的性质以及交易能力，事实上会产生各种权势与优势，这些权势与优势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消除，即使是有这种愿望。

这些力量不平衡所产生的副作用现在还存在着，因而，人们对这些副作用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这就使得这些新兴国家完全有理由通过斗争来消除这些副作用的影响。

这一点已经被对欧洲人，更宽泛地说，对西方人行为的严厉指责所证实。从亚洲或非洲的情况来看，在经过残酷战争的相互残杀之后，它们在各种维护自身利益的争吵中似乎是精疲力尽了。不管它们的宗教或哲学怎样规定其各种指导原则，毕竟它们已经是富起来了。它们的确是象无神论者那样来行事的，其道德准则就是不加掩饰地、经常地进行激烈的利益追求。它们所追求的模式看来是与人的尘世实现有关的模式。人常常被得到最大物质利益的观念所萦绕，因而，物质利益何时不能得到满足，他就不能抑制对权力的欲望。

面对世界的饥饿与贫穷，亚洲和非洲还没有成功地使它们所公开宣布的发展方针实际生效。过去当普遍的危机爆发时，它们可以完全正当地把这种方针作为进一步限制援助的理由来实行，因为对于这种援助它们是很反感的。虽然普遍的危机现在衰退了，西方也不能在其相对力量下降时，要求继续尊重其过去的利益。

直到最近，西方还坚持认为是它创立了文化，而且就其实质来说，是一种具有普遍价值的文化，这种文化与其值得仿效的政治上和法律上的办事方式结合在一起的。现在，这种文化实质受到了人们的怀疑，其办事方式也受到了非议。

这种文化危机要比经济制度失灵更为深刻：其原因就在于人们的思想和感情发生了危机。

发展中国家正在逐渐意识到它们自己的文化价值，并且从中得到了安慰，找到了保持这些文化价值尊严与个性的理由。也许，调和物质利益上的对立要比发现全面价值、超越历史上由人们思想的不协调所维持的文化冲突更要容易些。

然而，如果发展中国家是接受另一方的办事方式而又转过头来用这些方式抵制它，那么，那些从其历史悠久的过去中了解到具有重大价值的精神和道德发展的所谓不发达国家，就应该从过去来寻找表达自己文化的新方式——当然不是背叛这种文化。

因此，就英美来说，正在出现一种新的尚未开发的领域，这就是目前还没有完全验明并加以开发的智能资源领域。这是一种定性的领域，它基本上排斥对精神现象的统计、对社会成员心理的研究和测定、以及对未开化社会的探讨。

消息最灵通的西方观察家们认为，那些拥有众多人口的刚刚复兴起来的国家，有许多东西值得我们学习。过去，对于这些国家的人民我们往往是把自己预先作为老师来训导他们的。

如果我们不从理性和精神的更深的层次上去认真对待政治上与经济上的各种争论，那么，对各种发展问题的解决就难免是浮浅的。

不消说，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和民族都在探求人类命运和人类生存竞争的意义，而且，从世界危机的角度来看，我们更会容易发现，它们都处于相同的地位，遭受着降临在整个世界上的悲惨境遇。

就整体而言，西方国家能够避开分裂世界的政治争论，而对索尔仁尼琴1978年在哈佛大学讲演中动人的告诫保持中立吗？他认为，你现在所做的事情并不能足以高度地、完全地、强烈地赢得全世界人民的支持。所以不能高度地，就是因为道德如果是和商业经济混合在一起的话，就会失去其效能；所以不能完全地，

就是因为对最高价值的追求不能在自由、平等的幌子下与偷偷摸摸地使用暴力行为结合在一起；所以不能强烈地，就是因为能够反映兄弟般关系的心理活动并不是经常表现在你的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中。

哲学思考的优点，以及从事这种哲学思考工作的各种世界团体的重要意义，就在于能够提出上面这些被认为是不太合适的问题。如果认真理解发展方针的话，那么这些问题自然是内含于发展方针之中的。

容易理解和承认的经济学意义并不能与容易理解和承认的人类命运意义相分离，这种意义无论如何需要进行探索。因而，我所要做的，只不过是应当中肯地提出一些在探索中可能寻求到的方法。

经济利益与文化价值的潜在冲突

由于西方的经济活动与文化价值的关系若即若离，而这些文化价值是被一再颂扬的而不是体验到的，因而，西方总是向发展中国家出售技术以扩展其科学与经济核算的技术。①

核算，作为优先使用并且经常运用的表达经济利益的方法，就在于把各种成本与产量转变成各种代数量或代数数。根据这种特殊性质，它集中于能够计算而且应当进行计算的各种东西或物质对象上面，而能够说明纯粹最大值的传统数字排列法正是以此为基础的。现在暴露出来的问题是，这种最大值往往会与最适度相混淆。

① 弗朗索瓦·佩鲁：《对经济论证与统计论证的批判考察》，布鲁塞尔，1976年；保罗·夏尼尔：《经济论证批判》，博士论文（打印稿），巴黎，1972年。

然而，无论怎样尽力把人的各种因素引入核算，这种核算决不可能考虑到人的各种各样的、无限复杂的方面。从直接的经验以及分析中我们知道，正是这些方面使每一个人、每一个人类社会显示出自己的特点。

如果经济核算自恃“有效”，那就提出了这样一个严肃的问题：它对何种活动有效？对谁有效？我们所谈的活动是以等量提供服务和等量交换价值为前提的市场经济活动。而各种经济因素和经济主体从来没有处在一种完美的意向交流和情境交流关系之中。由于这些基本的观察材料首先涉及到价值概念，其次涉及到思想交流的概念，因此，需要进行长期的哲学思考。

如果不就此限度内对经济贸易提出质疑（尽管无论什么时候拿它来投机都是富有成效的），一个人难免要受到依据市场价值进行核算的狭隘性的局限。生物学家对卡和能量的计算毕竟是象价格计算那样精确和合理的计算。用价格计算来代替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但要把它引进来则应该相应地根据客观上有益的效果而对市场价格作出评价 。

对于正常食物配给量进行数量计算，正好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范例。这种数量计算已适时地扩大了经济学家的兴趣，将其注意力引导到对完完全全受“支付能力”支配的各种极其有害作用的发现上来。

关于超级市场活动，其客观上所产生的某些有益的（或破坏性的）后果已由科学所发现；随着对这些后果的适当注意，超级市场的活动已受到直接有关的人员以及社会舆论的重视。这种社会舆论，正象它除了在教科书中不存在而在任何地方都存在一样，它比市场的作用更具有深刻的价值。

我们现在还离这样的文化价值远得多，这些文化价值完全是不同于身体健康状况的另一种状况。

在发展中国家，似乎对制造领域和机器不连贯律动的认识还是模糊的，但在发展中国家比在发达国家更为明显的是，文化被理解为一整套渗透于人类生活的外在形式以及思想深处的规范和价值。这些规范和价值可以通过人们的反思，转化为各种概念，并得到程度不同的论证。但是，这些规范和价值在概念化之前就已存在，并且超出了这种基本上有条理的转化。

这些规范和价值可以通过口头传播到家庭和各种基本团体。文化产生于珍藏和传播着各种思想的生活环境。这些思想的形成与潜意识和所谓的超意识有关，而这种超意识即是深藏于人们记忆与习惯中的传统、日常交往以及社会知识等这些评价与生活准则。

在一种生活环境中传播并通过这种环境来传播的文化与生活于这种文化之中的每个人之间，交流是直接的，它先于评论，甚至先于口头表达，它能够提供一种对处于相互联系中的人、自然和社会反映之前的情景。虽然在这方面的一切——词汇，句法，语句的声调和感情的变化——都在传达和表明交流，但交流还是先于语言的系统表达。

在我们进行推理论证时，决不能凭空出发，而是要从根据出发，即是从特定的时空条件下生活所赋于我们的文化知识出发。这无疑是语言交流不同于文化交流的原因之一。

文化交流也可能通过另一种专用语言来存在。这种专用语言是由住所、环境以及社会上各种有组织活动所引起的各种意象建立起来的。各种景致、纪念物、手势在语言逐渐产生之前就“表达”着人们的思想、情感；它们标志着一种传统的生活方式，并且引起了各种计划和各种活动形式的产生。

文化是“混合的”、“具体化的”，然而又是内在的、本质的，它是通过存在的环境与意识的不断交换而起作用的。

传播文化的各种符号与“象征性的动物”有关。但这些符号是社会的符号而不是宗教仪式的符号。每一个社会都有它自己的习俗，这些习俗经常受宗教习俗的影响但又与其保持着区别。

团结的符号是和分裂的符号结合在一起的，即使在那些正开始开放的社会也是如此。社会意识在“我们”与“外国人”之间划了一条无形的但又是真实的界限，因而，不同的人群之间总是充分存在着各种差别与悬殊，而这样的差别很可能在私人关系或公共关系上变为“敌友”的分裂。

如果认为文化是使一个团体能够得到结合并且使它能与其他团体进行交流的一整套价值，那就更不必说这种复杂的交流了。不管怎样，对于那些在人群关系中具有斗争与合作、冲突与一致这些双重属性的人们来说，这种交流会产生出——即使在最温和的交换中——同情与敌视、仁慈与善意的混合物。对于这种能够变为和谐一致的混合，不需要任何共同的自我约束办法，而只需要接受在理论上全部包含的各种价值。

这充分说明，文化关系难以进行核算，尤其是不能进行经济核算。

在西方作者的著作中，可以容易地看出对经济与文化相互关系两种方式的理解。一些作者注意对于象政治或宗教这样的文化现象进行经济分析——一项注定失败的计划；其他的作者则认为文化是调节经济活动的。他们的思路都是正确的，但他们需要放弃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中所热衷使用的数量方法，同时也要承认：理解各种文化现象需要在数量描述和解释上作某些尝试。这些数量描述和解释往往是被大部分希望按照现行风尚来实践“人类科学”的人们所厌恶的。

在这方面提出的一个重要教训是：没有任何令人满意的方式

酬报各种艺术作品。如果仔细思考历史事实，就会非常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在各种社会中，要通过市场把给予一件艺术作品的报酬固定下来，这种做法已被证明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它使艺术家的生活依赖于愿意花钱买其作品的顾客；而且，即使可以把一个艺术陈列馆作为媒介，也不能帮助解决什么问题，因为艺术陈列馆本身也总是期望为其服务支付报酬的。如果国家或者其他政府机构支持艺术家，那么就使艺术家变成文职人员，并使他的创造力量服从于行政部门的支配。在那种文化水平提高通常伴随着财富增长的时代，官职任命权具有真正的优点，这不仅由于它是由那些在智力上和艺术上都受过教育的精英们所行使的，而且由于它在精英之间建立了竞赛以保护艺术家，或者至少是主要的艺术家。自从那时以来，时代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

当今，在冷战的气氛和潜伏的政治冲突中，最重要的是行政部门应该注意清醒地认识艺术作品的劝导性效能和通讯联络能力。无论效仿的是什么样的政体，无论发展水平如何，政府都应该注意使艺术家们的创造成就和本国文化遗产中的不朽财富让国外了解。由于某些计划试图用流动展览来吸引人们敏感的内心世界，并且在这种内心世界中，可以通过共同的美感来冲淡政治分裂，因而这些计划曾经引起了争论。

也可以引用许多其他例证来说明在抵制经济侵略中的文化力量。总之，一旦抓住了如下两点，这种观点就会得到最为直接的证实：

1．经济现象和经济制度的存在依赖于文化价值；并且，

2．企图把共同的经济目标同他们的文化环境分开，最终会以失败告终，尽管有最为机灵巧妙的智力技艺。

如果脱离了它的文化基础，任何一个经济概念都不可能得到

彻底的深入思考。

比如，被作为经济“支柱”的竞争，乃是一种可以产生“最佳效果”的活动，也就是说，是一种被经验证明是能够以最低成本和最低价格而使顾客满意的活动。它是一种运动形式，正象其他的运动一样，它也有着自己的运动规则。竞争运动规则把“合理的竞争”与“残酷的竞争”区别开来，进而力求降低由消除不成功的竞争者而造成的各种社会损失。无论这种情况在实际上可能观察到的是多么少，而最少反映道德规范的规则总是在给予整个社会正常生活以应有尊重的情况下，在可接受的竞争与不可接受的竞争之间划了一条界限。

这完全说明，在财产所有权、契约关系、企业组织、对雇佣劳动者的保护等方面，经济同样服从于文化价值。

更具有结论性的事实是：历代著名的经济学家根本不可能把共同利益与市场经济体系一致起来，也根本不可能找到用来衡量这种一致的方法。福利是一个产生于市场规定的价格而带点模糊性的概念。由于价格并不是严格增加的，而主观因素是不能缩小的，因此，要对共同利益进行理论上的说明，必须排除各种实际上不可能存在的情况：

有关个人增长上的各种无差异曲线（K·威克塞尔）；或
经济福利与社会福利一般增进的相似（A·C·庇古）；或
生产者和消费者在经济上的各种剩余都是同量的假定（霍特林、J·R·希克思）。

经济学家要放弃这些一味凭理智行事的做法，就应当承认：正象社会上存在着较多的政党（冈纳·米尔达）或者较多有组织的人类团体（G·J·施蒂格勒）一样，社会上也存在着多种形式的

福利。这些福利形式对于进行一种描述性的研究来说，都是不能被完全排除在外的手段；而且，我们也已经指出，这些福利形式主要是指文化价值和文化现象。

正是文化① 和由文化价值所造成的社会等级决定着比对生产和分配的任何经济分析更为重要的角色分配。这些经济角色和社会角色并不是被永远规定了的，它们可能受到挑战，也可能成为各种社会冲突的主体；在一个长的时期中，进入角色的各个行为者并不会满足于在所指定担负的角色范围内来发展。那些最有活力的行为者设法从社会等级上往上爬，并且设法依靠联盟和各种联合来改变其形象与地位。

我们可以适当地把两种比较粗糙但尚能运用的略图放到一起来对比这两种社会，即按照社群距离与社会统治所建立起来的社会与设法降低各种不平等并促进参与的社会。第一种略图完全适用于19世纪工业社会的结构，第二种略图则反映了这种结构深刻变化的初期阶段，劳动界非常希望这种变化，而统治阶级则只是

表4.1

A．在19世纪所看到的进展	B．在20世纪下半叶开始出现的进展
严重脱离于稳定团体的个人与精英的出现	团体中较高的物质、文化水平使团体能够产生出自己的精英
统治集团的权力服务于构成“过滤结构”的特权阶级	专门精英与社会精英的权力服务于各类新的活动
把价值体系建立在上层社会，而上层社会又将这些价值体系传送到团体	通过团体与新出现的专门精英与社会精英的积极交换而建立价值体系

① 伯特兰·圣-塞尼：《决策》，巴黎，加利马尔，1979年；戴·克里斯纳："文化"，《国际社会科学杂志》（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9卷，1977年第4期，萨迪·埃丁·伊贝拉海姆与尼古拉斯·S·霍普金（编）：《转变中的阿拉伯社会——读物》，开罗亚美利加大学，1977年；琼·卡泽纽夫：《习俗与人类环境》，巴黎，法兰西大学出版社，1957年；R·鲁伊：《价值世界》，巴黎，奥比尔，1948年。

在对劳动力需求的压力下才会勉强接受这种变化。假定社会阶层的划分是以经济地位、受教育程度以及对形成政治意志的实际贡献为标志的话，那么，可以用非常概括的形式画出一条平行线（参见表4.1）

在那些能够使工作于工业和城市地区的个人与生活于农业和农村地区的个人保持联系的发展中国家，对于“B”种形式的进展是否同与封建型制度持续有关的“A”种形式的进展相一致的问题加以研究，将是非常有趣的。

在文化因素起着决定作用的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各种经济与社会角色到处都会无能为力。

文化不能进行各种量度，也不能将其发展归结为某些过分简单化的动机。这些动机是根据对快乐与痛苦进行核算的进一步设想，而建立在假定是可以归纳为享乐主义的行为模式基础之上的。文化所以不能进行这样的量度与归纳，其原因就在于：进行计量的艺术，尤其在资本主义以前的经济和社会中，是同各种行为联系在一起的，并受这些行为影响的。这些行为因缺少一种更好的描述，可以说是受限制的和被激励的，假如这些术语本身受限制的话。

最激进的行为主义已经放弃在社会关系中探求那些实际发生作用的习惯性行为方式，但它承认那些很少受意识和深思熟虑的意图所支配的有条件社会活动的重要意义。这样的活动在任何社会联合体中都能够看得到。

被激励的行为是指那些由按照道德价值与审美价值而确立的目的支配和促动的行为。这些行为包括一般被认为是对人类尊严最庄严表示的行为，如一个母亲对其孩子的爱，为此而牺牲自己的生命；又如战士对其祖国的爱，为此激励他为祖国服役，并情愿为其献出自己的生命。

在诗歌与艺术领域中，对于保罗·瓦莱里所讲的这句话加以

思考是有益的："非诗意性的但是有益的行为规则是……通过最小的力量和最短的途径来实现这些行为。"

要对经济利益与文化的各种潜在冲突进行这样的分析，必须把重点放到在所有情况下都非常重要、尤其在发展中国家的情况下更为重要的这样一种要害上。

我们所谈的这种要害就在于：市场和资本主义"毁灭"了它们所不能取代的文化价值和道德价值。它们所运用的各种方法，就其现有形式看，并不是与在教科书中的那些通常解释相符合的。由于对物质产品的迷恋、人际关系变得客观化、无所不在地登广告、以及各种货币收入形式的诱惑——包括金融投机，市场和资本主义实际上易于使文化标准发生动摇，并使人的思想具体化。当然，更不用说市场和资本主义在公共管理与私人利益关系上所助长的腐化了。

如果新的发展研究不能深入到人们的思想最深处，深入到人们所设法永久保持的但常常又是虚弱的社会的最深处，那么，对于这种研究以及由这种研究所要求的总体调整的思考将会是肤浅的，并且是很难达到目的的。

最具有破坏性的失败和最富有成效的胜利都是在人的思想和意识深处中所进行的一种悲剧性运动的结果。这种世界性规模的运动很可能造成一种虚假的印象，但我们应该看到，它决不会改变这种判断的实质。每个人和每个人类社会都在探究他（它）们命运的意义，而这种意义就是文化的意义。

世界的各种价值与各个方面的世界

调查各种动力因素经济效能的丹尼斯·罗伯逊先生，在对最强的力量和最高的力量加以区分并且把前者放到优先地位时，他是

按照私有经济来考虑问题的。

如果经济明显地需要组织，并且是公共的组织，那么，完全有理由怀疑个人利益、利润追求或货币收入的追求能否足以使组织形成为一种人类秩序。市场和资本主义——各种动力与机制——在整个世界上还没有成功地克服饥饿与最凄惨的贫困。在两个开发的十年之后，前景实际上仍然是悲惨的，因而需要在迄今所遵循的方针与战略上有一个根本的改变。

研究世界的三种方法或三种观点表明，就整体来看，世界是由有结构的子集组成的，这些子集之间的关系是非常不对称的，而且各种不平等也是深刻的和普遍的。

国家的世界是由世界政治图的各种不鲜明色彩所描绘的。事实上，这种描绘是错误的。因为各个国家在人口、资源、财富和发展水平上不平衡。更重要的是，它们的边界是和超级大国以及一些主要国家的权势范围与统治范围交叉在一起的。任何地域的描绘都不能准确地反映这种情况。假如忽视了这一点，国家就会冒严重的危险；对于每个国家来说，最好不要被它们的纯粹合法主权和文化势力范围所迷住。

每个国家既不能自给自足，也不能完全“开放”，因为它们是保护其自己居民的，决不能牺牲居民的利益来无条件地接受“世界价格”的支配，或者保护外国的力量。如果不准备放弃它自己的独立性，那么，每个国家无论多么穷和弱，都要在相互依赖的体系范围内寻求自治；也正是由于这些相互依赖，它才和其他国家不平等地联系在一起。

发展地区的世界包括各种工业集团与金融集团，它们的各种推进效应（在某些部门中也有阻碍效应）对世界其他国家也会产生影响。在东方，有影响卫星国的苏联；在西方，美国、日本和发展中的欧洲构成了三个主要的世界发展地区。在每一个这样的地

区中，各国的方针和一些主要经济集团和金融集团的方针自然并不会是完全一致的。因而，这些特权集团的方针需要研究——根据所涉及的范围与环境——真正的决策中心应当处于何处。这些发展地区之间也不是平等的，它们对世界的影响是依据世界上各种政体和它们的扩展计划而加剧变化的。

在各种形式的竞争中，或者在各种政治权力同每一个主要发展地区中起作用的非正式权力的政治同盟中，次要的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决不能置身于那些主要伙伴所发动的竞争之外。它们不能仅仅是在一个棋盘上被来回拨动的卒子，因为它们坚定的政治立场是比较重要的竞争对手不得不认真考虑的一种因素，尤其是因为它们依靠各种同盟与联盟，也具有一定使用策略的自由权。

最后是群众的世界。①这样的世界往往被前两种世界所掩盖。但实际上，正是这种世界给了我们时代以一种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推动力。

群众，即被迫服从于基本的生活条件并被宣判为只能以维持生活的最低水平来生存的群众，过去总是在这种世界中受排斥的、保持沉默的。然而，今天的群众再不能被无视了，无论他们是在地球上挨饿的十亿人民，还是城市中或由于受统治而落后的农村公社中各种等级的群众。

按照卡尔·马克思的理解，阶级正在丧失它在19世纪发达国家中所具有的大体上相似的特征。上等阶级决不希望放弃资本主义所赋予它们的各种优势，也决不希望离开被剥夺的阶级。从整体上来看，在工业化国家中的工资雇佣劳动者阶级也不能再被作为人类贫困的参照与象征。发展中国家的群众正是这种贫困最有代表性的受害者。

---

① 弗朗索瓦·佩鲁：《群众与阶级》，巴黎，卡斯特曼，1972年。

集中在某些发达地区和经济空间中较高的收入和增长的资源还没有得到扩展；地方的或个人的进步还没有变成全面的进步；在技术、生产、运输与通讯方面令人惊愕的发展成果，一般说来，主要地是对那些比较富裕的国家和阶级有利。

正象已经指出的那样，我们从其三个主要方面加以思考的世界，也不是一个能够按照全世界的利益和全体人民的愿望而调节的系统，当然，更谈不到它是一个人类大家庭，尽管这个概念在安全、信赖以及经常的智力交换与心理交换方面会有这样的意思。

人类大家庭还没有出现，而且也没有任何自发出现的可能；这种人类大家庭是用来表示人类伟大事业的名称之一——当然还有其他名称，正象我们不久将看到的那样。

为了运用一种需要在能够弄清意思之前加以纠正的词语形式，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给我们指出了一条前进的路线。这种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就其词的通常意义来说，作为一种唯一的以至主要的经济秩序，显然是毫无疑义的。而要调节由一种基本上对称的关系而联结起来的大量有构子集的作用，恰恰又需要一种政治秩序。不过，秩序的概念需要进行深入思考。

在那些坚持把经济与政治进行绝对分离的"传统"经济学家们看来，经济秩序乃是一种由市场建立起来的秩序。这种秩序在大部分论文中始终受到吹捧；没有这种秩序，混乱就会不可收拾；正是由于这种秩序，各经济单位的兴趣与偏好才会找到和谐一致的规律，彼此成为可能。

为了改变各个国家的等级地位及其相互关系，自从第一个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出现以来一直到今天，市场秩序始终受到提倡和拥护。这只是一种分析上的逻辑方法，这种分析方法忽视了国家的现实情况，而只考虑到了在同一空间中的各种要素与产品，因

而，对于市场并非是完善的、它需要依赖组织这样的事实全然没有重视。对于权力，实际上也就是对于政府，应该引起政治学家们和公法专家们的沉思，同时要引起统治者们和外交家们的警惕。他们的职责就是为世界制定法律和秩序，其目的就是要保证市场的正常运行，而不受任何可能会干扰它的外部干预。

用一极是经济的准则另一极是政治的准则，而在经济学的知识缔造者和建立者与政治学的知识缔造者和建立者之间进行分工，很可能被证明是错误的。这样，就促使我们注意克服一种深刻的矛盾。

政治学不可被取代的对象是研究社会生活中人们的命运问题，而社会实质上是一个等级组织。“正统”经济学研究的则是那些仅仅通过市场而相互联系的个体经济单位，这些单位接受的是所有完全来自价格并由自己处理的信息。这种经济模式所以“纯”，除了购买力问题外，主要是由于未涉及等级制度，同时也是由于受政治模式中现行存在的等级与权力的影响。

只有在所有经济单位之间实际平等排除了一些单位对另一些单位在任何方面、任何领域中的支配权这样的前提下，这种矛盾才能够得到解决。假若是这样的话，国家的功能和市场的功能恰好是一致的。在这两种情况下，国家的功能与市场的功能就在于建立和维护所有单位的相互平等。这样，国家的角色与市场的角色的区别就会逐渐消除，结果是各个经济单位都能够相互替代，并且相互处于完全对称的关系之中。

从政治与经济的完全隔绝出发，我们得到的却是一种政治与经济难以区别的结论。由市场所构成的社会，即被J·M·克拉克所蔑视为“假市场的社会”，和无政府的社会，即在词源学意义上的无政府状态，都是描述完全相同概念形式的两种同一意义上的术语。这种完全相同的概念形式反映的是由独立于行为主体的自然法则

所支配的各个原子、或者说在本身的自然法则盲目作用下而自发合作起来的各个相同单位所自发产生的平静而富有成效的冲突。这种冲突在两种术语的每一种词义上，都是一种自然秩序；而这些词义则是由各种绝对规范的思考所造成的简化和纯化引起的。

这里所讲的概念形式是和从人类最早时代观察到的以及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存在的实际情况相矛盾的，最根本的是和混合人群关系的前提（冲突与合作、斗争与妥协、敌视与同情）相矛盾的。而这种前提的内容却是和科学的结论与历史的教训相一致的。

在相互不同的并且相互不平衡的各种力量之间，不对称现象的出现是普遍的。它要求依照价值来进行调整，而这些价值只有不仅被认为优越于已建立的政治秩序，而且优越于已建立的市场时，才具有仲裁的力量。在一个国家中，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是各个有结构的组织之间忠实的关系。这些组织合起来就构成了象我们所看到的、在其中生活并在其中活动的世界。

通过各种结构上的辩证方法和文化间的对话而把一种具有人格化的秩序引入这些关系，这种可能性并不取决于一种慈善的自然的法则，或者人的“天然”性善。

那么，新的世界秩序能够从扩大到整个世界的政权中推论出来吗？这就是由那些寄希望于建立一种“世界国家”的人们所接受或提出的观点。这种“世界国家”从支配理论来讲，属于一种被合法化的强制力，如被西方所实行的各种民主程序合法化的强制力。

要评价这种观点，我们先不涉及它以某种特殊形式实现的可能性和或然性，以及在短期、长期或是更长的时间内实现的可能性和或然性。这里，仅仅与读者有关的，是我们已经谈到的关于道义上不可克服的差别问题，即政府的合法化与它在对人的良心最终评价上的合法性之间的差别问题。这实际上谈论的就是生与死问题。

必须牢牢记住，个人的发展、个人的自由，是所有发展形式的主要动力之一。这种个人的发展和自由能够在每个人所赞成的和在其各种活动中所感受到的各种价值范围内充分实现他们的潜力。

显然，如果这些产生于经验的规范前提能够被接受的话，那么，就不可避免地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世界国家"也会象我们通常所了解的国家一样残暴与冷酷，尽管它使用的方法不同。世界军队或警察力量的各种有前提条件的活动，必然要按照统治者的意志来进行，统治者总是控制着这种军队和警察力量的使用；同时，也必然要按照统治者进行决策所依照的各种观点来进行。理性价值与道德价值的结合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上，它们都是接近合法性的基础，也是对合法权威所作的各种决定默认的基础。

要预先知道历史的发展进程是根本不可能的，因而，所提出来的各种似乎有道理的方案也不会是那么有价值的。要对世界历史的各种事实和现在的世界状况作出清楚的分析，看来无论如何需要从人的角度指出一条可以接受的一般研究路线，并指出每个人以及整个人类多方面的、全面的发展方向。

人们头脑中所设想的秩序表现为一个综合的目标和一个共同的计划。

正是由整个世界上各种强大力量所支持的这种努力，阻止我们"放弃"下面三种象"乌托邦"一样的主要计划。这些计划可以概括如下：

全民意志的动员和舆论的建立

所有赞成西方民主的国家都应具有各种必要的手段来教育他们的公民，并引导他们消除其在所尊崇的价值与实际所作的事情之间所产生的矛盾。在这里，培养与教学工作的总方针与内容应负有大量的责任，并为改进留有更多的余地。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消费、生产和分配上的结构改革

我们知道，假如发达国家少消费肉类与酒类，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就会好转；我们也知道，对于任何实际范围内的活动来说，发达国家总是需要将其生产重点转向必需品；我们还知道，财富与收入的分配易于受到两类国家更多的非难。现在所缺乏的正是必须进行改革以便克服结构惰性的愿望。

逐渐地、全面地和有控制地进行裁军的战略①

按照我们前面已经研究过的各种方法，即使把那些用于准备和进行共同残杀的很小一部分费用加以再分配，也会改变整个世界的面貌。人类实际上必须在对"合法化"屠杀的癖好与对为人类生活服务的爱好，或者说对生存的爱好之间进行选择。

这些主要攻势并不是要取消对于基本共同体中和人类日常生活中的非正义行为进行耐心地逐渐消除的必要性。正是在少数人的头脑中，形成了最大的人类思想潮流，而对伤害或安全的要求则可以在所有人的头脑中产生。

由于我把发展看作是与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不可分割的，并且将新的发展研究作为自己的主题，所以，我决不能从上面这样的理想出发。因为这种理想的那些要求反映了各种不切实际的空想与怪异的倾向，这些空想与倾向恰恰是被"规范"经济学恰当的分析所藐视和谴责的。这种"规范"经济学是现在所实行的、被认为是唯一合理的经济学，同时被设想为是可以用现行的正统观念加以控制的经济学。

对发达与不发达认识的日益深化，已经帮助我们了解到：支

---

① 阿尔瓦·米尔达：《裁军运动——美国和苏联怎样进行武器竞赛》，纽约，潘西奥·布克斯，1977年；冈纳·米尔达："世界发展中的平衡"，诺贝尔讲演，1975年3月17日，载1977年《瑞典经济学杂志》，第77卷；《亚洲戏剧——对亚洲各国贫困状况的调查》，20世纪基金研究组织，纽约，文塔奇·希克斯，1970年。

配理论是绝对规范的；它是由世界最发达的国家所创立并为其服务的。而且，由于各种剩余产品在一个国家或全世界不适当□分配，因而这种理论是优先地而且日益增大地为“上层社会”（约翰·斯图尔特·穆勒）的利益效劳的。它把支付能力的法则与市场法则只强加于那些设法满足其需要并实现其某些愿望的居民身上。

我并没有把新的发展运动看作是对各种要求目录的描绘，这种目录实际上是为了在谈判中进行辩论，而用通常在这些辩论场合中所使用的夸张语言来起草的。即使某些人有这样的意图，并且这种意图能够在某些夸张中被识别出来，而本身与人类历史一定阶段相联系的发展运动，对我来说，也是与一种更广阔的经济思考范围一致的；而且，这些经济思考是依靠各种新的分析手段进行的。最主要的公式和模式适用于各种结构、结构次序以及明显的和潜在的人的因素。行为者，即能够改变其环境的人们所固有的富于变化的能力，对于一般经济理论的更新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认为，这些都是无可辩驳的、令人鼓舞的信号。专题研究、统计和专门的、严格限定了的计量经济学运用都是必要的，但要使它们有助于经济思考，必须将其置于一定范围内。详细准确是一回事，而严密则是另一回事。因此，需要对进行各种计量与核算的范例有一个总的说明、基本的了解和有意识的、经过深思的接受。

至于其他，由于在这里显然只能提出一些指导性意见，所以我只是在上面指出了某些把新的经济理论与科学和哲学思维的发展相连结的方法。

自从18世纪以来，哲学在对社会及其经济问题的研究中，已经或明或暗地变成了一种自然哲学。这种哲学起初是按照各种神学中的上帝概念和观念来解释的，并且从牛顿起，被解释为一种机械的社会物理学。按照这种社会物理学，人们可以发现自然规

律，但只能受这些规律作用的摆布，而没有任何希望对其加以控制。当启蒙哲学抛弃了上帝的观念，开始讨论人的本性时，它是沿着这样的道路发展的，在这样的道路上，它最终需要在全面、彻底的怀疑论与排斥各种目标与目的的严格决定论之间进行抉择。

20世纪科学和哲学的一些主要方面正在深刻地改变着我们的知识环境，并且必然对各门逐渐有机联系在一起的、经过检验的知识产生重大影响。对于这些知识，我们常常过分乐观地把它称作为人类科学。

如果人是有计划性的，而且这种计划性包含着掌握知识的可能性，那么，我们就得远远离开由19世纪唯科学主义所宣传的那种决定论的唯物论。如果最新近出现的热力学在解释各种耗散结构方面是正确的，那么，就不能认为世界与人是向着无序状态进化的。

至于现行的哲学，任何人都不能不受到它的力量的影响，而一些哲学流派也正是用这种力量来赞美人的创造自由和各种活动的优点，因为活动导致了人的才智、创造力和每个人的价值追求的实际综合。由于这些思想能够被所有人们所理解，并且对于那些被压迫者和不幸者自然而然地具有吸引力，因而这些思想和新的发展研究方法的各种希望与努力是一致的。

上面这些仅仅是部分说明——只是提出了一些“补给站”，因此，需要使我们的思想得到进一步的解放。

这些说明使我们有正当的理由接受安德烈·迈耶①在一篇非

---

① 安德烈·迈耶，《人的培养》，布鲁塞尔，196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的天赋权利》，在珍妮·赫希指导下制定的文集，巴黎，罗伯特·拉封，1968年，法国和西班牙通用版；琼·拉克鲁瓦：《愿望与要求》，巴黎，法兰西大学出版社，1975年。

常杰出的文章的结尾中所奉献给我们的临终的圣餐。在这篇杰作中，他对“人的伟大事业”的信念超出了对“自然的伟大事业”的信念。

附录：各种模式——它们的范围及其恰当的应用

构成新的发展研究方法的各种直觉基础，产生于现实经验和敏捷的行动。各种直觉都是和正统经济学对发展的静态解释背道而驰的。这一点已充分地被新发展的内容所证明（见表A.1）。

表A.1 新的发展研究的内容

1	2	3
概念	内容	形式化
发展	(a)—演进 —各种结构 —"活度"	(a′)—与不可逆时间中各个部门的增长速度相联系 —随之引起结构上的改变
整体的：	(b)—世界整体 —它的每个方面	(b′)—各个集团 —各种空间 —划分 —拓朴学
内生的：	(c)—"从内部"自力更生	(c′)—人的各种因素 —权力
综合的：	(d)—结构间的相互联系 —结构的稳定性	(d′)—权力 —系统研究方法 —控制论

可能使人们感到怀疑的是，这种新的发展研究方法能否在任何时候都便于形式化、便于数学表达、甚至便于对各种方案与计划进行适度的数量处理呢？

从另一方面来看，这种新的发展研究方法不是与经济学家用各类数学工具所引起的变化完全一致吗？而且，这种研究方法不

是可以阐明经济思想家们所遇到的各种重大难题以及最新研究工作的合理性吗？

发展中国家难道不能正当地要求冲破各种狭隘理论和市场分析的限制吗？因为这些狭隘理论与市场分析武断地隔绝了与人类历史各种能动力量的联系，因而与人的能动作用相分离，并把人的能动作用弄得支离破碎。如果考虑到那些长期被忽略的因素和关系，事实上有些因素和关系是内含在新的发展研究方法之中的，那么，不是可以把形式化和数学表达应用于正在逐渐被改进的经济学吗？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应该考虑如下几个方面：

一般理解的数学

活动的形式描述

成本一收益分析的扩大

罗马俱乐部的模式和向罗马俱乐部的报告

国家计划和世界模式

我们将通过各种模式的范围及其恰当应用的基本估价来进行这种考察。

一般理解的数学

按照G·德布雷和K·J·阿罗的观点，最显著的变化是从拉格朗日古典力学接收过来的、受到某些怀疑的数学转向拓朴数学。

前者描述的是不可变形物体的空间运动及其静止（在两种相同和相反力的作用下所产生的平衡点）。后者则允许空间能够缩小、扩大、变形，并且能够表现各种经济力量的活动；它描述的是在各种条件限制下逐渐平衡；它进一步扩大了垄断竞争的所有模式，而保留了这些模式所教给我们的一切东西。

而且，与这种变化密切相关，各种概率的和随机的模式也被提升为决定论的模式。

概率性的空间能够为经济领域中新提出的各种与主、客观可能性相关的论点提供检验的机会（R·拉德纳、K·J·阿罗、P·梅西、H·萨维奇、N·乔治斯卡-罗根、J·莱索纳）。假如经济学家决定考虑不可逆的时间和引进来的新奇事物，并设法对不确定性和风险加以控制——尽管到目前为止这种控制还没有完全获得成功，那么，情况就必然会是这样的。

不同的和不平等的经济行为者，其需要和愿望并不会是自发地相互一致的。一旦考虑到垄断竞争的各种方式，所预想的活动和所实现的活动就必然包含着各种交叉。在奥斯卡·摩根斯顿和J·冯诺伊曼关于竞争的著作之后①，已经把“冲突”引进了当代理论。在使“冲突”形式化方面（马丁、舒比克、施莱歇尔），已取得了明显的进展，达到了包含各种连续竞争以至为改变竞争规则而进行的各种斗争（马奇）的程度。纳什的模式②，即在市场由两家卖主垄断的情况下，把威胁下的平衡与协商后的平衡加以区分的模式，或者是对于新增加的财产进行竞争的各种模式，都强调把有益的协商作为一种超越斗争的手段。

系统方法在各个层次上（微观单位、工业、经济团体）可以利用有向线（图表）来表示（J·莱索纳、R·瓦莱、F·勒穆瓦纳、蓬萨尔、R·朗特纳、J·加佐、M·莫乔特）；它也有助于表示各

① 奥斯卡·摩根斯坦和J·冯诺伊曼，《竞争理论与经济行为》，1967年第3版，纽约，约翰·威利父子公司；埃瓦尔德·伯格：《竞争理论入门》，柏林，沃尔特·德·格鲁伊特，1959年；邓肯·卢斯、R·霍华德·雷福：《竞争与决策》，伦敦，约翰·威利，1957年；安德鲁·肖特与格哈特·施沃迪纳：“经济学与竞争理论——述评”，《经济文献》，1980年6月号。

② F·J·纳什：“交易问题”，《计量经济学》，1950年；“两个人的合作竞争”，《计量经济学》，1953年1月号。

个子系统等级上的相互关系以及对这些子系统的控制①。

控制论（按照诺伯特·维纳、C·E·香农、O·兰格、路易斯·库非格纳和G·T·吉博德这些经典作家们的观点）是研究有组织的系统的，这种有组织的系统含有一种目标函数，而且，这种系统可以反馈②。

信息论吸收了各种现代数学形式，并正在把新的成分引进经济思想的所有领域（雅各布·马沙克、R·拉德纳、奥克塔夫·奥尼塞斯卡）。

谨慎地运用并以严格科学的方法进行热力学的类比，可以为各种平衡模式提供理论基础。这些平衡模式都估计到了单位之间、混合单位之间、内涵的和外延的因素之间规模上的差别，同时也估计到了这些单位与货币“储存库”或资源“储存库”的联结（A·L·利希尼罗威克茨的模式）。

在同样严格控制的条件下运用类比，可以启发我们从普利高津和布鲁塞尔学派所提出的耗散结构模式中吸取可以利用的有益东西③。

---

① 戴维·C·马金松：《现代逻辑中的若干问题》，伦敦，梅休因，1973年；J·L莱昂斯在法兰西学院的就职演说，担任数学系统分析与系统控制研究所所长，1973年（小册子）；参见R·瓦利出色的介绍："系统理论"，《科学园地》，第19期，佩伊，1979年；P·德拉特雷，《系统、结构、功能、发展》，巴黎，多伊，1971年，J·科南：《反平衡》，阿姆斯特丹，北荷兰出版公司，1971年；J·莱索恩：《计划系统》，巴黎，达罗兹，1976年，B·沃利斯：《系统与结构》，巴黎，湖滨出版社，1977年，J·L·勒穆瓦纳：《普通系统论》，巴黎，法兰西大学出版社，1977年，尼·J·T·A·克雷默与雅各布·德·斯米特：《系统思想》，马蒂纳斯·尼雪夫·雷登，社会科学处，1977年，赫伯特·A·西蒙："系统科学与人为科学"，EPI，巴黎，1974年，拉米罗·康波斯·诺德曼，"控制论的经济应用"，马德里，1975年。

② G·Th·奎尔鲍德，《控制论》，巴黎，法兰西大学出版社，1954年，同一出版社出版的还有路易·库非格纳的《控制论》。

③ P·格兰斯多夫和I·普利高津：《结构，稳定与变动》，巴黎，马松与西伊公司，1971年，I·普利高津和伊莎贝尔·斯坦格：《新的联合与科学的进化》，巴黎，加利马尔，1979年。

这种模式的一个最基本观点，就是认为发展可以导致物质与能量远离平衡位置的亚稳状态。假如排除纯粹语言上的变换之外，这种观点就为物理的（N·乔治斯卡—罗根）、生物的（阿特兰）和“信息的”（O·奥尼塞斯卡）熵和负熵的研究，以及它们在经济系统与社会系统应用结果的研究开辟了一条道路。

任何有见识的观察者都不会怀疑这种进步的要意、方向和性质，而这种进步的取得正是这些形式化的结果。这些形式化在性质上完全不同于物的机械平衡，即惰性物体的机械平衡；它们可以更恰当地繁衍出行为者即活动单位的各种计划网络和活动网络，并繁衍出各个单位与其联盟或同盟之间的斗争—协同网络以及冲突—合作网络①。

它们描述的是各种相互作用的结构，并力图满足对发展的各种组成部分进行表示的“要求”〔见表A.1：2（a），3(a′)〕。

新的分析不是仅仅为了适用于受静态分析基本顺序所约束的个人、个体单位和物品，而是要运用必要的手段来寻求各个单位与部门之间的联合（矩阵），并探索这些单位与部门同各种不对称现象的潜在因素（对角矩阵）相联系（转变矩阵）的道路。另外，还有一种大胆的想法——目前还主要是纯理论性的——是把有序时期的矩阵置于矢量空间和能量空间中，而在这种空间中，这些矩阵会出现变形（吉斯普·帕洛贝、切鲁比诺）。显然，这是把整体中的各个部分综合起来作了一种发展的描述〔见表A.1：2（b）和2（b′）〕。

运用那些采取三种规范形式（结构空间、极化空间、计划内容的空间），并且同函数有关的各种空间（决策空间、运行空间）

---

① 弗朗索瓦·佩鲁：《一般经济均衡理论的新发展与跨学科研究》，巴黎，马洛伊纳，1977年；吉斯波·帕洛姆巴：《资本的扩张》，1968年第2版，贾埃尼尼·纳鲁利斯。

结合在一起的经济空间，就有可能完全精确地描述地域结构的异质性，并有可能为形式化地表示“国家”开辟道路〔见表A．1：2(c)和3(c′)〕。

此外，对于不对称现象、组织（赫伯特·西蒙）和决策，主要是多重标准的决策的所有数学表达，都会导致对各种权力相互联系的形式化研究〔见表A 1：2(d)和3(d′)〕。

这样，我们就有了一整套参照标准，而这些参照标准在所规定的限度内，可以使我们能够充分详细地、精确地、系统地作出这样一个全面的评价：一般均衡的力学正在让位于更贴切的、更灵活的、在某种意义上说更为复杂和精致的形式化，这些形式化包括对行为者、活动以及行为者与活动结构的形式化，因而，这些形式化从表面来看，完全适合于那些整体的、内生的、综合的发展形式，而这些发展形式在直观上正是发展中国家所需要的。

通过对一种更为具体的对象加以形式化的思考，这种评价就可以得到证实。

活动的形式描述

最优化在其现有形式上，是和L·S·庞特里阿金关于最佳作用的著作联系在一起的。最佳作用是由过去的最佳资源分配造成的，而这种最佳资源分配是对那些在不可逆的时间发展过程中，计划用来实现一定目标即一定预想结果而运用的各种手段结合的最一般表示①。

① 进一步详细参见弗朗索瓦·佩鲁，“‘战略费用’与‘积极协调’的概念”，《AFEDE手册》，1979年4月号；亚历克西斯·杰奎明：“企业与工业环境的动态关系”，献给弗朗索瓦·佩鲁，格勒诺布尔，格勒诺布尔大学出版社，1978年；弗朗索瓦·佩鲁：《跨国公司与新的世界经济秩序》，导言由应用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G·布朗多纳和里昂第二大学教授D·迪费尔特所写，新兴国家发展中心，里昂，1980年。

对于一个时期（O，T）来说，可以把目标函数表达为在不可逆时间（t）中各种分配变量（u）和状态变量（x）的结合。要对一定时期中各种状态变量（x）（矢量）和分配变量（u）作出函数表达，需要进行分类处理。我们可以用拉格朗日的（nx＋mu）项来描述这个问题，其中m＋n未知。

这就得出了如下的公式

目 标 函 数

$$J(\vec{x}, \vec{u}) = \int_0^{\circ} L\ (\vec{X}_{(t)}, \vec{U}_{(\cdot)})\ dt$$

必须用x（t）和u（t）来满足这些限制条件或方程式：

$$\mathring{x}i - fi\ (\vec{x}(t), \vec{u}(t), t) = 0$$

如果按照拉格朗日所概括的乘数和他的特殊变换来运用这些方程式，那么，就可以把最佳分配变量表达为下列因素的函数：

1．状态变量

2．乘数

3．时间

$$ui = \varphi i\ (\vec{x}\, i, \lambda \vec{l}, t) = 1, 2 \cdots\cdots m$$

这样，就在x和λ之间产生出一种微分方程系统，并且适合于各种极限条件，产生出各种有定值的解式。

这些形式化是对活动，即对不可逆时间中一个行为者或活动者各种有意识活动联系的一种最一般表达。这样的行为者和活动者，具有确定的目标，并且考虑到了他所观察到的各种情况变化。因此，行为者应当使自己所使用的各种方法适应于环境的变化。

很难设想根本不会出现与传统市场上的“机器人”完全相反的行为者。传统市场上的“机器人”在同它完全相同的行为者中间，与其同类者一样，只能受到市场价格的支配，而除了在数量

上适应之外没有任何其他抵制的可能。

如果能够改变其所处环境的大公司可以最终说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那么，这样的大公司显然具有首要的意义。

这种公司不是把自己所处的环境——人和物——看作是参量的，而实际上把它看作是可塑性的，就是说，易于通过自己的各种活动使环境适合于自己的优势。它不是单纯地利用与市场有关的销售成本，而且干预预算，因为这种预算能够使它作用于自己周围的自然环境，作用于它的竞争者，作用于工会，甚至作用于由政府机构所制定的各种竞争规则。因此，可以说它带来了“环境改变成本”。

可以把大公司的目标表达为该公司在一定时间内预计得到的利润流量的贴现价值：

$\Pi(to)$

它是下列因素的函数：

产量，Q

产品价格，P

改变环境的战略费用，S

时间，dt

这就产生了下面的公式：

$$\Pi(to)=f(Q, P, S)dt \qquad (1)$$

因而，贴现率P的内涵应当是这样的：

$$\Pi(to)=\int_{0}^{n}e^{-pt}f(Q, P, S)dt \qquad (2)$$

这一公式应该归功于A·雅克曼。我们可以把这一公式展开，应用到私人单位和公共单位，同时，也可以通过对环境改变的详细说明，对这一公式作进一步的发挥。通过对一些相互不一致的目标函数加以比较，就能够分析出处于商品供应垄断地位或

支配地位中的各个大公司间冲突的各种情况。

同任何模式一样，现行大公司的模式也只是一个设法了解活动领域的向导。按照伯特兰·圣塞尼的观点，“逻辑只有通过实际决策者的意志才能进入活动领域”，因而，在“实际决策者”与“抽象决策者”之间总是存在着很大的差别。

成本—收益分析的扩大

成本—收益分析是首先用来阐明与一种具体计划有关的决策问题的。我们可以举一个典型的例子来加以说明。假如建一座水坝，既要进行水力发电，同时能够灌溉，那么，就必须区别这三种成本与收益：建筑的成本与收益，由有关人员使用水电的成本与收益，在一个地区内与改善下水道设备有关的各种更间接项目（恢复浪费掉的人日）的成本与收益。自然，这些成本与收益的计算是建立在贴现率基础之上的。在早期阶段，由于对和人的较好健康状况以及适当的劳动收入有关的第三种成本与收益往往不太重视，因而这种成本与收益常常要被提出。

从那时起，对第三种成本与收益的分析已经逐渐扩大到象卫生、健康、教育、运输这样一些领域。现在，这种分析的对象可以包括全部发展中国家（国家具体项目评估系统）①。

我们可以用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来清楚地说明这种扩大。

由于引进科学与技术对于发展中国家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而我们可以以研究和发展为例，因为它能清楚地暴露出这种方法的适用范围。

要把成本—收益分析应用到研究和发展（R&D）上来，有必

---

① 丹尼尔·M·希德洛斯基：“关于秘鲁投资计划成本—收益分析的构想，”《工业与发展》，1978年第2期，联合国，纽约；“规划与具体发展计划，”《发展社会》，1976年第16期。

要对活动加以限定，并把各种具体成本与收益归因于活动。

然而，根据分析，实际上不可能对研究加以限定。因为科学家可以把自己的研究工作推进到一个他一开始就不能封闭的领域；他可以通过一系列的尝试性努力来摸索前进的道路，而前进的每一步又会引起下一步；在其计划不断执行的过程中，他可以随时修改这些计划；有时，他还可能发现某些完全不同于自己正在寻找的东西。对于一种新的方法或一种新的成果来说，应当特别注意到：与这种成就相联系的各种活动都是包括在一个更为广阔的调节系统中，假如没有这种调节系统，就不可能取得这样的成就。因此，各种新的活动领域仍然是模糊的。

顺便提一句，要对成本进行计算仅仅是可能的。为何如此？道理很简单：因为我们决不会知道研究是否会和何时会导致什么样的事情发生，或者更确切地说，我们决不会知道所得到的结果与原来预想的结果究竟会符合到何种程度。

至于收益，应当指出，私人经济收益在性质上不同于社会收益，而且，按照影子价格来计算后者所使用的方法来源于信息，这种信息几乎是生产于私人市场。

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怀疑，是否有可能弄清一项研究活动后来的成本与收益呢？能否预先非常准确地对若干研究方案的价值予以评估呢？

这些保留意见也同样适应于成本—收益分析在不同领域的应用。

在我们看来，扩大同整个国家结构有关的各种计划的成本—收益分析是最为重要的（国家具体项目评估系统、模数的国家具体系统）。在这方面，经济合作开发组织（OECD）、联合国(UNIDO—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和世界银行都已经做了大量而卓越的工作。

最近由丹尼尔·M·希德洛斯基所进行的关于秘鲁的专题研究，是值得注意的。

在秘鲁的首都利马和他的港口城市卡亚俄，工业与商业资源的集中竟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它们已占到国家所有的劳动者存款和银行存款的60%以上。而在秘鲁的北部和南部，除了一些矿业、鱼粉业和加工工业点外，整个说来是相当落后的。绝大多数印第安人既不会讲西班牙语，又不会讲其他作为媒介的语言。现在，秘鲁的政体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形成了一种能够接受外国资本主义的方针，同时继续执行一种受社会主义思想鼓舞的混合经济方针。

对于这样一种不平衡的发达经济，任何计算都要以建立和控制一种适合于全球结构的宏观经济结构为先决条件。这就不可避免地要放弃各种传统的最优化要求，赞同那些通常还是第二流的解决办法。但这些解决办法也无论如何不能用来抵制市场经济和资本，实际上，它们倒是从市场经济和资本中产生出来的。

在这些情况下，专家们总是把各种结构看作是永恒不变的。他们认为，“在可以预见到的将来，”不可能出现结构上的根本改变；而且，既然投资计划不能通过参照储蓄制定出来，那么，就应该由“金融资本”自由决定。一旦能够接受这些条件，生产函数和消费函数的“计算”就能够迅速进行。

如果同新的发展研究方法相比，这种方法有许多东西供我们吸收。

它一针见血地阐明了发展中国家的依赖性和外部强制的力量，解释了人们为什么要起来反对以市场和资本为基础的经济所产生的几乎无法忍受的严酷惩罚。但是，它没有考虑到自主的结构改革以及自力更生的需要。

上述这些方法的技术性处理决不要使我们忽略了这一点，即：这样的处理预先就决定不能超出某些界限。从利润经济的观点来

看，这些方法是有效的，都服务于一种特殊的方针。然而，这样的方针恰恰是被新的发展研究方法所反对的。

不过，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可能与不可能之间的界限总是经常变动的，不管是否有无具备最可靠依据的预测。

罗马俱乐部的模式和向罗马俱乐部的报告

发展的方向

毋庸置疑，探索性计量经济学各种最新出现的形式化，是专门用来帮助理解一定时间内各种结构及其相互间的连结〔见表A·1:1(a, a′,)〕、考虑人的因素〔见表A.1:3(c′)〕、描述结构上的相互联系〔见表A.1:2 (d)〕的。

在这里，我们自然想到采用因果分析图法的J·廷伯根、发明投入一产出分析法（1941）——这种方法现在已经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并且更加具有动态性——的W·列昂惕夫、介绍相关分析法（1943)的T·哈艾夫尔莫、以及从1950年到现在已经在预测方面作出最初贡献的赫尔曼·沃尔德。所有这些专家都精通自己的贾纳斯因素①、确定意义的定理和新近的NIPALS(非线性重复部分最小平方法）。这种模式能够容纳那些可以间接观察到的潜在变量，并且体现了一种向模糊模式的转变②。

---

①罗马神教中守护门户的两面神。——译者

② 赫尔曼·沃德:《具有潜在因素的开放模式、NIPALS研究方法、软模拟，传统模式结构和数据分析的中间环节》，乌普萨拉大学统计系，1977－1978年，“一般解释的数学，经验探索的数学，适合于经济方针的数学”，《应用经济学》专号，1973年第2、3、4期。卡米罗·达格姆和埃斯特拉·达洛姆：“模式的建立与经济计量学的分析”，《应用经济数学研究所手册》，E·M·系列，1974年第5期。

这些成就即使在那些最富裕而且拥有最多专家与统计资料的国家，也还没有带来经济方针上任何意义深远的实际变化。但它们要求提起对各种不同学科综合训练方式的模式以及在时间发展过程中各种结构的作用与反作用的注意，或者换句话说，要求提起注意的是：它们不在于概括和清楚地说明“增长”，而是要更重视于“发展”。

在“罗马俱乐部的世界报告”中，可以发现时代的另一个标志。

这些报告以可靠的根据表明：富有思想的人们现在已经意识到，各国的命运今天依赖于世界环境，而且，“地球经济”和“宇宙经济”——由于对外层空间的征服而把经济引进了宇宙——也不再是一些空洞的概念了。

在这些报告中，较早的报告作为我们主题的反证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较晚的报告则是专门注意研究新发展观的楷模。

第一份报告是由J·W·福雷斯特和他的小组集体创作的。这份报告考虑的是从长远来看正在逐渐耗竭的自然资源（煤、石油）问题，以及从整个地球来看的四大世界问题：人口、投资、农业投资和污染。每一个问题都带有一定的变化指标，并且这些变化在1960—1970年期间被认为是以“正常”的速度进行的。各种乘数也被应用到这些问题上来，这些问题既与增加乘数的活动（如在人口方面：食物和生活水平）有关，也与降低乘数的其他活动（如人口过剩和污染）有关。电子计算机描绘了从通常作为基本年的1970年到2100年的发展路线。

由此，就产生出这样一些前提与假定的结果：

1.1970年毫无变化——各种自然资源的枯竭。

2.1970年投资增加20%——2000年的灾难。

3.1970年投资、人口出生率和各种自然资源使用的大幅度减

少——2000年前后世界秩序的稳定。

这些分类预测曾受到了严厉的指责：世界范围的投资、人口、食物问题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这些大幅度减少是怎样分布的呢？世界显然不是由于这些大幅度减少而遭致灾难的。而且，所运用的各种乘数的实际价值又是什么呢？这就是有说服力的计量经济学的一种实例吗？显然，这是丹尼斯·加布尔（197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提出的观点，同时也是在由苏塞克斯大学所进行的详细而深入的研究中所得出的结论。

任何读者都会意识到，这些预测根本没有考虑到制度上的明显变化和各种竞争规则；对于每个国家来说，各种可能性的程度显然不仅仅取决于全球状况，而且取决于一个国家可能对其主要对手所采取的战略。

向罗马俱乐部的第二份报告试图纠正其第一份报告的缺点。

由于这个报告在一开始就提出传统价值应对我们的各种不幸负有完全的责任，并且悔恨人们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自然，干预了自然选择的进程，因而，这份报告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这一报告很可能是献给发展中国家的，因为发展中国家恰好关心的是这样一种自力更生的观点，而易于充分地、舍得花本钱地利用人力资源的所有制度也符合于这种观点。

第二份报告把整个世界划分为十个主要地区，并提出了带有从1975—2025年这一时期数字的各种方案。

我们以东南亚以及人口与各种生活需要之间的关系为例来说明这些方案。

方案1，即“标准管理”，反映的是一种巨大的粮食亏损，由此推断出，与此有关的国家根本负担不起进口的费用。

方案2，是以上面同样的一般假定为根据，要求增加严格的食物配给量，因而这示意的是以普遍饥荒形式出现的灾祸。

方案3，表明的是农业投资没有伴随工业投资所带来的各种灾难性后果。

方案4，表明的是一样一种情况，如果不可能求助于已付的进口，尽管15年中人口出生率保持平衡，广泛的营养不良也会出现。

方案5，是以严格的节育为先决条件的。假如能够严格节育，并且与所有国家（包括东欧国家）进行合作的话，那么，东南亚就会使其粮食亏损得到好转，同时使其收支差额得到平衡。而这种平衡正是合适的工业与竞争出口的结果。

自从1975年以来，悲剧一直是在东南亚地区上演着。重温第二份报告也许会给这种悲剧增添另一种悲剧性的观察材料，即某些西方人并不承认有可能用不同的方法组织市场经济，以有利于拯救处于死亡边缘的劳苦大众。

在RIO报告（重建国际秩序）之后，罗马俱乐部最新的报告充分证明：目前研究的重点已经转到对世界发展问题新的研究上来。

现在，逐渐把一体化看作是各个国家、各个“国家地区”的相互结合。整个地球上居民的共同体就是由各个“国家地区”构成的。各种严重的威胁迫使每一个“国家地区”都必须承担学习的责任与义务、研究其他“国家地区”的责任与义务、以及按照为全人类制定的标准而调节生产和消费的责任与义务。

我们所讲的发展是整体性的；这种发展使技术受到各个人类共同体知识的、社会的和道德的约束。世界正在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它并不带有任何现行国际贸易理论意义上的“外部”成分。这种情况的出现，甚至比亨利·柏格森关于社会正在开始开放的观点、关于进行大量未来预测的浪潮现在已经把开放社会有目的地推向全人类范围的观点，具有更大的主题性。

在这里，根据各种科学的调查，我们完全有理由谴责那些具有最工业化国家特征的毫无意义的资源浪费；应该使技术的进步适合于不发达国家的吸收能力；应当承认发展受到的真正限制不是技术的，而是“政治的、社会的和管理的”；应当在“道德”、“伦理”因受目光短浅的唯科学主义影响以及盲目相信“中立的”市场力量的影响而长期被埋没之后，重新发现它们的价值①。

对电子计算机的运用，对社会道德标准各项要求的执行，显然会导致前面所讲的各种自力更生发展方针的产生，因为这样的方针是和现实的人、他们的土地、他们的传统习俗直接联系在一起的。

对各种预测的批判分析

前面所进行的全部研究都是依据于各种预测的，因而要紧的是预测的质量。

就我们所知，无论在任何国家，粗略地用数量表示的各种模式，其合理预言性价值是非常微小的。如果管理部门将最后结果与预期结果加以比较时，总是会感到失望。统计学家、社会会计师和经济学家都试图用自己的方法来改变严格预测的不可能性，为此他们设法获得各种相互一致的信息，因为这些信息能为反复摸索的活动提供某种指导。要使目标变化的各种预测非常准确，必须使这些预测相互适当地一致起来，但是，所有预测的各种现

---

① H·科尔、C·弗里曼、M·杰霍达、K·帕维特：《关于未来的思考——对增长极限的批判》，伦敦，苏塞克斯大学出版社，1973年；丹尼斯·加布尔、昂伯托·科洛姆：《超越浪费的时代——向罗马俱乐部的第四份报告》，1976年（由M·A·勒维里特译成法文版，巴黎，多德，1978年）；D·I·梅多斯、E·K·D·赞恩：《有限世界增长的动力学》（法文版，前言由前任部长、巴黎俱乐部主席约瑟夫·丰塔内所写，巴黎，《经济杂志》，1977年）；还比较有价值的是《第三世界的经济挑战》，巴黎，法国文献，1978年（两卷）。

象是在不可逆时间中发展变化的，因此我们既不能对动态规律加以检验，也不能对符合于这些规律的各种有效的或然性因素加以检验。

如果“人口”预测、“经济”预测和“社会”预测的区别是按照我们通常的理解划分的，那么，这些预测就会相互交叉。

因此，这些预测之间的区别是传统式的区别，它往往会引起人们极大的误解。

而且，我们还没有必要的、经反复试验证明的材料和各种预先的研究来严格地鉴别它们，并按照适当的衡量标准来合理地排列它们。

我们的目的并不在于预测，而是在于预期。二者显然是不同的。即使就“重要的分类预测”这一术语来讲，我们所概括的前景也应该是有分寸的。

因此，有必要尽一切努力来测定现有成果的范围，并设法通过获得更多的文件资料以及充分发挥这些文件资料的作用来扩大这些现有成果的范围①。

如果说这种看法对那些早已发达了的国家也是适用的，那么，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则是更为恰当的，只要根据各国的特殊情况来考虑。

“人口预测”②。由联合国专家所提出的各种方法的详细内容，可以从一些基本文献中看到。对于欧洲大陆有经验的人口统计学

---

① 简·廷伯根（合著者）：《RIO报告：重建国际秩序——向罗马俱乐部的报告》，法文版，SNED，巴黎·多德，1978年；布朗特·科米森：《南—北：生存计划——在威利·勃兰特主席领导下的国际发展问题独立委员会的报告》，剑桥，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80年；《世界新的就业计划》，这是由J·M·廷伯根、J·M·登维尔、J·P·普朗克和W·科克所提出的一份建议书，油印本，海牙，1980年10月26日。

② 对各种预测的批判分析，在法国人口研究所的M·布儒瓦·理查特最近的著作中可以看到，巴黎。

家们所起草的、最近已经出版的决议所作的分析评价，也同样是值得注意的。

所谓的人口预测被看作是各种最有可靠依据的研究的对象。如果是作为直接的研究对象，那这些研究预测就是以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为基础的。如果是作为间接的研究对象，就是以其他许多因素，如劳动力参与率，户主率为基础的，而户主率又是以性别、年龄和婚姻预期分类为基础的。

在开始时，人口调查的各种主要成分和质量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并且在各方面还有许多有待改进之处。联合国是以十年为标准来区别短期和长期的。

过了十年，各种分类与行为模式就不再是牢固不变的了。19世纪60年代所搞的欧洲人口预测，在人口出生率方面被证明是错误的。1976年所搞的关于发展中国家人口出生率的社会调查显示出一种明显的（秘鲁）或非常显著的（哥伦比亚）下降趋向。

任何传统的方法都不是令人满意的。线性预测由其结构所决定，不能反映出各种波动。指数预测取决于对指数的选择，并且具有同样的缺陷。逻辑预测总是以对长期发展趋向的了解、所选的拐点（或范围）、以及在一定观察时间中人口所处的逻辑点为前提的。要克服这些缺点，唯一的补救办法——和一种权宜的补救办法——是通过对较短时期的预测以及对新近发展的考虑，来对长期预测进行定期的修改。事实上，这就是联合国所用的方法。而且，更具有重要意义的是，现在每两年进行一次这样的修改，而不再是每五年修改一次。

因此，由“人口”预测所提供的根据是不确定的，而这种不确定性会对后来的各种行动产生重要影响，因为这些行动总是设法将这种预测作为出发点的。

“经济”预测。这种预测就在于把适用于产品、收入、消费

和储蓄（投资）的价值归因于人口的增长。这些量是按照平均水平计算的（对于不同民族的人口来说，这是会使人发生误解的），或者是按照适当的衡量标准计算的（即使对于那些具有丰富统计资料的国家来说，这也是有许多困难的）。在这种量和那种量之间，必须作出一种抉择。所以，上面我们关于行为模式超过一定时间必然具有不稳定性的论述，用在这里也显然是非常恰当的。

在生产领域，外国企业为了实现自己的计划，一些比较重要的变革（称作为战略上的变革）也被输入到要求变革的发展中国家，但是，在这种方针与受援国人口的具体情况——或者是过去遗留下来的，或者是事先预料到的——之间根本不可能建立一种明确的、单纯意义的关系。为此，我们可以回想到在跨国公司的飞地和城市环境中引进原子能和数据处理所带来的各种后果。

带有固定系数或接近固定系数的投入一产出矩阵只不过是一个编制问题表。在设法回答这些问题时，我们并没有从中得到什么理论指导，也没有得到对于一定时期中增殖这一概念的任何可靠分析，而我们恰恰是根据这种分析来行事的。

W·列昂惕夫的矩阵具有简明易懂的优点，但它也没有考虑到在分析上的最新进展。这些进展可以在利夫·约翰森卓越的研究中发现，并且已经在其研究中以一定形式确定下来。

此外，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要把它们的经济方针建立在这些矩阵的基础之上也是危险的，因为这些矩阵考虑的是固定系数，反映的是一种技术停滞的状况。

相反，对于那些主要部门，甚至不是和整个系统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那些主要部门不断发展变化着的结构所作的专门研究，则提供了合乎需要的调节手段。

从整个系统的观点以及运算一致性的观点来看，我们只能对不适当的统计乘数表示遗憾，因为这种统计乘数只是为了研究方

便，除此而外没有更多的东西。产生于凯恩斯或者后来的凯恩斯主义者的各种基本模式，也不能为任何有意义的制导系统提供可靠的基础。

因缺少更好的预测方法，因而有必要设法通过对那些在投入和产生阶段（H·B·切纳里）由分类投资和“增加—压缩”投资而引起的各种推进效应加以数量分析——在特殊情况下——来校正上述预测方法。这种策略构想总是希望通过揭露各种机械性预测在某些方面的缺陷，并由此为整个研究活动动态化铺平道路的方式，来摆脱机械性预测的各种局限。

“社会”预测。J·布儒瓦-理查特通过把分析应用于流程表已经证实：人口统计现象和经济现象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以至任何有效的人口调查都不能为理解这些问题提供出一个准确的答案。那么，对于根据人口调查所作的预测究竟怎样评价呢？他认为，生产与消费这两种功能并不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危险的是，人们总是希望消费他不能生产的（大量）东西”，而不管是否可以通过对外贸易和人口迁移来加以调节。

J·布儒瓦-理查特进一步要求对那些“低等人口”予以重视。为了扩大人口分析，他极力主张对那些在一定时期内——“比如在一年期间”——“会遭到需要依靠社会来生活的严重困难”者应加以统计。这些不幸者主要包括：残疾儿童或被父母遗弃的儿童，即孤儿和不能适应正规教育制度的儿童，以及从事实际活动人口中的病残者、事故的受害者和营养不良者。

因此，需要对人口问题进行新的分析。这样，对上述人员进行社会抚养，就使军费开支增加沉重的负担，同时减少以统计缺口为基础的盲目乐观，因为如果我们在对一个组织或一个亚组织的产量、生产率这些量进行计算或预测时，必然会成为各种盲目乐观的牺牲品。

各种预测究竟怎样相互联系的，还不那么明确。为了便于分析，必须对“人口”预测、“经济”预测和“社会”预测加以区别。目前，对于它们之间的区别，认识上还是有些模糊的，这些模糊的认识曲解了各种预测。同时，对于每种预测的解释也是不同的。

统计上的缺口和缺陷使各种基本模式更为不可靠。这些模式都是在凯恩斯学派经济学影响下由发达国家制定的，并且是适合这些国家需要的。这些模式实质上考虑的是投资与收益增殖率机制，它们与那些为理解和评价人口发展的内容所必要的各种观念和联系是完全不协调的。

国家计划和世界模式

要使发展方针能够实现，必须依靠全民族坚持不懈的努力。这里所讲的发展计划如同前面所分析的那样，是和集权计划，即法国式的“指示性”计划或“积极”计划截然相反的。[1]

这种计划简单说来，就是用数量表示的关于国家预期结构（琼·韦勒）的方案。例如，在五年结束时，这种方案通过采取能够推动和控制各种具体活动和行动的措施而得到实现。

这种计划形式是以对经济正确的定量描述为前提的。而这种描述又是和经济发展预测结合在一起的，因而，它是对各种相互一致的目标的一种说明，或者说，是对各种目标结合的说明。这种目标结合就可以提供预期结构，提供相应手段的选择，同时可以对目标相互关系进行调节。

因此，计划的成功是以计划者和模式制定者之间的交换为转

① Y·厄尔莫，《法国的计划》，巴黎，达罗兹，1974年；弗朗索瓦·佩鲁，《进行计划的定量分析方法》，巴黎，法兰西大学出版社，1965年。

移的；计划的改进有赖于部分计划与整体计划筹备之间的信息交换。

例如在法国，在对整个国家的经济活动作出预测之后，又将力量转入建立各种多维的模式，如实物—财政模式（FIFI，R·库尔比斯）、多成分动态模式（DMS模式，富凯）和区域模式（REGINA，R·库尔比斯）。发展计划在其基本形式上，能够建立由各种变量与手段所组成的“大厦”；在其复杂形式上，又会成为适合于推动新的发展研究的一种最合适的方法。

假如国家权力是真正有实权的和强有力的，以至足以能从其整个国家的立场出发，在各部门利益之间进行仲裁，那么，情况就会是这样的。在发展中国家，这种权力正在缓慢地出现，但往往伴随着不正当行为和各种倒退；它正在摸索着有效地运用同各种国际组织进行艰难对话，并摸索着建立具有独立人格的政治精英队伍，因为这些政治精英能够唤起全民团结。现在，民众也在艰难地认识到国家的各种纪律。

发展计划还提供了一种对实现新的发展所遇到的各种障碍进行评价的方法。

整体的发展计划在理论上必须包括健康、卫生和教育这些因素。这些因素就是在发达国家，要对其进行严格估价，并且认识这些因素与其他同实物产品有关的各种变量的关系，也是相当困难的。

内生的发展计划是建立在对潜在人力资源鉴别的基础之上的。它把自力更生与国际合作的不同职责作了划分，试图把地区计划与国家目标加以等级区分，并在向上的信息流与向下的信息流之间建立一种持久的联系。这种信息流不仅能够传送各种指令以及对这些指令的反映，而且可以沟通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相互信赖。

综合的发展计划可以使对外贸易与内部的生产体制、贸易体制和分配体制有机地协调起来。如果依靠国内工业与进口工业，那么充其量也不过是把这些工业对当地农业的各种推进效应组织起来。这种发展计划区别了适合于本国人民的产品、技术与那些进口的产品、技术，因为进口的产品、技术使少数本国受益人远远脱离了大多数人民群众，所以它们被认为是不合需要的。

这种完整的发展计划，正象在专家们和和独立研究工作者们的特殊研究中所"理解"的、被那些目光最敏锐的政治领导人在摆脱个人或集团争吵时所正确意识到的那样，它是一项庄严的计划。不管这种计划与那些能够勉强对付超级大国——超级大国总是通过中间国家和它们的一些主要公司来起作用的——的"软弱国家"（冈纳·米尔达）的能力相距多么远，而能够集中提出这样的计划则是非常有益的。

实际上，有时也要求超级大国（就东南亚国家特殊情况来说）来选择它们确定的位置，这种位置必须与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计划相一致。必要时，它们也可能不得不接受东道主国家的资本参与，当然，这种参与决不会给东道主国家随之带来对后来活动的控制。

尽管在发展中国家的各种同盟与联盟以及这些国家与发达国家的交往方面作了不懈的努力，但总的说来，它们还是受力量对比支配的。

从新发展研究的观点来看，如果要正确地了解一个国家的实际情况，那就必须在下列两种基本观点之间作出抉择。不同的抉择自然会影响到统计资料的收集以及模式的制定。

一种观点认为：经济涉及的不过是市场，正是通过各种完备的商品交换市场和服务交换市场，才能实现价格与各种量的平衡。如果按照这种观点，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国家不过是历史

发展的一种偶然事件，它往往阻碍世界市场的正常运行。

另一种观点认为：经济涉及的是抵制萧条的组织。它要在其他各类机构中，诸如税制、贷款机构和所有公共事业部门中，充分利用有组织的市场。按照这种观点，如果没有“超市场的活动”，市场活动就是不可思议的。

这样，为了维护社会团结，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国家就变成了一种有组织的权力系统。根据这种观点，国家作为一种经济现实，就是：

1.“一种社会现象和经济现象的储存库”；

2.一种结构上的“混合经济”形式；

3.一种“文化个性”和“文化遗产”。这种“文化个性”和“文化遗产”可以激励人的动机，从而有助于充分发挥每个人的才能，增加每个人的经济收入。

由于发展中国家关心的是新型的发展，因而倾向于采纳上面所概括的第二种观点。这些国家是通过政治制度来起作用的。这里所讲的政治制度是广义的政治制度，它具有多方面的（当然包括经济方面的）效能。

多国集团（如共同市场和经济共同体）是根据短期情况的统计研究、中期和长期的预测以及各种运行模式建立起来的，并且以其作为指导的。在详尽阐发和运用这些方法时所遇到的困难，既产生于集团中各方对传送信息的不同倾向，又产生于不充分的资料上的国际可比性。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统计资料的不足、生活资料生产和消费的较低程度、以及专家的有限数量，都是使国家核算和有关资料的技术处理特别困难的各种不利条件。

在一个特定的发达国家，地区会计制度虽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总的说来还是很落后的，以致它们的实际运用受到限制。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把注意力放到作为地域的地区与作为领

导中心（如工业中心）势力范围的地区之间的矛盾上来。这种矛盾正在理论上暴露出来，但还未被统计文献充分突出出来。

全球性“世界模式”的领域正是这样一种领域，它能最清楚地显示出新发展研究的各种要求与严格管理经济的各种需要间的融合。

“全球”这个词涉及到：

1.所有在发展中必须加以重视的变量，因而是那些与人本身（健康、卫生和教育）有关的变量，以及所有的生态变量；

2.世界所有的国家和地区。

要想实现规模如此宏大的计划，需要数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应该把这种计划作为人类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我们还是第一次要求把经济资源用来实现那些理性的和宗教的理想，而这些理想长久以来一直被认为不过是“乌托邦”式的理想或痴心妄想。服务于科学技术的庞大工业机器促进了世界范围的、可能到处都能够用数量表示的文献资料的收集，同时也使电子计算机与信息科学的巨大资源得到利用。

在利用总体分析法表示或模拟模式方面，现在已经创出了许多新路。一种方法是从一个国家出发，模拟可供选择的、与一定方针相关的国际环境（参见法国METRIC模式）。另一种方法是采取各种现有的国民经济模式，以求表示国民经济之间的国际联系（参见LINK计划——国民经济模式之间的联系，劳伦斯·R·克莱因的名字与这种计划是联系在一起的）。

一种集中于发展方针上更为直接的整体研究，构成了A·K·森达拉姆和J·G·克里施纳亚（系统研究所，印度）、弗拉迪斯拉夫·蒂克霍克罗夫（联合国培训与研究机构，纽约）、N·N·莫伊谢也夫（苏联科学院电子计算机中心，莫斯科）以及M·梅多（约克大学，克伦多）这些作者卓越著作的基础。

完全撇开世界模式的内在价值不说，这种模式还可以通过冲击那些没有确立其模式的"狭隘的"、"假精确的"经济学派来拓宽各种知识领域。它还能够扩大、提炼对地球上自然经济资源与人力经济资源的定性描述，而这种定性描述在其能够逐渐被形式化和可以进行机械计算之前，曾一直纠缠着所有宇宙神教的想象力。

由数学公式和模式所表示的研究方法是和新型发展的各种要求相符合的，因为新型发展就需要重新组织"整个"世界，即"世界体系"。这些研究方法目的在于探索各个部分之间、子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它们之间的辩证交换；它专门集中于对人的研究，从每个人的现实存在和他与环境的关系去理解人。这些都是现实的研究方法，正是按照这些方法，新近出现的各种统计、预测和模式都被推向前进。

看来，如果不注意丢掉各种幻想，那么，被整个世界上以及所有国际组织中这么多模式所激发出来的真实热情就不能产生持久的效果。

这里不需要更多的强调，但可以顺便提及垄断追求、严格的国际贸易区划化以及从一些专家中间看到的排斥倾向。如果专家领域确实是学究的，这种态度还情有可原；如果这种态度试图有所开创，但又捉摸不透它为什么不坚信开创的各种原则，那就很难原谅了。"没有模式，就不可能有任何挽救的希望"，或者说，就没有任何可靠的经济思想！

但是，如果经济学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仅仅停留在可靠的、经过检验的各种模式上面，其经济寿命也就会停止。因为经济学用数量表示的各种公式都是来源于对事实的观察和观察者的假设，而随着工作的不断进行，这些假设会得到具体化，因而需要推敲

修正；甚至通过审慎地运用数学工具，这些假设也可能被改变①。真正尊重科学的经济学，由于它是以经验为根据的，所以总是力图从现实出发并且最后回到现实。

更容易被忽略的是对根据不充分的模式加以滥用。假若滥用的话，模型制定者就给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是一种以发达国家经验为根据的、被用来为这些国家的利益服务的、实际上也就是为统治它们的阶级利益服务的模式。对各种经济概念以及整理这些概念所运用的方法仅仅进行数学式的表达，并不能自发地使它们免受被绝对规范化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它们实际上被当作准则来看待，而这些准则即使不适合于那些消息闭塞的国家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也将会被这些国家不加鉴别地接受。

最后，我们可以这样认为：越是充分考虑到不可逆的时间，那么，要把一种经济功能得以发挥而依赖的所有因素编入一个模式，或者真正选定共存在和影响具有决定意义的各种因素，就越是困难。

这些认识上的保留意见并不是要反对运用数学或模式，而只是在于指出研究的某些界限，因为超过了这些界限，模式制定者的方法就会受到不适当地缩小了科学研究范围与成效的怀疑。

① 雅克·阿达马："论数学领域的创造心理"（由杰奎琳·阿达马从英文版翻译成法文版，巴黎，艾伯特·布兰查德，1959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46年。